

海淀史志

HAIDIAN SHIZHI

2024 2
(总第 100 期)

北京市海淀区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主办

纵观知行百家 采撷史苑奇葩



2023年12月22日，区史志办机关党支部联合区直机关工委机关党支部赴国家速滑馆开展“传承冬奥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主题党日暨“学习身边榜样”宣讲活动
(马坤供图)



2024年1月31日，海淀区史志办与党史合作单位2024年工作交流研讨会议召开
(马坤供图)



2月28日，区史志办、文促中心、紫燕堂艺术团与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合作开展的舞台剧《西山红色交通线》专题讨论会在北京理工大学校史馆举行
(马坤供图)

探寻资政之道 弘扬海淀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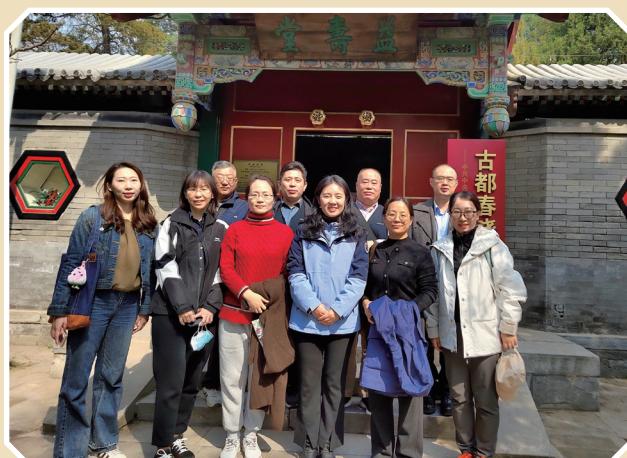
2月29日，海淀区史志办在阳台山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接待民盟海淀区委参观“红色血脉：平西地下交通线主题展”，区政协副主席曹先彬、民盟区委副主委王东旭等领导出席
(马坤供图)



3月8日，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区委办主任程培衡，区史志办主任李强出席全市党史地方志主任会议
(徐佳伟摄)



3月12日，区史志办开展地名考察活动
(曹沛函供图)



4月2日，区史志办赴颐和园益寿堂参观“古都春晓——中共中央‘进京赶考之路’颐和园专题展览”
(徐支燕供图)

海淀史志

2024年第2期
总第100期 2024年6月1日

三山五园研究

- | | |
|----------------------------|--------|
| 福长安花园在何处 | 张宝章 02 |
| 御苑属园养花园 | 王密林 09 |
| 金河的前世今生——三山五园地区历史水系钩沉诉今（一） | 胡志芳 12 |
| 园林中的紫禁城——论清帝园居理政 | 赵连稳 14 |

寺庙观堂

- | | |
|------------------|--------|
| 普会寺的兴废和观音寺大土古像之谜 | 李忠义 22 |
|------------------|--------|

地名辨析

- | | |
|-----------------|--------|
| 田村关帝庙碑文与田村之名的由来 | 王崇锐 27 |
|-----------------|--------|

语言文字问答

- | | |
|------------------|----------|
| 偏正词组中“的”“地”如何选用？ | 本刊编辑部 33 |
|------------------|----------|

人物春秋

- | | |
|---------------------------|--------|
| 访六郎庄村民胡玉珍——五塔寺战斗包扎所设在她家 | 王忠真 34 |
| 盛德在民民祈之，功垂天下久弥恢——周恩来情系颐和园 | 唐润 36 |
| 温唯世篆刻的金石味 | 吴剑群 45 |

史海钩沉

- | | |
|-------------|--------|
| 香山纪念孙中山的遗迹 | 户力平 47 |
| 马甸的明代御道及其变迁 | 王德福 52 |
| 探究古榆河驿 | 金连河 56 |

HAIDIAN SHIZHI

昌平清水店初探	杜泽宁 59
六郎庄种稻历史不止300年	郎玉明 62

海淀述往

美丽校园说古树	王秀华 64
慈寿寺塔影像小史	冯经龙 69
回顾2011年时的颐和园博物馆	王杰 73

海淀史迹

百望山法国教堂	韩笑 80
---------	-------

史志动态

海淀区史志办传达学习贯彻 北京市党史地方志办主任会议精神	本刊编辑部 82
海淀区史志办开展地名考察活动	本刊编辑部 83

顾 问：张宝章 张志田 胡桂枝 周来升 王珍明 彭兴业
 蔡景惠 张源洪 王宋文 肖天寿 王少谱

主 编：程培衡

副主编：李强 赵习杰

执行主编：宁葆新 田颖

编 辑：马坤 王静宜 刘江英 肖大伟 陈智慧 张莞笛
 周勇 钟冷 徐支燕 徐佳伟 曹沛函 董震
 戴金胜

刊名题字：张书范

封面摄影：刘江英

版式设计：林琳

福长安花园在何处

张宝章

在研究圆明园第五园春熙院的座落位置时，牵涉到很多具体的事物。如淑春园的北楼门在何处？畅春园以北新建园林在哪里？福长安花园在何处？等等。如果不能正确地解决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就不可能准确地确定春熙院到底是修建在今北京大学北部，还是圆明园东北园墙外的二河开。我愿对这些问题表达自己的看法。

一、淑春园“北楼门”在何处

关于淑春园的文献记载，最早的是《钦定大清会典事例》1194卷所记：“（乾隆）二十八年奏准，圆明园所交淑春园并北楼门外等处水田一顷二十三亩六分三厘，岁征足银三十九两一钱九分五厘有奇。”这两行字是关于淑春园的真实记载，但是人们对其本义的理解有很大的差距。何瑜教授认为，“北楼门”的称谓必须有楼，北大校园的北部园林里没有楼，所以这里也不会有“北楼门”。他在《再论圆明五园之一春熙院》（以下简称《再论》）中写道：“《清会典》中提到的‘北楼门’到底在哪儿？从《燕园史话》附录三可知，今北大北部历史上的鸣鹤园、朗润园一带，既没有相关的楼，也没有朝北开的‘北

楼门’”。

我认为《清会典》所说“圆明园所交淑春园并北楼门”明确说明，这里所说的“北楼门”是淑春园的北楼门。在现实生活的园林中，有楼门或门楼的地方不一定都有楼，园内的楼房建筑与楼门没有必然的联系。在样式雷绘制的《圆明园大墙丈尺及周边园林总平面图》（刊载于郭黛姮《圆明园的“记忆遗产”——样式雷图档》P120）中，圆明园与绮春园的通道中，在东侧墙上开辟了一座有三间门房的“东楼门”，又称大宫门东砖门。楼门内是一座平房院，没有楼房建筑，是升平署。园林建筑专家在记述园林的大门建筑时，即使门附近没有楼房建筑，也普遍使用“门楼”这个专用词汇。对海淀园林研究颇有成果的焦雄先生就曾写过：李连英碓房居宅园“前门临近港沟大路边，清水脊大式门楼一座，门垛墙壁上嵌砌雕砖图案，雕刻十分精湛。他在记述僧格林沁花园时，也使用了“门楼”一词。

我查阅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建筑园林》部分关于“门”的专题记述。其中写道：“中国民居的大门，有一些组件，如门上的挑檐，门侧

的砂石（抱鼓石），门上的门檐，门外的台阶垂带，以及门旁的侧墙等，合在一起统称门楼。”这个专业性概括，很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不能因为北京大学北墙附近没有楼房就否定“北楼门”的存在，而实际上在原中部春和园和东部镜春园都有二层楼建筑。

《再论》认为，《清会典》所记载的“北楼门，不在北大校园北侧，而是在圆明园。圆明园有多处稻田，即可证明。文中写道：“这种种田园景象与上述《清会典》所载，内容完全吻合。故《清会典》中所言的‘乾隆二十八年，奏准淑春园并北楼门外等处水田’的岁征租银事，所言及的北楼门无疑是在圆明园，而绝非在今北大校园北部。”

《再论》这番论述，与园林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首先，淑春园的一百多亩稻田，都是利用自然的水势主动开发修造起来的，《清会典》还有另一条记载：“北楼门外水田一亩七分九厘”。为什么这么一小块稻田要专门记载这里呢？因为淑春园北部园墙距离万泉河很近，在河边开辟一亩地稻田也是一份收获。在圆明园北边绝不会开辟一块一亩地的稻田，那里开辟的稻田都是成片的。

《再论》把圆明园北楼门与淑春园北楼门等同起来，引出淑春园位于圆明园北墙外的结论。实实在在的圆明园五间大北门，怎么会变成只有一间的淑春园北楼门呢？而且圆明园大北门与二河开还有不小的距离，怎能把淑春园搬到二河开呢？

由上述情况可知，《会典》所说的北楼门是淑春园的北楼门。淑春园位于今北大校园北部。

二、畅春园北面新建花园在何处

本世纪初，我在研究圆明园始建于年代时，从

杨珍《康熙皇帝一家》引用了康熙皇子修建赐园的资料。康熙四十六年正月，皇十子允䄉以上的皇子（皇太子允礽、皇长允禔除外），“奏请于畅春园附近建房”。皇帝诏准了这一请求，降旨“（畅春园）北面新建花园以东空地，赐予尔等建房”。后因“若于此处盖建七人之房所，地方稍有窄小。故四阿哥（胤禛）、八阿哥（允禩）、九阿哥（允禟）、十阿哥（允䄉）奏闻父皇后，于此建房了。”三阿哥（允祉）、五阿哥（允祺）、七阿哥（允祐）等三人，则“奏请另觅地方建造”。四位皇子建在何处，关键要看“（畅春园）北面新建花园”所在的位置，四皇子花园修建在“北面新建花园”的东边。

专家们对“畅春园北面新建花园”的位置多有歧见，时有争论。《再论》作者对此有明确的论述：“经笔者考证，所谓北新花园，即今北大的蔚秀园。”其“迤东空地”，即畅春园东北今北大校园的鸣鹤园、朗润园、镜春园、淑春园、十笏园一带。

这真是一个大胆的假设。首先，今北大蔚秀园的位置上，在康熙四十六年为皇子们修建花园时，这里还是一片空地，怎么会有花园呢。第二，当时四阿哥的圆明园是在诏准的当年修建成功并于十一月在园内向皇父晋宴。新建花园应在圆明园的西边，而不是东南。第三，这四座皇子花园应相当紧密地罗列在畅春园北墙外，彼此相距不远。程庭在《畅春园记游》一文中写道：“玉泉山之水，走十余里绕入苑河内，复作琤琮夏洁声，流出宫墙。苑后则列诸王池馆，花径相通……”按照《再论》作者所写，皇子的赐园都移到蔚秀园以东淑春园的位置上去了。这使皇子的居处更难确定了。

《再论》还有一段论述，认为畅春园北面这座

新建花园名叫“北园”，是皇三子允祉居住、读书的地方。其根据是皇三子允祉的师傅陈梦雷，在记述允祉学习情况的两段话。一段是“臣陈梦雷侍皇三子诚郡王读书北园。”一段是“己卯季夏侍皇三子郡王殿下北园读书。”我认为论者这个观点缺乏事实根据。我认为康熙皇帝皇子们读书和生活的“北园”，就是畅春园、园内西南隅的无逸斋。据我了解，清代有不少官员和百姓，从京城来到海淀一带，如果出西直门或阜成门前行，便说去城西、西北郊；如果出德胜门前行，便称去城北、西北郊。陈梦雷正在皇城宫殿侍皇三子读书学习，现在要转移到西北郊海淀来，便称畅春园为“北园”，这是合乎情理的。

按皇父谕旨，皇太子允礽于康熙三十六年六月偕诸皇子来到畅春园。从初九日起在无逸斋集中读书学习。他们不允许出园活动，更不可能到外边去读书，那座还没有存在的“园北新园”怎么会成为皇子们的书房呢？

陈梦雷在《己卯夏季侍皇三子诚郡王读书北园即事》一诗中写道：“东平别馆纳熏风，扈跸停骖禁苑通。池水遥分银汉碧，岩花近接上林红。”诗人扈随皇三子允祉停骖近苑，身旁便是御园里的成片红花。陈梦雷还在《恭拟课余集后序》一文中，具体地记录和描绘了北园的景观。他在乾清宫懋勤殿亲睹康熙帝向皇子们讲肆经史之后，“喻月又侍王扈跸畅春，读书北园。竹树水石之旁，间以稻田顷许。无亭榭丹幢之饰，左图右史，无声伎玩好。每晨东官殿下偕诸皇子入问省视膳毕，退各就池馆，读书或赋诗，间临池染翰，虽盛暑不缺。”此文明确肯定“扈跸畅春，读书北园”，北园即是畅春园。读书之地便是畅春园西南隅的无逸斋。斋内的“松篁深处”古松繁密，翠竹成林。无逸斋北边有“稻田顷

许”，正是康熙帝观稼问农的地方。这把无逸斋的景观特色描绘得真实而又具体。这里才是皇子们读书的地方。

三、另一个淑春园在何处

淑春园是京西古典园林群中一座重要的园林。它位于三山五园历史文化景区的中心部位。它的发展变化曾对周围的园林发生了重要影响。它名字的转换，园林的分解与合并，园林性质由御园到皇家赐园的转变，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再加以历史资料比较缺少，这就成为关于淑春园、春熙院的认识问题讨论的关键。

我认为，在清代京西古典园林的发展中，只存在过一座淑春园，即那座位于今北大的园林。但是近年在圆明园北冒出一座同名园林。据《再论》作者介绍，海淀皇家园林里，有两座淑春园，前一座淑春园在长春园北面，原为康熙二十四子诚亲王允祉的赐园。后一座淑春园，则是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帝赐和珅子丰绅殷德的。我认为，北京清代园林中重名的很少，皇家园林特别是御园中不可能出现重名。乾隆帝不会在圆明园南侧修建一座淑春园，又在圆明园北侧再修建一所淑春园。有的作者说，海淀就有两座春和园，是后者沿用旧名。其实绮春园的春和园，原名交辉园。大学士傅恒住进后用自己的字“春和”名园。他后来迁入淑春园北部，又以同样的理由命名为“春和园”。而此时绮春园的春和园已经改名西爽村了。春和园的例证不能作为御园重名的依据。

淑春园的面积有多大，各家在认识上也很有差异。《再论》作者不同意“淑春园园域广阔”的说法，主张“不论是作为赐园的淑春园，还是作为赐园的春熙院，都不会有三百亩大的面积。”但是我认为，阅读和研究《大清会典事例》1194卷的记载，“圆明园所交淑春园并北楼门外等处

水田一项二十三亩六分三厘”，这告诉我们，淑春园的北界在北楼门往东、西延长线上，此线往南即是淑春园的园域。园内的水田即有一百二十多亩。可以想见，如果园内陆地也有一百二十多亩。合计共二百四十余亩。再加上与南边相连的一百余亩的园域，总共足有三百多亩。另外，大学士傅恒迁来淑春园北部以后，把它重新修建成“春和园”。据样式雷《春和园地盘画样全图》等资料可知，春和园占地面积约二百亩。此数再加南边淑春园面积一百多亩，也是共有三百余亩。园林具有足够的占地面积，对园貌的设计和建设、发挥建设园林的社会功能具有重要作用。

对淑春园进行分割建成新园后，改变了园林性质，使皇家赐园变成为皇家赐园和皇家御园。乾隆皇帝在乾隆四十五年将淑春园一分为二，将南部赐于大学士和珅，仍然称为淑春园，也称十笏园。北部原春和园改建成春熙院，作为圆明园的第五园。

《再论》认为，不是在乾隆四十五年赐予和珅，而是在乾隆五十四年，或先后或同时赐予和珅十笏园、赐予和孝公主淑春园的。其实，正是在乾隆四十五年赐给和珅淑春园的。历史资料表明，和珅自乾隆四十一年命为军机大臣、步军统领，四十五年命为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成为权势显赫的重点宠臣。这一年乾隆帝又将极端宠爱的和孝公主指婚给和珅儿子丰绅殷德。在此前一年的乾隆四十四年，皇帝还在京城什刹海南岸赐给和珅一大块占地优越的建宅地基。按照赐第即赐园的成例，乾隆四十五年赐予和珅一座园林是顺理成章的事。

《再论》还认为，和珅的赐第和赐园，“实际均得益于和孝公主。其实，淑春园是乾隆皇帝给下嫁丰绅殷德的和孝公主的赐园，而和珅的赐

园是十笏园。”还认为淑春园中那么多的房舍、游廊，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和孝公主下嫁时，乾隆帝赐给女儿的。

这样的记述，把事实真相模糊、掩盖了。和珅获赐淑春园后，他亲自主持建园工程，极尽奢华奇巧之能事，进行了大规模的新建扩建。还在湖中心仿效圆明园蓬岛瑶台修建岛上亭阁，又在湖南岸仿效福海广育宫修建花神庙。和珅将园名取作十笏园。此园以后仍沿称淑春园。时至嘉庆年间，和珅被嘉庆帝处死之后，《嘉庆帝诛和珅案》记载，嘉庆四年二月十六日奉旨：“和珅园内东段著赏成亲王永瑆；西段仍赏十公主十额驸丰绅殷德居住。”谕旨证明，和孝公主居住的是“和珅园内”（即淑春园内）的西段。此后仍沿用了旧名淑春园。虽然由和孝公主与丰绅殷德居住，依然没称为“十公主园”。

这是一段真实的社会生活的历史。长春园北的二河开不会有这样的真实历史记述，因为那里没有修建过淑春园。

四、福长安花园在何处

清代的官方文件《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圆明园卷》记载：“（乾隆四十七年正月）奉旨：淑春园改为春熙院。”在此前的乾隆四十五年即设有苑副，专职管理春熙院的事务。从乾隆二十八年至春熙院设立之间，曾经有十几年时间是大学士傅恒在此处居住的春和园。

傅恒是满洲镶黄旗人，富察氏，字春和。他是权倾朝野的椒房懿亲。他的姐姐是乾隆皇帝的嫡亲皇后。皇帝又将皇四女和嘉公主下嫁给傅恒次子福隆安。傅恒被授予多种高职，包括首席军机大臣、保和殿大学士等，成为乾隆朝顺利发展的头号功臣。淑春园被赐予傅恒及其次子福隆安后，进行了新建和改建。建成中所的“春和堂”，

东所的“春和别业”，西所的“益思堂”等，共有大小房 153 间、游廊 157 间等。

乾隆皇帝在春和园、淑春园的基础上修建成春熙院，春和园中的春和堂、春和别墅等建筑根本没动，连傅恒的题字也原样保留着。

乾隆朝前期，“讷亲是本朝受恩第一人”，其次就是傅恒了。傅恒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至关重要。他在六年时间内，即由总管内务府大臣晋升为保和殿大学士，真可谓少年得志，平步青云。傅恒屡建军功，在平定金川后，被封为一等忠勇公。后在紫光阁为百位功臣画像时，傅恒居首。在缅甸征战后，傅恒于乾隆三十五年三月病逝。乾隆帝亲祭奠，赐谥号“文忠”。

傅恒的四个儿子由于都很努力作为，备受朝廷的恩泽，皆是地位显赫。长子福灵安随将军兆惠平定大小和卓叛乱，获军功被擢头等侍卫。积极参与征缅作战，被授予副都统，署永水镇总兵，后在征战中病故。次子福隆安，娶皇四女和嘉公主为妻，为和硕额驸。在二十余年仕官生涯中，曾任兵部尚书、工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领侍卫内大臣等重要职务。曾因管家指使打死一名夫役，部议被罚公俸十年。乾隆帝却降旨为革职留任。三子福康安功勋卓著，扬名天下。他是平定金川的功臣，曾出任多地的封疆大吏，政绩不凡，曾任吉林将军、威京将军、云贵总督、四川总督兼成都将军以及陕甘总督、闽浙总督、两广总督。福康安曾去台湾处理林爽文农民起义。他还被派去西藏，击退来自尼泊尔的廓尔喀族人的入侵，保卫了国家边疆的稳定和安全。福康安在嘉庆元年（1796）病逝于处理苗民起义的军营中。

福长安是傅恒第四子。他仰照父亲的权势和皇帝的恩典，也顺利初授兰翎侍卫，后相继任满

洲正红旗副都统、军机处行走、户部右侍郎、户部尚书等重要职务。台湾林爽文起义平定后，“上念福长安书谕宣勤，列二十功臣，绘像紫光阁。”尼泊尔廓尔喀乱平，他又被列为十五功臣，因为福长安“尽心襄赞，因国事为重。”实际上这两次战役福长安都没亲临前线，只因为他的二哥福康安都是统帅，他便借光成为“功臣”。

福长安有大学士和珅的指挥与合作，在清宫廷的政治生活中混迹多年，也算得上是一位有头有脸的朝官。而和珅在乾隆年间更是一帆风顺，高官做遍，培植亲信，网罗党羽，贪污受贿，颐指气使，成为全国首富和最大的贪官。

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乾隆太上皇病逝。嘉庆皇帝颤琰当机立断，于初四日即褫夺和珅军机大臣和九门提督两个职务，命他与福长安只能守值殡殿，不能任意出入。

四月初八，嘉庆帝颁布一道谕旨，宣布革除和珅和福长安的职务。令刑部逮捕、收禁和查抄和珅和福长安的家产。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和珅犯罪案》中，列有一份查抄和珅家产的清单，详细记录抄没和珅家产的情况。其中有一条载明：“钦赐花园一所（楼台六十四座，四角楼、更楼十二座，更夫一百二十名）。”

五月十五日，嘉庆帝正式公布和珅的二十大罪状。三天后下达处死和珅的上谕：“姑念其曾任首辅大臣，于万无可贷之中，免其肆市。和珅着加恩赐令自尽。”

嘉庆帝将福长安与和珅作为同案处理。他看到《查抄福长安家产清单》后，说：“现在查抄伊家资物，虽不及和珅金银珠宝数逾千万，但非伊家之所有。其贪黩昧良，仅居和珅之次，并着一并议罪。”

《查抄福长安家产清单》里，列有一条文字：

“现查得福长安花园一所，共计房六百七十四间，游廊、楼亭共二百八十三间，（另一份材料还有记载：‘看园内监十九名，家人男妇三十六名。’）系奉旨恩赏。”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历史资料，联系其他资料，我们可以做出以下几项认识和判断：第一、福长安有一座规模很大的花园。此园只能是乾隆皇帝所赐。因为福长安生活在乾隆年间；嘉庆帝早就识破了和坤的政治野心，不会做出这种傻事来。

第二、春熙院是三山五园里最不受重视的一座。乾隆帝游历的次数也不算多。查遍嘉庆帝皇子时的诗集《味余书屋诗集》和《嘉庆御制诗集》竟然没有查到一首春熙院诗。弘历在乾隆五十三年来园写过一首《鹤来轩》诗以后，就不再见他写的春熙院诗了。从此以后，春熙院基本被闲置起来。乾隆帝在嘉庆元年十二月四日，观看和珅、福长安关于春熙院春润堂等处修补工程工料银的奏折以后，心目中春熙院这座御园似乎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第三、弘历已经当了三年太上皇，成为高龄老人了，身体状况大不如前。很难再能经常游园到山上山下多处奔波。乘机将不常去的较小的园林赐予最近的亲信，也是一种奖励。

第四、福长安家产中的御赐花园有房 674 间。如今所有资料中没见过春熙院房间的具体数目。但是根据组成春熙院的春和园、鸣鹤园、镜春园的统计，虽然由于传承演变使得房间数有所增减，但尚能大体相符。这三园房间的总数分别为 153 间、300 余间、174 间，共 600 余间。与福长安花园房间总数大体相合。这足以证明，福长安花园即是春熙院。

第五、乾隆年间，清廷有一项制度。每年十二月底，内务府都要将圆明园、长春园、熙春园、

绮春园、春熙院等五园全年修建殿宇、亭座等各项目工程费用进行查检核实，由和珅、福长安向乾隆帝奏报，皇帝必定要闻奏批复。如嘉庆元年十二月初四日，和珅、福长安呈报五园等处各类工程共销算物料工价银两万余西。所附《清单》还列举有春熙院实赏斋等处用工料银五百余两。又如嘉庆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丰绅殷德等率领司员履行查核工程五案，其中包括春熙院的工程在内，一并奏报。“奉旨，知道了，钦此。”这项奏折说明，乾隆皇帝在嘉庆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阅读内务府丰绅殷德等人的奏折，读到关于春熙院修整工程的内容。说明他还未将春熙院赐给福康安。嘉庆三年十二月底，弘历再过几天就去世了，内务府没写奏报。这说明，乾隆皇帝是在嘉庆三年将春熙院赐予福长安了。

第六、根据《查抄福长安家产清单》记载，御赐的福长安花园内，还有“看园内监十九名，家人男妇三十六名。”说明福长安一家已经在嘉庆三年搬进御赐花园入住。同时也证明春熙院不是嘉庆四年赐予福长安的。

嘉庆帝在查清福长安的家产以后，于嘉庆四年正月十八日降谕：“和珅种种悖妄专擅，罪大恶极，于法实无可贷。和珅现已从宽赐令自尽。福长安亦着从宽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并着监提福长安前往和珅监所，跪视和珅自尽后，再回本狱监禁。”

嘉庆帝处理和珅一案，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不搞株连。此案只牵涉到福长安一人。到这年八月，嘉庆帝鉴于已将福长安监禁半载，遂加恩将福长安释放，派去裕陵当差。福长安在官职中升迁沉浮，于嘉庆二十二年去世。

据故宫博物院《史料旬刊》第六期《嘉庆诛和珅案》记载，嘉庆四年二月十六日奉旨：“和珅

园内东段着赏成亲王永理；西段仍赏十公主十额驸丰绅殷德居住。”与此同时，也把福长安花园赐予三位皇子和公主。《史料旬刊》上《嘉庆诛和珅案》记载：“上谕，嘉庆四年二月十六日奉旨：福长安园内中段、西段着赏仪亲王永璇……福长安园东段着赏奕纯。”

福长安花园的西段和中段赐予仪亲王永璇。永璇的花园在哪里？在道光年间绘制的《圆明园外围大墙图》上，在南园（后划归绮春园）和红桥的东南方，标明“仪亲王花园”。瑞亲王奕詝是鸣鹤园的常客，他在《鸣鹤园记》里写道：“此园曾为余伯祖仪亲王赐第，居之数年。”“鸣鹤园在御园之南半里许，馆舍数百楹。树林阴翳，萃然佳美，洵别业中之佳地也。”这说明，永璇的赐园鸣鹤园位于绮春园之南半里许，即今北京大学校园北部。

原赐予永璇的福长安园的中段，在嘉庆十六年改赐予庆亲王永璘，称庆王园。但当时都通称春和园，连道光三十年样式房调查此园建筑景况时，也题作“绮春园前春和园”。永璘住在此园时，多组堂馆建筑的名称是春和园的老主人傅恒题写的旧名。

《大清会典事例》卷 1172 《内务府》载：“嘉庆七年奉旨：春熙院赏给庄静固伦公主。”这里所说，不会是春熙院的全部，而是春熙院的东段。因为此园的中段、西段，在嘉庆四年已经赐予永璇。东段曾赐予奕纯。只是在三年后又赐予了庄静固伦公主。这位嘉庆帝最宠爱的公主，在这座镜春园度过了新婚和以后的岁月。庄静固伦公主于嘉庆十六年五月去世，葬于京西王佐村。这里便是海淀著名地名“公主坟”。

嘉庆帝把福长安园分解为三部分，西段、中

段、东段都建成了皇子和公主的新园。西段鸣鹤园、中段春和园、东段镜春园，都是建在今北京大学校园北部的皇家赐园。这证明了春熙院、福长安花园，是修建于不同时期的同一处园林。由淑春园改建的春熙院，应落在今北京大学校园北部是确定无疑的。

五、写在文后的一段话

在文后，我要引述一段短文，可以帮助读者进一步认识春熙院位置何在。

何瑜教授《圆明园之一春熙院遗址考辨及其他》一文的第二部分有一段话：

“嘉庆四年二月十六日奉旨：‘福长安园内中段、西段著赏仪亲王永璇；其和珅园内东段著赏成亲王永理；西段仍赏十公主十额驸丰绅殷德居住；现在仪亲王所住之含晖园，著赏三公主三额驸索特诺木多布斋；其自得园三所，著赏定亲王绵恩、绵懿、奕纶分住；至福长安园内东段著赏奕纯。钦此。’这段史料非常重要，它提示我们嘉庆四年，在嘉庆帝诛杀和珅、处置福长安之前，今北京大学最北部，是福长安的赐园。”

这里引用不短的有关此地皇家园林的位置及其座落变动的情况。最重要的还是文中最后所作的精彩结论：“今北京大学最北部，是福长安的赐园。”我在前边论述中已经证明：福长安花园就是春熙院，春熙院就是座落在北京大学校园北部。



清人所绘畅春园局部（林琳供图）

御苑属园养花园

王密林

光绪十四年（1888），慈禧太后以“颐养冲和”为名，在清漪园的故址兴建颐和园。同时，一些为帝后驻跸颐和园时服务的宫廷机构和政府派出机构如意馆、升平署、军机处公所、外务部公所等附属建筑也陆续开始兴建。当年在自得园的遗址上兴建养花园，为颐和园培植和供应各类珍贵花木，以为御园服务。养花园完全承袭了自得园的旧有规模，占地面积为167796平方米。类似这样的附属园林，颐和园不止一处，还有位于东宫门外以北的南花园，因为功能相同，且养花园又位于南花园之东，在当年的一些颐和园地图上，养花园又曾被标称“东花园”。

根据光绪年间的《养花园靠同庆街东段添修车库房图样》，这座新建的养花园在自得园西北侧春和堂旧址的附近，修建有东西并列的两组由正房、东西厢房、倒座房和后罩房构成的三进院落，文献中称为“东所”“西所”，是养花园管理机构的驻地。又在院东建有五大排冬季养花的花洞，东侧墙外也建有一处花洞，分别称“上洞子花园”和“下洞子花园”。为方便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乘车来园，除在东宫门外修建辇库外，更

在养花园靠近同庆街东段的东南隅修建车库房。这是一处由一道长墙围绕起来的长方形院落，分为两个部分，靠西的院落在北西南三面各建有长排的车库房和值房，靠东的院落中没有任何建筑，当系停放车马的场地，仍沿袭了咸丰庚申年（1860）以前的御马圈的功能。除此之外，养花园内还残存及新建了一些园林景观，园中的景致虽不如自得园盛时，但也颇为秀丽可观。

养花园的兴建略晚于颐园内的主要建筑，开始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底。据当年《颐和园工程清单》记载，养花园在十二月十一日至十八日间主要建筑已“成做大木”，就是说房屋的木质梁架结构已经建好。到光绪十七年（1891）正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九日，养花园的“各值房、正房均成作大木”。四月初一日至初五日，《工程单》又记“养花园东所正房筑打房厢灰土，南方安砌南房前后檐，安砌压石石料灌浆”。七月十六日至十九日，“养花园南房竖立大木，安钉椽木活板，成砌山檐墙、后檐墙，游廊并西院东西厢房、耳房，外院西厢房内，均筑打灰土，各座成砌坎墙、墁地面砖，院墙成砌墙身，花洞耳

房院墙地脚刨槽，筑打灰土，码砌磉墩，安砌柱顶石，花洞院墙地脚筑打灰土”。十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养花园游廊砖磉墩安柱顶，埋头等石灌浆花洞钉椽木、铺苇箔已齐，随苫灰泥脊”。养花园的主体建筑在这一年基本完工。

光绪十八年（1892），又开始养花园附属建筑车马库的修建：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五日的《颐和园工程清单》记载，“……养花园迤南车库二座，南一座成作外檐装修，北一座竖立大木，签钉椽木活板”。十九年（1893）正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养花园迤南车库二座，北一座苫灰脊，南一座成作外檐装修”。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养花园车库南座压面石占斧斤见细，北座调脊瓦，接砌后檐墙、东西大墙涵洞碗下柏木椿。各项值房南院房间披麻挂灰”。

至此，养花园的工程全部完工，据承办颐和园工程的机构“算房”的核算，养花园的工程造价为：养花园，银四万三千七百二十三两七分九厘；养花园花洞一座，银六万五千七百六十三两。

颐和园建成后，慈禧太后开始了园居生活。从此，养花园内的花匠每天都要将花木送进颐和园内，他们佩着木制腰牌，肩挑花盆从苇场门进颐和园，沿着湖岸走，将花盆放在水木自亲东侧的旁门外，再由太监搬进慈禧太后的寝宫乐寿堂。除了养花，原自得园内旧有的鹿圈也恢复了养鹿的功能，一如咸丰庚申年（1860）以前。直到宣统二年（1910）的十二月，因两宫不再驻跸颐和园，才“旨将自得园圈养鹿只拨交香山圈养”（《香山公园志》香山公园管理处编，2001年）。

养花园作为颐和园的属园，进入民国以后其归属起初是随着颐和园的产权而嬗变的。根据民国政府与逊清小朝廷订立的《清室优待条例》，颐和园仍属清室所有。民国十三年（1924）底，

民国政府废止旧的《清室优待条例》，重新订立章程。根据修订后的《清室优待条例》，颐和园收归民国政府所有。民国十五年（1926），时任京畿卫戍司令的王怀庆将颐和园归还逊清小朝廷。民国十七年（1928），国民政府派员来京接收颐和园，并交给北平特别市政府管理，是年8月，成立管理颐和园事务所，负责颐和园的日常管理，颐和园正式成为由政府管理的公园。养花园也自然而然地归管理颐和园事务所管辖，因长期疏于管理，建筑日渐圮废。根据当地流传的口碑，1934年左右，佟麟阁将军曾在养花园旧址建过一座小宅园——佟园，基本上沿用了养花园的建筑，没有多做改变。1941年，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建设总署督办殷同，在养花园旧址兴办“建设总署土木工程专科学校”（以下简称“工专”），养花园的旧有建筑被逐步拆除，今已一无所存。有幸的是，笔者近来收购了一批摄于1942年的老照片，其中尚可见昔日养花园建筑的孑遗，略存昔日御苑属园之吉光片羽。

图1所摄的主角的是“建设总署土木工程专科学校”教学楼（今中共中央党校南院90楼）的后身，在其右侧，孤零零地矗立着一座随墙门。所谓随墙门，是墙垣式门的一种，就是在墙上开个门洞，在门的上方或左右的墙上略作装饰，还模仿屋宇式门的形式，带个门楼，所以也被称为小门楼。结合照片题记和《养花园靠同庆街东段添修车库房图样》，可判定这座随墙门原系养花园上洞子花园北墙上的随墙门，此时的它早已失去旧有的功能，等待着被拆除的最终命运。

图2所摄是“工专”校址向北拓展前的景象，此时学校北部的农田还没有被纳入校园中，养花园北墙上旧有的如意门和学校新葺的围墙成为了背景。如意门是一种屋宇式大门，在建筑规格



图 1 (作者供图)



图 2 (作者供图)



图 3 (作者供图)



图 4 (作者供图)

上高于随墙门，构架多采用五檩硬山形式。如意门起源于唐代，到宋代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通用的门型，明清时期，广泛出现在宫殿、苑囿、庙宇等建筑中。

图 3 近景中的两座建筑，应为位于养花园西所后罩房西北角的残存部分，其后的远景中的建筑群则是颐和园升平署，并不属于养花园的

范围。

图 4 从位置分析，应为养花园东南角的车库房的广场，在井旁汲水农民的右侧，有一段虽残破但高大的砖墙，显然是车库房的外围墙。

这四处养花园建筑的残迹在照片拍摄不久即被拆除，这恐怕是目前所知仅存的颐和园养花园建筑的照片。

金河的前世今生

——三山五园地区历史水系钩沉诉今（一）

胡志芳

三山五园（万寿山、玉泉山、香山，颐和园、静明园、静宜园、圆明园、畅春园）地区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郊，是以清代皇家园林为代表的各历史时期文化遗产、山水形胜整体格局，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空间秩序的统称。“山水形胜”中水系是园林的基础，更是灵魂。在历史上，三山五园的水系发展与都城命运兴衰紧密相连。

三山五园地区水系格局历经多次兴盛与衰败，水域面积呈现明显阶段变化特征。金到明朝水域面积从2.5平方千米减少至1.21平方千米，清代水域面积增加至6.4平方千米，民国降低至4.48平方千米，现阶段又增加至5.1平方千米。其主要水系包括颐和园中的昆明湖、圆明园的福海、金河、南旱河、北旱河、万泉河、清河等。笔者从新晋的“网红”河道金河入笔，带大家来认识一下它的前世今生。

大家看到金河这个名字，首先会联想到紫禁城的金水河，事实上确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商周蓟城初立，历秦汉魏晋至隋唐的幽州城、辽南京直到金中都，城址均依古莲花池水系

为主。金中都选址即在莲花池的东面（因而当时的莲花池水系成为西湖）。但后来西湖已经无法满足京城御苑用水，为此，金代把西山诸多泉水（樱桃沟、碧云寺诸泉等）汇集到金海（即后来的昆明湖），又将金海加以疏浚，从金海的东南角开挖一条20余里的人工河，使金海湖水自此向东南而去，从都城西北角的会城门处的水门流入城内。因为河水来自西边的玉泉山和樱桃沟，而按照五行学说，西方属金，所以这条河便命名为金水河。这条金水河至元代兴建大都城时废弃。

元代为了解决皇宫用水，水利学家郭守敬重修金水河。引玉泉山水经西郊外火器营西、蓝靛厂西，至三虎桥南东流，于和义门（西直门）南水关入城，又东南经厂桥至积水潭（什刹海）南入皇城。《元史·河渠志》载：“金水河其源出宛平县玉泉山，流至和义门（今西直门）南水门入京城，故得金水河名。”元代对该河倍加保护，为涵养水源，至元十五年（1278）十二月下令“禁玉泉山樵采鱼弋”；为保持水质清洁，不被污染，明令“金水河濯手有禁”。为保证该河独流入城，



乾隆题的金河堤碑（作者供图）



金河俨然已是网红打卡地（作者供图）



不与其他河水相混，遇有河道交叉处要架设跨河跳槽。明、清时期金水河下游河道逐渐湮没，其上游保留至今即为金河。今天我们所称的紫禁城金水河为明清时的内、外两条金水河，由太液池而来。

明清时期，乾隆修建清漪园、疏浚金海（昆明湖）时，发现金代河道。乾隆利用金河原有河道修整加宽，连通高水湖、养水湖、泄水湖（清代开挖，已消失。大概位置在今天的北坞公园、两山公园），利用旧物建长河以解决京城用水之需。乾隆题的金河堤碑今尚完整，此碑是研究京西水利重要实物资料，为海淀区重点保护文物。

今金河河道起源于南旱河与万安东路相交处（万安公墓），终点汇入昆玉河，流经西洼、茶棚、北坞、中坞、后窑、船营等村，全长 5.20 公里。

近年来海淀区水务局先后多次治理金河。2008 年至 2010 年，为提高金河流域河道防洪泄流能力，降低污染水体对河道环境的威胁，优化玉泉地区环境，促进改地区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协调发展，决定实施金河北长河综合治理工程。该工程对金河全段河道开展清淤、浆砌石挡墙砌筑等。

2020 年至 2021 年，海淀区水务局实施金河生态治理工程，工程采用生态材料和传统工艺相

结合的生态工程做法，岸坡上采用竹条编织和松木桩护坡，水下挡墙采用片岩和松木桩，整体体现自然、生态、传统的工程技艺。在两岸局限的空间内，保护现状大树、层级消化高差、突出视线对景、丰富景观植被。三山五园文化元素绿道、中式传统纹样广场铺装、亲水平台栏杆上，展现三山五园片区的文化内涵。治理后的河道自然蜿蜒，通过南水北调生态用水补给水源，再现“重重似画，曲曲如屏”的河道风光，充分展现“三山五园”地区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如今的金河俨然已是网红打卡地。

三山五园水系是都城重要的水源地和古河道。金河作为玉泉水系的重要一脉，它的变迁见证了历史上王朝更迭、都城繁华衰落。今天金河的水系风貌再现盛景，是三山五园地区山水田园历史风貌画卷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系区水务局干部）

参考文献：

- 赵连稳，《清代三山五园地区水系的形成》《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 宋濂等《元史》卷64《河渠志·金水河》，卷10《元世祖七》，北京：中华书局1974版
- 海淀区水务局，《金河生态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

园林中的紫禁城

——论清帝园居理政

赵连稳

与前朝相比，清帝理政地点主要不是紫禁城，而是在位于今天北京海淀区的皇家苑囿——三山五园内。北京西郊，层峦叠嶂，泉水充沛，星罗棋布，一派江南风光。自辽金以来，统治者在此地陆续营建行宫别苑。至清代，这里陆续修建起了一批皇家苑囿，主要有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后改为颐和园），还有畅春园和圆明园，这就是著名的“三山五园”——清代西郊皇家苑囿的主体。居住、理政和游憩是清帝在三山五园的主要活动。清朝（1644—1911）存在的268年间，清帝多数时间均在三山五园理政，可见，三山五园是清朝的实际政治中心，是园林中的紫禁城。

一、三山五园中的理政建筑

为了方便上朝奏事、议事，清廷在建设三山五园的过程中，修建了许多皇帝理政和各部衙门办公场所，形成众星捧月的建筑景观。

（一）畅春园的理政建筑

康熙十六年（1677），修建香山行宫。十九

年，将玉泉山南麓改为行宫，命名为“澄心园”。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南巡归来，开始在明朝清华园废址上仿照江南园林修建畅春园，成为“京师第一名园”，也是清朝皇帝在西郊的第一处常年居住、避暑听政的离宫。据《日下旧闻考》记载，畅春园坐北朝南，园区南部为议政和居住用的宫殿部分，北部是以水景为主的园林部分。大宫门外东西各有五间朝房，门内正北的大殿叫“九经三事殿”，为大臣上朝、皇帝听政的地方，东路的澹宁居是康熙日常理政、引见与读书之所。

（二）圆明园的理政建筑

根据样式雷建筑图档，我们知道在圆明园南部，南起大宫门，北到“九州清晏”殿，分布着“外朝”“内寝”宫廷区。“外朝”宫廷区是皇帝处理内政外交的临朝听政之所，国家重大的政治决策，大部分产生在这里。

在“外朝”宫廷区内，有大宫门、金水桥、二宫门（出入贤良门）、正大光明殿、勤政亲贤

殿及各部院衙门和朝房等建筑。

大宫门有宫门5间，坐北向南，门前左右朝房各5间。其后，又各有朝房27间，设有清政府的办公机构，例如军机处、内阁房、六部朝房、都察院、翰林院、理藩院、南书房、银库、清茶房、膳房、堂档房、造办处、升平署、宫内他坦、八旗营房等。

外朝区的中心建筑是雍正皇帝亲笔题名的“正大光明”殿，殿堂7间，东西配殿各5间。正大光明殿东的“勤政亲贤”殿也叫“勤政殿”，建于雍正三年（1725），勤政殿为南向五间，殿前后各接抱厦三间，外檐悬挂着雍正帝御书的“勤政殿”匾，是“外朝”的重要殿宇，该殿是皇帝每日批阅奏章、召对群臣的地方。

紫禁城中的军机处在隆宗门内北边，军机大臣在此当值。圆明园军机处的直房在出入贤良门外御河之南，称军机堂，右边为满章京直房，左边为汉章京直房，“直务均与在宫之日同。”^①圆明园军机章京另外还有两处外直庐，曾经做过军机章京的梁章钜在《枢垣记略》卷14《规则二》中记载：“圆明园满、汉章京外直庐一在挂甲屯，一在冰窖，均系乾隆年间赏给居住。”^②挂甲屯的军机章京外直庐即是七峰别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记载军机章京值班时说：“若在圆明园……直务毕，则聚居于外直庐，所谓七峰别墅者也。”^③七峰别墅位于圆明园大宫门南边约200米处。冰窖的军机章京外直庐，即位于海淀老虎洞军机处胡同，胡同北口路西有一清代的冰窖，专供御园使用。汉族章京住在挂甲屯，满

族章京住在老虎洞军机处胡同。

（三）颐和园的理政建筑

颐和园也是一个兼具“宫”“苑”双重功能的大型皇家园林。乾隆十五年（1750），开始兴建颐和园，到乾隆二十九年建成。颐和园分为宫廷生活区和风景游览区。宫廷区包括勤政殿、怡春堂、玉澜堂、乐寿堂等建筑。勤政殿位于东宫门内正西，是七楹殿堂，雄伟高大，但乾隆在此听政并不多见，偶然在玉澜堂和鉴远堂处理朝政。玉澜堂在勤政殿西面，西邻昆明湖，坐北朝南，正殿面阔三间，东西耳房各两间。鉴远堂位于颐和园南湖岛南岸，坐南朝北，南侧临水，为五开间建筑，可凭窗南望昆明湖水和凤凰墩，乾隆在给住在畅春园的母后请安后常来此用膳和批阅奏折。



颐和园乐寿堂（林琳供图）

光绪十二年（1886），重修颐和园，到光绪二十一年完工。这次重修专门在颐和园东宫门内增加了皇帝上朝听政和与宫廷生活有关的建筑，即宫殿区和生活居住区，便于接见臣僚，处理朝

^① 梁章钜：《枢垣记略》卷13《规制一》，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6页。

^② 梁章钜：《枢垣记略》卷14《规制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8页。

^③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2页。

政。勤政殿改建为仁寿殿，供西太后垂帘听政使用，仁寿殿规模与形式和圆明园的“正大光明”殿相仿，南北对称地排列着九卿六部的朝房，分别为军机处、六部、九卿的值房。仁寿殿后是三座大型四合院：乐寿堂、玉澜堂和宜芸馆，分别为慈禧、光绪和后妃们居住的地方。大报恩延寿寺改建为排云殿，是西太后接受万寿节贺寿的地方。怡春堂改建为德和园大戏楼，是慈禧太后听戏的地方。它与故宫博物院畅音阁大戏楼、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内的清音阁大戏楼以及圆明园同乐园大戏楼，并称为清代四大戏楼。也是目前我国保存最完整、建筑规模最大的古戏楼，京剧演员谭鑫培、杨小楼都曾在此献艺，被喻为中国京剧艺术的摇篮。

（四）静宜园、静明园的理政建筑

乾隆十年（1745），乾隆皇帝在香山静宜园建造勤政殿。勤政殿位于静宜园东宫门内，是乾隆皇帝在静宜园驻跸临时处理政务、接见王公大臣的地方，取意“勤政务本、勤于思政”之意。乾隆在《勤政殿》诗序中就勤政殿的命名和作用有说明：“皇祖就西苑趯台之陂为瀛台以避暑，视事之所颜曰‘勤政’。皇考圆明园视事之殿，亦以勤政名之。予既以‘静宜’名是园，复建殿山麓，延见公卿百僚，取其自外来者，近而无登陟之劳也。晨披既勤，昼接靡倦，所行之政即皇祖、皇考之政，因寓意兹名，用自勖焉。”^①表明自己效仿康熙、雍正在西苑和圆明园建设勤政殿的做法，游园不忘政务。静宜园后面的致远斋

则是乾隆日常理政较多的一个场所，致远斋东边的小院便是军机处办公的地方。

玉泉山静明园也是清帝理政的场所之一，尽管在五园中属于皇帝理政最少的园子。其中的廓然大公、含晖堂、清音斋、创得斋、华滋馆等处，都是清帝“视事之所”。

二、清帝三山五园理政的主要内容

（一）清帝三山五园理政的时间分析

清帝在畅春园、圆明园和颐和园中理政的时间最长。自康熙二十六年（1687）起，康熙帝每年约有一半的时间居住在畅春园，直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病逝于园内清溪书屋。自雍正至咸丰5代皇帝150年间，有138年在圆明园理政，每年的春、夏、秋三季都在圆明园理政，冬季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回紫禁城，一般是每年的元宵节前夕，皇帝从紫禁城前往圆明园，随同前往的还有宫眷和大臣。圆明园成为紫禁城皇宫之外清朝的实际政治中枢。清末光绪朝的政治中心转移到了颐和园。

根据何瑜先生研究，康熙皇帝自二十六年后，直到去世，每年有150余天在畅春园居住理政；雍正帝自雍正三年八月，园居理政后，平均每年在圆明园210余天；乾隆帝的理政地点，除紫禁城、避暑山庄、南巡和东巡途中之外，年平均驻园明园120余天；嘉庆帝驻园明园时间，年均160余天；道光帝驻园明园时间，年均260余天，道光二十九年有闰月，其园居时间高达354天；咸丰帝在咸丰十年（1860）八月初八，逃往

^① 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86《国朝苑囿一·静宜园一》，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439页。

热河前，驻跸圆明园7年，年均时间也达210余天。^①光绪年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大部分时间也住在颐和园。在封建社会，皇帝所在就是朝廷所在，皇帝在哪里，哪里就是政治中心。雍正帝刚到圆明园理政就对吏部和兵部说过，“朕在圆明园，与宫中无异，凡应办之事，照常办理。尔等应奏者，不可迟误”^②并传旨总管太监，把紫禁城养心殿内的帽架留下两件外，其余全部移到圆明园使用。至于嘉庆帝则明言：“朕今驻跸圆明园，则相近地界，即與禁城无异。”^③

那么，清朝皇帝在御园中又是怎么理政的呢？

（二）清帝三山五园理政的主要内容

清帝在三山五园避喧听政，大凡引见大臣、御门听政、任命官吏，策试选士、勾决人犯、翰詹大考、阅试武举等例行政务、立储废储等重大事项以及许多重要的外事活动都在三山五园中处理。

1. 避喧听政

（1）处理日常政务

——御门听政。如清帝圆明园理政时期，主要在正大光明殿和勤政殿举行，五六天举行一次，凡部院有需陈奏的公事均要写好题本，首先交到内阁，由内阁汇总，届时大臣们依次奏事，皇帝决策。

——任命官吏。如康熙二十六年（1687）二月，9天之内3次驾临畅春园，其中一个工作便是决定曹禾担任国子监祭酒一事。

——处理亏欠。如康熙五十四年十二月初一

到十三日，有六日上朝，决定了几十件大事，其中初一日处理的是江宁、苏州两处织造曹寅和李煦亏欠织造银近八十二万两的奏折。

——处罚太监。如雍正四年（1726），针对太监家人违法事情多发的情况，诏谕直隶州县，太监家人如做非法之事，潜逃来京者，可直接行文内务府，按例发落，不必奏闻。

——处理灾情。如乾隆四十四年（1779）底，乾隆皇帝来到静宜园，看到阿桂从荆州抗洪前方呈进来的奏折，折子称荆州洪灾严重。乾隆帝对此事作出了具体的处理意见。

——考选官吏。自雍正朝开始，经常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考选庶吉士，合格者进入翰林院庶常馆。翰林詹事的考选也在圆明园举行。

——勾决犯人。每年秋审斩犯，都需要皇帝批准。雍正十一年，皇帝到圆明园洞明堂审阅秋审情实招册，并且诏谕刑部应该注意的问题。咸丰二年（1852）八月和九月，清帝在洞明堂勾到犯人。

——阅试武举。如康熙五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五日，康熙在畅春园内的西厂阅试武举，十三日，领侍卫内大臣、读卷官大学士松柱等参加，兵部侍郎党和托等人，上奏武举徐绶等170人分成11班，试其骑射，分其等次。第二天，第三天继续阅试，从170人选拔15人复射，根据成绩将前3人列为一甲，12人列为二甲，其余155人俱为三甲。康熙帝还诏谕，今后武生举人有愿改试文场者，文生举人有愿改试武场者俱听其便。

① 何瑜：《清代三山五园史事编年》（顺治—乾隆）自序，见《清代三山五园史事编年》，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版。

② 《清世宗实录》卷36，雍正三年八月壬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36页。

③ 《清仁宗实录》卷243，嘉庆十六年五月癸未，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74页。

——殿试传胪。道光二十四年（1844）以后，新进士复试均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进行，殿试传胪咸丰以后也多在圆明园中举行，咸丰十年（1860），把在紫禁城太和殿举行的殿试传胪大典移到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举行，咸丰帝在勤政殿召见阅卷人员，钦定新进士甲第。

2. 笼络少数民族上层

清朝时期，西北的蒙古问题和西南的藏族问题一直是清帝处理民族问题的重点，为了边疆的巩固，历代皇帝都十分重视笼络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康熙五十二年（1713）一月三十日，封五世班禅呼图克图为班禅额尔德尼，给以印信。此后，凡是班禅转世，都必须经朝廷册封。康熙皇帝还在畅春园九经三事殿上筵请蒙古王公大臣，《康熙起居注》记载康熙五十五年上元节，“十四日乙巳，午时，上御畅春园内九经三事，以上元节赐朝正外藩蒙古诸王，左翼科尔沁和硕达尔汗亲王和硕额驸罗普藏滚布，巴林多罗郡王固伦额驸乌尔袞，科尔沁多罗郡王伊西班牙第，翁牛特多罗郡王和硕额驸仓津……及内大臣、侍卫、大学士等宴。诸乐并作，上进酒。左翼科尔沁和硕达尔汗亲王和硕额驸罗普藏滚布，右翼科尔沁和硕亲王巴特马等近御座前，上亲赐饮……宴毕，众谢恩，上回宫。”^①

乾隆初年起，每年正月要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举行“上元三宴”，即正月十四日宗亲宴、十五日朝正外藩宴、十六日廷臣宴。其中，朝正外藩宴是宴赏来京朝贺新年的少数民族王公、首领。根据昭梿《啸亭杂录》记载：“国家威德远被，

大漠南北诸藩部无不尽隶版图。每年终，诸藩王贝勒更藩入朝，以尽执瑞之礼。上于除夕日宴于保和殿，一二品武臣咸侍座。新岁后三日，宴于紫光阁，上元日宴于正大光明殿，一品文武大臣皆入座，典甚巨也。”^②席间还表演庆隆舞、喜起舞等，典礼隆重。

清帝重视和西藏喇嘛教的关系。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帝八十寿辰时，班禅额尔德尼来北京向乾隆祝寿，乾隆专门为班禅在静宜园修建“宗镜大昭之庙”（即“昭庙”），乾隆在《昭庙六韵》中说：“昭庙缘何建，神僧来自遐。”是年八月，班禅在皇子永瑢陪同下，到圆明园、香山、万寿山游览，还到恩佑寺、万寿寺等寺庙礼拜佛祖。九月十五日，班禅到静宜园住了3天。九月十九日，乾隆和班禅在静宜园共同出席“宗镜大昭之庙”开光之礼，乾隆向班禅及章嘉呼图克图、敏卓尔呼图克图、喇过呼图克图、严加呼图克图等人颁赏物品。

乾隆还和三世章嘉呼图克图结下很深的友谊。早在雍正皇帝时，就把幼年的章嘉呼图克图接到皇宫，让弘历和他共同学习语言文字。乾隆元年令章嘉呼图克图掌管京师喇嘛寺庙和西郊万安山法海寺。乾隆十一年五月，皇帝驻跸香山时去法海寺会晤章嘉国师。乾隆经常在静宜园栖云楼和章嘉国师畅谈，他在《题栖云楼》诗注中说：“章嘉国师虽番僧，而清文、汉文无不精通。戒律精严，老城宿学，尝居法海寺。驻静宜园必召见此室，咨国语翻藏经事。偶谈禅理，深契三味。”^③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起居注》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244—2245页。

② 昭梿：《啸亭杂录》卷1《除夕上元筵宴外藩》，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75页。

③ 香山公园管理处：《清·乾隆皇帝咏香山静宜园御制诗》，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年版，第373页。

3. 处理重大事项

(1) 立储废储

康熙晚年，最让这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头痛的事情是接班人问题。康熙十四年，立皇后生的允礽为太子，这引起皇长子允禔的不满，逐渐形成皇长子党，和太子党水火不容，康熙将允禔革爵囚禁，也废了允礽的太子地位。不久，允禔与皇八子允禩结成“八爷党”，支持八爷做太子。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康熙帝在畅春园召集大臣商讨立储问题时说，除去大阿哥外，其余的任你们推举。于是，八爷党便推举允禩为皇太子人选，但遭到康熙的斥责。之后，康熙复立允礽为太子，不久又废黜之。此后，不再言立储事。

(2) 戊戌变法

光绪二十四年(1898)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这一年，光绪帝曾在颐和园仁寿殿接见维新思想家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谈了4个小时。为取得慈禧的支持，从4月到9月，光绪到颐和园向慈禧汇报请示变法事宜达19次。慈禧起初是支持变法的，认为这次变法内容比以前的维新活动说到点子上。费行简《慈禧太后传信录》载，变法之初，慈禧太后对光绪帝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①但是由于后来改革的矛头指向慈禧，导致慈禧反目，光绪帝感到大事不妙，9月16日，于玉澜堂接见袁世凯，让他支持变法。9月18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透露皇上希望袁

世凯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太后住的颐和园，袁世凯认为这是以卵击石，表面答应，在荣禄包围紫禁城后，向荣禄全盘告密。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在一番斥责光绪帝忘恩负义后，将其囚禁于中南海瀛台，变法失败。

(3) 清末“新政”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二十一日清晨，慈禧太后一副汉族老妇人的打扮，匆忙从故宫逃出，在颐和园东宫门站着喝了碗粥，便向西逃跑。狼狈之余，痛定思痛，次年宣布实行“新政”。光绪二十八年，慈禧回銮，此后一直居住在颐和园，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离开。撤销原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设外务部，编练“新军”，废科举，兴学堂，改革官制，整顿吏治，振兴商务，奖励实业。这些“新政”大都是在颐和园中决定，从颐和园发布的。

光绪二十四年，奕訢病逝，朗润园(在今北京大学内)被充作内阁、军机处及诸王大臣会议之所，逢三、六、九日在此议政，到慈禧主导改革时，这里又成为王大臣讨论清末新政和推行预备立宪的地方。《十朝诗乘》载光绪丙午(1906)诏王大臣议官制于朗润园。^②余榮昌《故都变迁记略》《附录·朗润园议官制》曰：“光绪丙午，诏王大臣议官制于朗润园……是年八月，有诏改巡警部为民政部，户部为度支，兵部为陆军，刑部为法部，工部并商部为农工部，理藩院改部，大理寺为院，即朗润园所定也。”^③可见，朗润园已经成为当时清朝的政治中枢。

① 许指严：《史说慈禧》第8章《慈禧太后传信录》，辽宁，辽沈书社，1994年版，第419页。

② 龙顾山人：《十朝诗乘》卷24，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7页。

③ 余榮昌：《故都变迁记略》，《附录·朗润园议官制》，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194页。

4. 处理国际关系

三山五园不仅是清帝处理内政的地方，还是处理国际关系的主要场所。康熙五十九年（1720）十二月，康熙帝曾经在畅春园清溪书屋八次接见罗马教廷特使嘉禄，阐明清廷禁止天主教的态度。圆明园“正大光明”殿，除了平日的朝会听政之外，也是接待外国使臣的地方，清帝曾经在这里接待过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国家的使臣。雍正五年（1727），雍正皇帝接见葡萄牙使臣麦德乐。乾隆十八年（1753），乾隆皇帝又接见另一葡国使臣巴哲格。乾隆帝八十整寿时，朝鲜、安南、暹罗、琉球、廓尔喀五国遣使朝正庆贺，乾隆帝在圆明园宴请各国使臣，并命人带领游览圆明园。

乾隆五十八年，乾隆皇帝接见英使马嘎尔尼，把马嘎尔尼安排在宏雅园（即明代勺园）居住了5天。马嘎尔尼回国前夕说了一段著名的预言，“清帝国好比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班幸运的、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它胜过其临船的地方，只是它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有纪律和安全了。”^①

嘉庆二十一年（1816），英使阿美士德率领约600人的使团来华，居住在蝎子湖（集贤院），由于礼节纠纷，迟迟得不到咸丰帝的接见。至七月初五，负责接待的钦差大臣苏楞额、和世泰等人，谎奏英使可以遵守中国礼节觐见，于是，七月初七日，嘉庆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接见英使，可英使拒绝觐见，嘉庆大怒，令英使即日回国，并严惩接待官员。

咸丰十年（1860）八月，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八月初八，咸丰皇帝在圆明园勤政殿召开紧急会议，和大臣商讨对策，开了4个小时的会议，决定留下恭亲王等人与洋人谈判，皇帝带着一班人仓皇出逃避暑山庄去了。当他听到圆明园被焚毁的噩耗之后，当场口吐鲜血，旧病复发，不到一年就死于热河。

慈禧太后从西安返回北京后，加强对外交流，在颐和园东门外设立外务部公所。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四年，慈禧在颐和园仁寿殿接见外国使节少则几次，多则十几次。慈禧还允许外国使节的太太们参观自己的卧室，表明清朝的开明态度。

三、清帝三山五园理政的原因

清朝统治者不在紫禁城处理朝政，把紫禁城变成了象征意义上的政治中心，在其统治的268年间，有226年在三山五园理政，其原因是什么？

（一）游牧民族和大自然具有天然亲近感

满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以游牧为主，与大自然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感，突然进入北京的紫禁城，不但倍感炎热，而且受不了其中的封闭枯燥和束缚的宫廷生活。早在顺治七年（1650），摄政王多尔衮就命令加派直隶、山西、山东、浙江、河南、江南、江西、陕西、湖广等省地丁银249万余两，“输京师备工用”，准备择地筑城避暑。由于多尔衮早逝，更因为战争连绵，财力入不敷出，致使该计划搁置，清廷便把明代的南苑稍加修缮，使这里成为水草丰美，既可以渔猎、骑射又能够避暑理政的皇家园林。

（二）北京西郊的自然环境适合建筑皇家园林

自辽金以来，北京西郊即为风景名胜之区，

^① 张宝章：《海淀》第5章《—英使三驻北海淀》，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年版，第187页。

这里，秀美的西山以及西山余脉金山、玉泉山和瓮山逶迤连绵，层峦叠嶂，湖泊罗列，泉水充沛，山水衬映，具有江南水乡的山水自然景观。香山双清、玉乳泉和碧云寺卓锡泉、寿安山樱桃沟泉等丰沛的泉水流出西山后渗入地下，从玉泉山喷涌而出，西来的泉水与南来的万泉河水汇流于瓮山泊（西湖），湖水从此流入丹棱浜。明代著名书画家文征明用“十里青山行画里，双飞白鸟似江南”的诗句来吟颂西郊山水。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忘情地写下“雁被西风驱遣，人被西山留恋”的佳句。清代学者吴长元在《宸垣识略》一书中描写这一带，“流泉满道，或注荒地，或伏草径，或散漫尘沙间。春夏之交，晴云碧树，花香鸟声，秋则乱叶飘丹，冬则积雪凝素。”^①

北京西郊的气温低于南苑，更低于紫禁城，康熙十六年，便修建香山行宫，十九年，又开始修建玉泉山行宫“澄心园”，后来又修建畅春园。雍正、乾隆修建皇家苑囿更是达到高潮。

（三）良好的历史人文环境

远在辽金时代，当时的皇家贵戚就已经在北京西郊修建离宫别院，作为他们游玩息憩之地。在玉泉山下，辽代建有行宫，金代建有离宫芙蓉殿，元代建有昭化寺，明代在此修建华严寺和昭化寺，明武宗在瓮山泊畔建有钓台，除了皇家贵戚继续修建离宫别苑以外，当时的达官显宦和文人学士也开始营建自己的私家园林。在这些众多的私家园林中，最享盛誉的当数著名书画家米万钟所建的勺园和武清侯所建的清华园。

清华园又被称为“李园”，是第三代武清侯李诚铭所修建。谈迁《北游录》对此有明确记载：

“寻策蹇出西直门，十二里至海淀，则清华园。故武清伯李诚铭，以神祖元舅，余力治园。”^② 谈迁认为清华园是李伟的孙子李铭诚所建。明朝人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对清华园的建筑记载得稍微详细：“方十里，正中，挹海堂。堂北亭，署‘清雅’二字，明肃太后手书也。亭一望牡丹，石间之，芍药间之，濒于水则已。”^③

结合其他记载可知，清华园面积广阔，方圆约十里，园墙采用虎皮石墙，正堂为挹海堂，堂之北有明朝肃太后所题的“清雅亭”。园北有兜率桥，凌空架起。西北有高楼五楹，额名“青天白日”，为明神宗所书，楼上建平台，能够俯瞰玉泉诸山。

康熙帝决定在此基础上修建清朝第一个大型皇家苑囿——畅春园，既节省了财力，又加快了工程进度，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以三山五园为主的清代西郊皇家苑囿，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皇家园林，康熙帝修建的畅春园开清代园林之先河，深深影响了其后的承德避暑山庄、圆明园和颐和园等皇家园林。历朝清帝均效法康熙皇帝，在皇家苑囿中理政、居住和游憩，乾隆帝曾经说过：皇帝勤政之余也是要放松的。三山五园正好具有理政、居住和游憩的功能。三山五园集南北园林之大成，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它见证了清朝政治的跌宕起伏和清王朝的兴衰历程，承载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自豪与屈辱，是一部浓缩的大清史。

① 吴长元：《宸垣识略》卷11《范围》，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99页。

② 谈迁：《北游录·纪邮下》，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3页。

③ 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5《西城外·海淀》，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7—218页。

普会寺的兴废和观音寺大士古像之谜

李忠义

北京海淀区玉渊潭南路上过西三环中路普惠桥，往西约二三百米，即普惠寺南里，社区小花园可觅古刹普会寺遗址。此处存一级古银杏树株，前置1986年出土的八觚陀罗尼咒经幢，幢南立1994年王同祯先生撰《普会寺遗址碑记》。

自唐讫明，该地为玉河乡池水村，嘉靖甲寅御马监太监蔡秀重修普会寺后，土人呼其地为蔡公店（庄）。李廷相撰《古刹普会寺重修记》云：“池水村有寺曰普会，自宣德初所创……”。

《日下旧闻》补遗曰：“普会寺，辽之驻跸寺也”，《元一统志》又云：“驻跸寺……大唐宝刹寺也”。

普会寺是否大唐宝刹寺

明代李廷相撰“古刹普会寺



普会寺遗址（作者供图）

重修记”碑（现存北京五塔寺石

刻艺术博物馆），其碑略曰：

“都城阜成门外玉河乡池水村

有寺曰普会，自宣德初所创，

迄今一百三十余年，岁远乏葺，殿廊栋宇，方丈僧房，外围土壁，各有坍塌损坏。往来观望，无不嗟叹其颓，然未尝有修补之念者。嘉靖甲寅岁（1554），御用监太监西村蔡公秀恭建，预修善事，命御马监太监署惜薪司事世安杨公禄总摄坛仪……作始于乙卯（1555），讫于丙辰（1556），乃落其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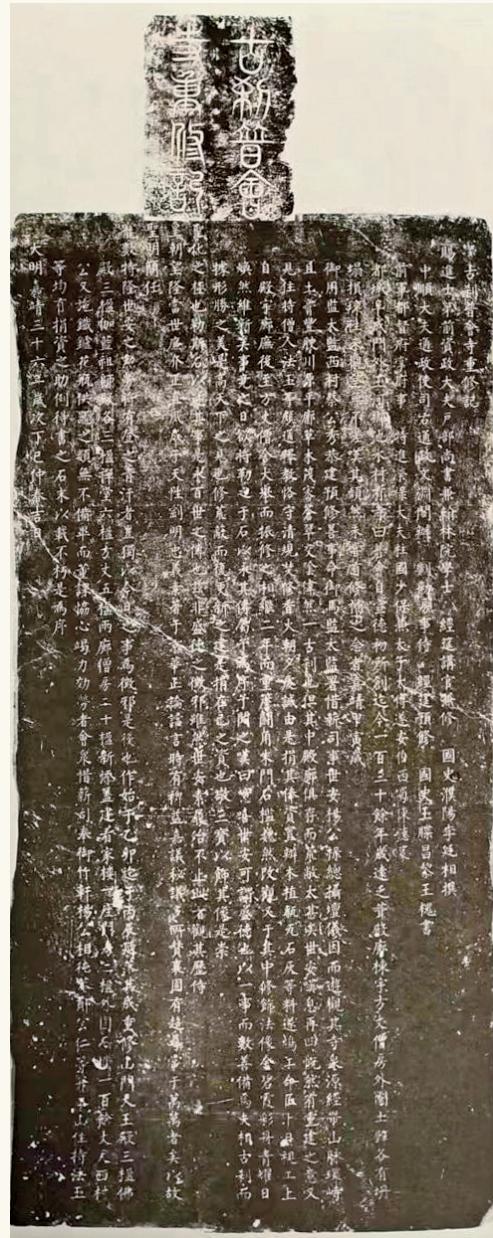
李廷相，字梦弼，濮阳人。明弘治十五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正德年间，宦官刘瑾专权，李廷相被改为兵部主事。直到刘瑾被诛才官复原职，升任春坊中允，充经筵讲官，武宗称赞他为真学士。历官南京吏部侍郎、户部尚书与其父李鑑同朝为官。

“古刹普会寺重修记”碑拓本十分清晰，载《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6册。^①文横20字格，纵52字格，约750余字，碑文中除谓“自宣德初所创”，均未提及普会寺兴废渊源。

康熙二十七年六峯閣雕板朱竹垞太史辑《日下旧闻》卷21，朱彝尊之子朱昆田引《咏归录》补记：“普会寺，辽之驻跸寺也，在玉河乡池水村。”

嘉靖甲寅，御马监太监蔡秀恭重建。土人呼其地为蔡公店。殿前石幢一，书大佛顶尊胜陀罗尼，后题大朝岁次己酉年十一月十七日宣差滨棣大使张巴舒新建王府下断公事官普元努立。未详时代。又嘉靖三十六年一碑，濮阳李廷相文，昌黎王槐书。铁钟一，隆庆二年四月造。殿后松一本，极苍古，意辽时所植也。松下石幢一，上镌沙门奉航塔记。”又补记：“辽驻跸寺沙门奉航幢记；师讳奉航，俗姓李氏，涿州新城县渠村人。幼入缁门（即僧门），访道寻师，就至燕京，左街驻跸寺礼祥玉上人为亲教焉。清宁元年（1055）受具。自后负笈游方，复归本寺，办修殿宇。大安五年（1089），涿州惠化寺

请为提点。寿昌二年（1096）秋九月，京北华严寺请为提点。乾统八年（1108）四月，迁化于驻



“古刹普会寺重修记”碑拓本（作者供图）

跸之本院，门弟子善坚葬之祖师莹侧，刻石为窣堵波（注：梵语佛塔），述师实行焉。”^②

^①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

^② （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清代于敏中等纂《日下旧闻考》卷 95，在朱昆田补记后按曰：“幢内大朝字虽未著时代，然考金泰和八年昌黎韩道升所撰五音篇海序内，有大朝字空格写，则大朝系当时习用之文。又考王府断公事官及宣使乃元时官制，元代凡两值己酉，前则为定宗四年（1249），其时未立国号，后则为武宗至大二年（1309）。今此幢记云大朝己酉，或当定宗未立国号之时，因称大朝，亦未可定。寺久圮，僧略葺数椽以居。石幢及李廷相碑皆断，置寺门外。殿后之松及僧奉航塔幢皆不可踪迹矣。”^③

南开大学教授何孝荣著《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第一章中记述：“驻跸寺，会同七年（944）改唐朝所建宝刹寺为驻跸寺，清宁年间僧奉航修。”又在第四章记述：“普会寺，嘉靖三十四年宦官蔡秀、杨禄等重建。寺在阜成门外玉河乡池水村。始建于唐朝，名宝刹寺。辽改额驻跸寺。宣德初，重建，改额……”^④

然（元）李兰胎等撰、赵万里校辑《元一统志》卷一原文记载：“驻跸寺，在大都丽正门外西南三里旧城施仁关，大唐宝刹寺也。有幽州大都督府宝刹寺禅和尚碑铭，元和七年（812）五月所建。禅和尚，西方吐火罗国人。姓罗氏，讳普照。首于城东依水木之胜作为净宇，贞元初（785-789）赐寺额曰宝刹，佛宫僧舍，几至千室。至辽初銮輿多驻跸此地，乃旌改其名曰驻跸。会同七年甲辰岁（944）也。”^⑤

《元一统志》所记驻跸寺，从时间沿革上看似乎普会寺即大唐之宝刹寺。但所记位置“旧城施仁关”“首于城东”，与玉河乡池水村相去甚远。完全不吻合。旧城施仁关系金中都城东面的施仁门，位置约在今西城区虎坊桥一带，实为金中都城之东。而玉河乡池水村在金中都城之东彰义门外的西北面。因此，关于玉河乡池水村普会寺兴废之故，谓其前身是辽驻跸寺比较确凿，但云乃“大唐之宝刹寺”仍存疑。

观音寺大士古像之谜

西郊玉河乡池水村不仅有普会寺，还有另一座古寺——观音寺。《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 52 册，有（明）程敏政撰《重建观音寺记》碑拓片。拓片右下侧说明：观音寺碑（京 5663），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七月刻。碑在北京海淀区蔡公庄。拓片阳碑身高 195 厘米，宽 87 厘米；额高 45 厘米，宽 28 厘米。碑阴身高 174 厘米，宽 88 厘米；额高 40 厘米，宽 30 厘米。程敏政撰，全泰正书，周洪谟篆额。阴题名，额正书题：“檀越芳名”。^⑥

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寺庙历史资料》（档案 J181-15-119）载：观音寺，坐落西郊二分署蔡公庄六号，建于明成化二十二年，清乾隆二十三年私资重建。本庙面积共庙地基 17 亩、土房 4 间。管理及使用状况为管理收支略维持本寺生活现状并资烧香。庙内法物有铁五供 1 堂、小铁钟 1 口、另有槐树 1 棵、石碑两座、水井 1 眼、松树

③ （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④ 何孝荣著《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

⑤ （元）李兰胎等撰、赵万里校辑《元一统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6。

⑥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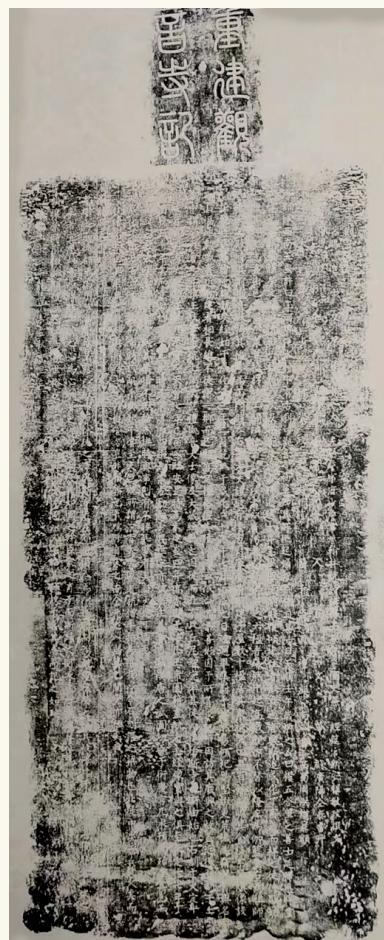
两棵。^⑦

《北京市海淀区地名志》在“政区聚落地名篇·玉渊潭乡”记述：“蔡公庄，位于玉渊潭宋庆龄儿童科学公园南，军事博物馆北，村形东西带状，占地1995亩……占地高程52米，西至万寿路，东至晾果厂村。”^⑧从该志玉渊潭乡地图上看，观音寺位于蔡公庄东部。证实《京西古迹寻觅图》作者张有信先生所谈：“玉渊潭公园周围有10多座庙，有好多清代的时候就已经没了。因此，能确定位置的一个都没有。为了探查究竟，余连续8次去玉河乡池水村，挨家挨户寻访七八十岁的老人，终于找出了这些庙的原址。比如：建于金代的观音寺就位于现在中央电视台办公楼的位置。”

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本《簧墩文集》卷16程敏政撰《重建观音寺记》略曰：“都城西南五里许曰玉河乡池水村，中有古刹曰观音寺。天顺壬午岁（1462），乡之人曰权五合里之善士，延释恩祥重作之，为祝釐禳禡之地。成佛殿六楹，将

以次及两廊，未就而祥逝。越十年矣，风駁(juan)雨削，殿复倾圮。迨成化丁酉岁（1477），而祥之徒德显始继其师之志，尽出己资，鸠工辟地。佛殿之六楹者岿然中起，左为伽蓝堂，右为祖师堂。天王殿峙其前，观音殿倚其后。外为山门，殿左右为方丈，钟鼓有楼，庖厨库藏有所，建子屋数十楹居其众，收民田二百余亩赡其食。栋宇翠焕，像设庄严，丹垩藻绘，争雄竞爽……予尝至天竺，见所谓沈香大士像者，杭僧率指为梁时物。以金石刻证之，则已北徙，中失于兵燹久矣，而杭僧不知也。呜呼……”^⑨

玉河乡池水村，明清时位于阜成门外京西古道旁，系清高宗弘历谒清世宗胤禛泰陵必经之地。乾隆帝对池水村观音大士古像的真伪提出了质疑。《日下旧闻考》卷95“御制程敏政重修观音寺记订讹文”略曰：朱彝尊著《日下旧闻》载，“玉河乡之观音寺所供奉观音大士像，谓自杭州天竺寺移来，而引程敏政记以实之……然《咸淳临安志》



“重修观音寺记”碑拓片(作者供图)

又谓僧道元逢金难时，秘大士于井，兵退知井所在，得像归之。《咸淳临安志》载：‘上天竺灵感观音寺，靖康初，属有金难，僧道元秘大士像于井，兵退，瓦砾中忽铿然有声，始知井所在，得像，归之院。’是疑案也，不

⑦ 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寺庙历史资料》[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

⑧ 海淀区地名志编辑委员会《北京市海淀区地名志》[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

⑨ 程敏政著《簧墩文集》[M]《四库全书》：第1252册，125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可以不辨……既求其非中之是，则吾以为仍在天竺者是，而玉河乡者非也。”^⑩

清高宗订讹的论据除引南宋杭州知府潜说友纂《咸淳临安志》之外，还有以下几点：一，乾隆六下江南，曾四次到上天竺谒拜，大士相好，宛存于心；二，曾命工匠刻二尊大士像供奉于御园宝相寺及玉泉山的清凉禅窟。还命奉宸苑诣玉河乡抬大士像至进行比对。观之，发现池水村的大士像长短丰瘠迥然不同天竺寺的大士像，且五色庄严，非所谓古木本色者也；三，“即以彼时事迹论之，兀术（《金史》名宗弼，本名斡啜，亦作斡出，或作晃斡出，元太祖阿骨打第四子）南下，欲得宋之土地及其货财，且金与元不同，元固蒙古信佛，金则不然，何必迁大士至北京乎？”^⑪

初刻于明嘉靖二十六年（明）田汝成辑《西湖游览志》卷十一载：“建炎四年，兀术入临安，高宗逊于海，兀术谒天竺，问知观音本始，乃举之舆中，与大藏

经并徙而北。时有比丘智完者率其徒以从。至燕，舍于都城之西南五里，曰玉河乡，建寺以奉。天竺之僧乃重以他木刻肖前像，诡曰：‘藏之井而出之’至今称观音出现井，其实非故物也。”^⑫

约编成于嘉靖末年（明）郎瑛撰《七修类稿》卷四十七载：“天竺观音像……今俗云沉香非也。《墨谈》以像为兀术取置燕之玉河乡，建寺名观音以奉，志云匿井，恐《墨谈》所考多真……”^⑬“志云”之志即指南宋潜说友纂《咸淳临安志》。《墨谈》指嘉靖己亥（1539）雕板，明陈霆撰《两山墨谈》一书。

明崇祯八年（1635）刊印的刘侗于奕正著《帝京景物略》卷之三“观音寺”记述：“杭州上天竺观音大士像，晋天福中僧道翊见瑞光，发洞得奇木，刻之。后汉乾佑年，僧从勋自洛阳奉佛舍利安大士顶。至宋建炎四年，兀术入临安，高宗逊于海。兀术闻知佛像所在，遂与玉帛图籍尽航而北，僧智完率徒以从，至燕

舍都城西南五里之玉河乡，建寺奉之。此观音寺也……今寺中所奉又非晋像矣。”^⑭

刘侗、于奕正所云杭上天竺观音大士古像来历，主要援引自宋代祝穆撰、其子祝洙增订的《方舆胜览》所载：“天竺观音像，石晋天福间，僧道翊一夕见山间光明，往视之，得奇木，乃命匠者孔仁谦刻观音像。会僧勋从洛阳持古佛舍利来，纳之顶间，妙像具足。”^⑮又援引自宋咸淳五年四明福泉沙门志磬撰《佛祖统纪》^⑯及（元）释觉岸撰《释氏稽古略》等佛家史籍。

上述记载都说杭上天竺寺观音已经不是古像，藏在井中的说法是“诡言”，并认定是金兀术运到了北方。五百年间玉河乡池水村观音寺经过了数次重建兴废，乾隆帝的订讹虽有一定道理，但其考辨之时距金大定十七年（1177）肇建已逾580年之久，距明成化年间重建也有270年历史，其间大士像的真假亦众说纷纭，故成了千古之谜。

⑩ （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⑪ （明）田汝成辑撰《西湖游览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⑫ （明）郎瑛撰《七修类稿》[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⑬ （明）刘侗、于奕正著《帝京景物略》[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

⑭ （宋）祝穆撰、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方舆胜览》[M]北京：中华书局，2003。

⑮ （宋）志磬撰、释道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田村关帝庙碑文与田村之名的由来

王崇锐



田村关帝庙（作者供图）

田村路路北景宜里小区南门有一座关帝庙，据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 J181-15-499）资料记载，此庙建于明朝成化年间，庙内有房屋三间，法物泥像三尊（即关公一位、配像两位，左边为关平站立捧印，右

边是周仓持刀侍卫）。2014年田村关帝庙被确定为海淀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虽然目前尚不对外开放，但透过围栏大致可以看出基本的建筑形态，该庙格局为坐北朝南，现存古建筑北房面阔三间，殿前有一通顺治十八

年所立的石碑，刻有《重修关圣帝君庙碑记》。碑文记载了重修关帝庙的事宜，碑阴则刻有捐资修庙的“阖村会众弟子”的详细名姓，现将碑记全文及译文附录如下：

“帝君之庙遍天下，而其英灵昭千古。夫以庙遍天下，则庙中之碑记巍然嶙峋者千古如斯也，碑记中之词章蝌蚪纵横者，犹千古如斯也。兹于天下中之一庙而勒之以石，于庙中之一石而纪之以文，无论一二言于帝君之英灵弗尽，即千万言于帝君之英灵仍弗尽也。颂帝君者不过曰精忠曰义勇，未足以尽帝君之心；即曰读《春秋》、明人伦，未足以尽帝君之学；即曰扶汉兴刘、灭吴吞魏，未足以尽帝君之事业。然则将何以颂帝君也？帝君之生平非可以文词尽，而帝君之

英灵未尝不在吾人自心中者。夫人虽甚无良，语之以忠义，未有不奋然兴；以人虽甚匪，语之以伦常，未有不肃然醒。帝君之庙遍天下，而有能对越无惭欵承罔歎者，则帝君之英灵倍显，帝君之覆庇倍笃矣！

京师西山之麓名田村者，旧有帝君庙，年远就圮，里人有感于帝君之英灵，而轮奂为之一新。或曰：帝君之庙貌遍天下，英灵未必耑驻于此。而兹里独奉之谨、尊之至，则帝君之英灵已常在里人自心中矣。自兹里人之祈祷立应，迓福无疆，何莫非常帝君之英灵覆庇之耶？里人鸠工事竣，请余纪其岁月，余何可以下文辞？

赐进士第文林郎翰林院侍讲充日讲官撰拟诰敕前秘书院简讨弘文院庶吉士加一级高密綦汝揖熏沐拜撰。

赐进士第四川道监察御史前巡按苏松常镇淮阳综核沿海将领省耕河南等处候内升京堂东莱李森先熏沐拜书。

时顺治十有八年岁在辛丑四月朔日谷旦立。

庙中座落伍亩，焚修住持光永。

译文：

供奉关帝的庙宇遍及天下，使其英灵流传千古。庙宇中石



重修关帝庙碑（作者供图）

刻、碑记也数量众多，长久以来都是这样；碑记中的文辞丰富多样，长久以来也是如此。在遍布天下的关帝庙的其中一间勒石刻碑，在这间庙中的一块石碑上撰写记述文章，用一两句话自然是无法说清关帝的英灵，哪怕

是用千言万语也道不尽关帝的功绩。以往颂扬关帝的人不过是从忠义、神勇而论，却不足以言尽关帝的德行品格；即从读《春秋》、明人伦的角度也不足以言尽关帝的学问；即使从扶汉兴刘、灭吴吞魏的角度同样无法

言尽关帝的功业。那么应该怎样颂扬关帝呢？虽然关帝的生平不能用文词来说清楚，但关帝的英灵始终都在我们的心中。一个人虽然没有什么德行，但告诉他要讲忠诚义气，没有不奋发然后兴起的；一个人虽然有些匪气，但告诉他要知伦理明纲常，也没有不恭敬然后自省的。关帝的庙宇遍及天下，如果能有接续不断虔诚颂扬的人，那么关帝的英灵将更加彰显，关帝的庇佑将加倍深厚！

京城西山的山脚有一个名叫田村的地方，旧时兴建有一座关帝庙，因年代久远，庙宇破落倾颓，村民在关帝英灵的感召下，合力重修殿堂使之焕然一新。有人说：关帝的庙宇及神像遍布天下，其英灵未必专门驻扎在这里。但村民对其虔诚祭祀，尊崇之至，那么关帝的英灵便已常在众人的心中了。当村民的祈求得到立刻回应，收受的福泽绵延不尽，这难道不正是关帝的英灵给予的庇护吗？村民在重修殿堂的工程竣工后，请我撰文记述其中的来由，我怎好推辞呢？

赐进士第文林郎翰林院侍讲充日讲官撰拟诰敕前秘书院简讨弘文院庶吉士加一级高密綦汝揖熏沐拜撰。

赐进士第四川道监察御史

前巡按苏松常镇淮阳综核沿海将领省耕河南等处候内升京堂东莱李森先熏沐拜书。

顺治十八年四月初一立。

寺庙坐落面积五亩，主持光永法师。

一、关帝庙碑文内容相关考述

在碑记中，作者对以何颂扬关帝进行了追问，“曰精忠曰义勇，未足以尽帝君之心”“曰读《春秋》、明人伦，未足以尽帝君之学”“曰扶汉兴刘、灭吴吞魏，未足以尽帝君之事业”，作者认为无论从道德、学问、事业，都无法言尽关帝的英灵。

“夫人虽甚无良，语之以忠义，未有不奋然兴；以人虽甚匪，语之以伦常，未有不肃然醒”。可以看出，时人对关帝的崇拜并不是我们现在基于现代科学主义观念所认为的迷信活动，作者主要从教化人心的角度对关帝崇拜的功能进行了阐述，即关帝代表着忠义伦常等统合于儒家教义的道德品质，对关帝的祭祀有助于明礼易俗，而不仅仅出于民众祈求神灵保佑的迷信心理。

为此碑书丹的是当时声名赫赫的李森先，他在顺治年间初任御史，平生以摧折豪恶、匡扶正义为己任，被称为清初御史第一人。撰此碑文的是綦汝揖，他

以进士入翰林院，28岁升国子监祭酒，终官内弘文院学士，居从二品，而在明清两代，国子监祭酒一般由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硕儒担任。两人可谓当朝名士，能为西郊一个村庄的关帝庙撰文刻碑足可见田村当时的影响和名气。重修的关帝庙面积坐落五亩，捐资刻碑的“会众弟子”逾125人，近40个姓氏，涵盖如此多姓氏，这其中未必全是本村村民，或许在当时围绕着田村关帝庙已经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祭祀会众组织，成员涵盖本村村民、附近村庄的民众以及可能有来自京西古煤道上的外来从业者。综合可以推断在清朝初年“田村”已是具有相当实力的大村，甚至可以说是十里八村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中心村落。

立碑时间为“顺治十有八年辛丑四月”，由“京师西山之麓名田村者”，可知在顺治十八年已有“田村”的称谓。这为澄清现今流传的关于田村之名由来的说法提供了实证史料。关于田村之名的由来，现今流传着“苦”改“田”的说法。1992年出版的《北京市海淀区地名志》对此亦有记载。乾隆皇帝改“苦村”为“田村”的说法尤其流行。据传很久以前田村是一片苦海，许多年后沧海变桑田，



区级文保标识（作者供图）

逐渐形成聚落，故称“苦村”，清代乾隆皇帝私访时路过此地，觉得“苦村”之名不雅，因而改为“甜村”，谐音为“田村”。另一说法与这则关于本名“苦村”的来源不同。清朝曾在阜成门外田村设置暂安处，供前往西山的灵柩暂时停放，因此地为帝后金棺停放之地，治丧期间哭主皆哀，村名被俗称为“哭村”，后谐音为“苦村”。为图吉祥，乾隆皇帝将苦村改称甜村，又谐音为“田村”。“阜成门外苦改田，骆驼山（即今田村山）下鞍暂安”亦应与此说有关。实际上，在清初顺治十八年已有“田村”之称，故此二说均不可取。

二、史书中的“田村”之名 经查证史料，明代沈榜在担

任顺天府宛平县知县期间留心时事，搜寻掌故，据县衙档案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编成《宛署杂记》一书，书中就有“田村”的记述，“县之正西有二道：一出阜成门，一出西直门……一道二里曰两家店、曰松林村、曰阮家村、曰田村，又七里曰黄村……一道自八里庄八里曰南田村……曰鲁国、曰南下庄、曰八角庄、曰古城村……又五里曰宫村，又三里曰杨家庄、曰北西安”，“离城约二十里”的田村有崇虚观一座。可以看到，当时不仅有田村，而且还有南田村，根据文中表述，南田村可能在今田村山以南一带。成书于明嘉靖年间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里也有关于田村的称

呼，阜成门外以西分“南中路”和“北中路”，北中路有“八里庄、西家店、西张华、半边店、东田村、东张华、西田村工村、石井村黄村、平果村、狼山、杨家庄、北营村、磨石口”，半边店即今半壁店，此时有东田村和西田村两个村庄，东田村即今田村，西田村应在田村以西紧邻龚村一带。据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成书的《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九十七所载，“田村有灵威观音庵、三官庙、宝峰庵”，灵威观音庵有“钟一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造、磬一正德六年（1511）造”，三观庙有两块碑，一为“明翰林院编修陈元晖撰，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立”，一为“同先格撰本朝康熙五十二年立”，宝峰庵有碑一为“明吏部尚书南海梁储撰正德十二年（1517）立”。最早的为观音庵中明正德六年（1511）所造之磬，而庙宇始建的时间则要更早。可见有史记载的田村历史已足有五百年之久，且当时至少已兴修四座庙宇，说明500年前明中叶时期田村已是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村庄。

三、关于“田村”之名由来的推测

关于田村之名的由来，我们或许应该从“田”字本身出发，

去追溯其由来。现在虽没有直接明确的史料记载,但明中期有东田村、西田村、南田村的表述,据此或可作一个推测,即:田村得名可能与明初的庄田制有关,划分庄田时将此处的地块以方位划分,分为“东田”“西田”“南田”“北田”,后逐渐发展成为村落。明代的庄田种类很多,有皇庄、诸王庄田、公主庄田、功臣与贵戚庄田、大臣庄田、中官庄田、寺观庄田等,北京乃皇亲国戚、勋臣阉宦聚集之地,京畿各类庄田特别集中,由庄田而成聚落的村庄不在少数,比如田村东北方的海淀“黄庄”及西南侧的石景山“黄庄”均由皇庄得名。明初在此地按方位划分庄田,有庄田就会有佃户,此地是京西古煤道上的重要路站,来往聚集落户的人多了,可能就慢慢形成聚落。当然这只是猜想,并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如果说因姓得名,田姓人家最初在此地居住,渐成大的村落,但反映在清初顺治十八年重修关帝庙时仅“田可耕”一人参与,田姓并不是主要姓氏或者说村内大姓,因姓得名的这种可能性很小。

地名是历史的产物,有些是数百年来约定俗成的,传说的“苦”改“田”虽然不是真实的

史实,但作为民间的附会之说,同样是一种历史真实的存在,曾寄托着田村地区居民对甜美生活的愿望和向往。昂首阔步新时代,新田村的居民正一步一步迈向甜而更甜的美好生活。

为田村关帝庙碑文丹书的清朝第一御史李森先

《清史稿》中有李森先的单独列传,此人的历史地位可见一斑。他是明崇祯年间的进士,山东掖县(今山东莱州)人,于顺治二年(1645年)被考选为监察御史。作为掌管风纪的御史,李森先直言敢谏、搏击豪强、兴利除弊。他“直声满天下”,被人誉为“真御史”,有“海忠介之风”,“顺治、康熙年间的御史第一人”。

清初,清廷启用明朝末年的阉党冯铨、谢升做了内院学士,执掌朝政,但二人收受明朝降将贿赂,放纵子弟为非作歹。李森先便上疏对此进行弹劾,直指冯铨倾覆明朝社稷,复犯清朝法度,所谓“明二百余年国祚,坏于忠贤,而忠贤当日杀戮贤良,通贿谋逆,皆成于铨”,意思是说明朝二百年天下毁在魏忠贤手上,而魏忠贤当时杀贤臣、通贿赂、谋逆的坏事,都是由冯铨促成的。“请戮冯铨父子于市以谢天下”,此疏词锋冷峻,轰

动了当时的朝野。但摄政王多尔衮信任冯铨,“以为无实迹”,反将李森先罢职。顺治帝亲政后,冯铨失势,因弹劾冯铨而获咎的官员均被起复,李森先因而得以官复原职。

顺治十三年(1656年),李森先以四川道监察御史身份出巡江南。当时,江南社会极为混乱,地痞流氓横行不法,豪强劣绅侵犯百姓,他首先弹劾罢了民愤极大的贪官淮安推官李子燮和苏州推官杨昌龄,接着又果断铲除了“苏州三害”。

所谓“三害”,一个是王紫稼,此人本为戏曲艺人,以其名声和机巧游走于官府人家,包揽词讼,平日花天酒地,淫污良家妇女不可数计,为苏州百姓所切齿痛恨,李森先详细访察得实,命人逮捕了王紫稼,枷死于苏州阊门之外。另一个是三遮和尚,以邪教诱惑良民,奸淫妇女。李森先逮捕杖打八十,与王紫稼相对枷死。还有一个是恶棍金又文,在虎丘搞选美大赛,他集中许多苏州名妓,像考进士一样,按照她们姿色高下,分授为状元、榜眼、探花,活动结束后,还要“画舫兰桡,倾城游宴”,搞得满城乌烟瘴气。李森先了解到此人在明末曾犯下杀人之罪,因明清鼎革而逃脱了惩罚,便将

其拘捕归案，重打八十，毙于狱中。“三害”之外，李森先“又置奸胥之十一人于法”。苏州百姓拍手称快，奔走相告，称李森先为“海瑞再世”。如此雷霆整顿，难免为奸佞报复，李森先不久就被江南劣绅诬告贪腐而下狱。押解回京时，苏州百姓士绅哭送李森先，数十里不绝。后经查实无罪，恢复官职。

顺治十五年（1658），皇帝下诏咨询言官不进谏的缘由。李森先上疏顺治帝请求赦免因建言获罪的谏官李呈祥等人，正是这道奏疏，让李森先再次丢官。据史载，顺治帝看了李森先的奏疏后极为恼火，斥责他“明系市恩徇情”，先是免官，后下狱，拟流放。后来顺治幡然醒悟，在流放之前赦免了他，又命吏部开列建言获罪的诸臣名单，分别进行宽容赦免，释放了李呈祥等人。

李森先后来被派往河南汝州查处垦田事件，因操劳过度，一生波澜起伏的他走到了人生的终点。观其一生的行迹，三次罢官，两次下狱，可谓屡遭坎坷。但他秉持信条、本志不变、初衷不改，终以“不愧朝廷，不愧百姓”自励，足以让后人景仰传颂。

为田村关帝庙撰文的皇帝

侍读綦汝楫

綦汝楫，字松友，号胶崖，山东高密人，生于明崇祯九年（1636年），卒于康熙八年（1669年）。顺治年间以进士入翰林院，终官内弘文院学士（从二品）。

綦汝楫天资聪颖，据说读书时过目成诵，作文一挥而就，有神童之称。有一天，他的老师王大椿外出之前，给綦汝楫和他的哥哥綦汝舟布置作业，要求背诵最难记的《黄历》，等老师归来，看到他们哥俩正在嬉闹，一时非常生气，就让他们两人背诵先前布置的作业，哥哥先背，只记住其中一半，綦汝楫后背，背到哥哥停下的地方他也停下了，老师比较疑惑就问其中的原因，原来綦汝楫先前一点也没背，只听哥哥背了一遍，便能背诵。所以哥哥背多少，他也就只能背多少。

顺治十一年（1654），綦汝楫在山东乡试中考取第39名举人，次年参加殿试，考中三甲第9名进士，年仅19岁。按照清朝的科举制度，殿试后的新进士，还要接着在保和殿参加朝考，内容是论、疏、诗各一道，试题由皇帝亲命，当日交卷，阅卷后，拟一、二、三等。清代翰林院设庶常馆，选拔新进士中优秀者入馆学习，一般选二甲进士

居多。綦汝楫因在朝考中以其出色的文学书法，受到顺治皇帝的青睐，而以三甲进士被顺治亲选为庶吉士同满汉一甲进士读书。

28岁担任国子监祭酒，为皇帝侍读

国子监是元明清三代国家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和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祭酒是国子监日常事务的管理者，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校长，一般由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当朝硕儒担任。康熙二年（1663年），綦汝楫升任国子监祭酒，当时他年仅28岁。康熙六年（1667年）二月升内弘文院学士，加一级诰授通奉大夫，官居从二品。后改任侍读学士，每日为皇帝讲解经书，回答皇帝咨询。九月撰修《世祖实录》，为副总裁官。

康熙七年（1668年），綦汝楫丁母忧回籍，不久33岁的他卒于故里，其卒之日离其母葬期仅有两天，时论惜之。在清初众多山东高密籍官员中，以綦汝楫的仕途最为人看好，可惜英年早逝，未能位列九卿。

綦汝楫擅长作诗和书法，“诗才清丽超逸，尤工五七言近体”，“诗赋在玉堂更卓然有称”，著有《诗草》二卷、《四友堂诗》二卷，清顺治间江西赵钥刊刻行世，诗作入选清末徐世

昌编纂的《晚晴簃詩汇》。抄其《游沼荷香》一诗，以窥一斑：“见说池塘胜，香荷照水湄。叶稠团晓露，藕细雪春丝。落日藏渔船，繁花到酒卮。采莲曾度曲，艳冶系人思。”他为田村关帝庙所作的《重修关圣帝君庙碑记》行文简洁，文辞雅驯，收放合度，正是后人得以鉴赏其才学的不可多得的遗世佳作。

参考资料：

1. (明) 沈榜：《宛署杂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
2. (明) 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年。
3. (清) 英廉：《钦定日下旧闻考》，影印版。
4. 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寺廟历史资料》，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
5. 田建春：《北京市海淀区地名志》，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年。
6. 双塔邨人：《海淀碑文录·田村关帝庙》，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2592330101atja.html

偏正词组中“的”“地”如何选用？

本刊编辑部

某书稿中说：“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是要最终实现诗意地栖居。”

这个句子中“诗意地栖居”里的“地”应该写作“的”。

在修饰语是双音节形容词、中心语是双音节动词的偏正词组中，修饰语后有时用“的”，有时用“地”。例如：

(1) 他详细地了解了这个村子的情况。

(2) 他对这个村子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了解。

一般地说，用“的”跟用“地”的规律大体是这样的：如果这个偏正词组处于主、宾语的位置，宜用“的”；如果这个偏正词组处于谓语的位置，宜用“地”。

在上面举出的例子中，(1)里的“详细 de 了解”处于谓语的位置，故而用“地”，(2)里的“详细 de 了解”处于宾语的位置，因此用“的”。

再如：

(3) 细致的分析，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在这个句子里，“细致 de 分析”是充当主语的，因此其中用“的”。

在“实现生态的活法、诗意地栖居”这个语言片段中，“实现”是动词，“生态的活法”跟“诗意地栖居”是两个并列的偏正词组，它们在这里都充当“实现”的宾语。因此其中的“de”宜用“的”。

——摘自《编辑工作中常见的字词问题》

访六郎庄村民胡玉珍 ——五塔寺战斗包扎所设在她家

王忠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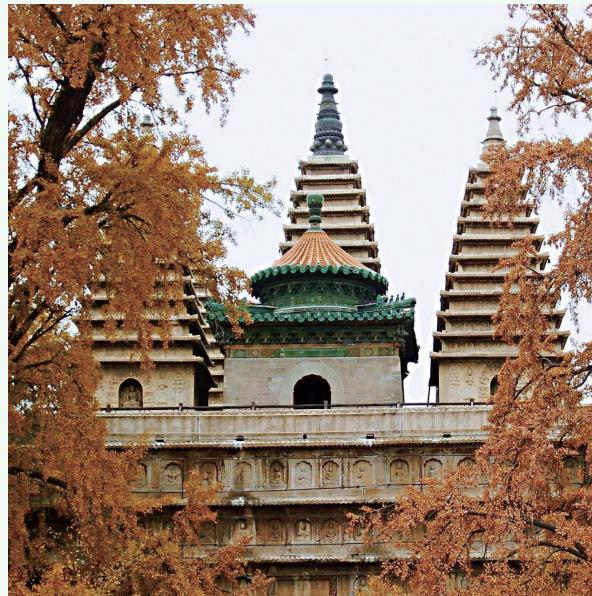
海淀六郎庄是一座有着幽深历史文韵的古村落，六郎庄大街是一条横贯村坊东西的大道。早年间大街两旁经营着不少商铺摊店，大街三号是临街靠东的一幢杂货铺，左右是闫家烧饼铺和何家剃头棚。

杂货铺门前的两棵大槐树枝繁叶茂，每当春天槐树开花的时节，满大街飘逸着沁人心脾的槐花清香。

这就是胡玉珍的家，五间南房三间北房两间西耳房围成了一座小院。她生活在这里见证了一段解放北平时的难忘经历。

2021年12月7号，六郎庄村史研究会指派郎玉明、王忠真、魏云波，专题采访了老共产党员胡玉珍。她回忆了四野包扎所设在她家的那段经历。

1948年12月的一天，溃逃的国民党兵流窜到六郎庄，闯进了胡玉珍的家。他们翻箱倒柜搜寻着值钱的东西和粮食，还要在房前屋檐下生火做饭。胡玉珍的父亲胡茂青嘟囔了几句怕失火点



五塔寺远景（林琳供图）

了房子，就遭到了国民党兵痞的呵斥恫吓。

这时从附近西郊机场传来爆炸声，人们看到冒起的股股浓烟。溃逃的国民党兵，不敢久留匆匆的逃走了！胡大姐一家幸运的躲过了一劫！

1948年12月13日，四野48军144师一部

进驻六郎庄。部队深夜入庄，席地而卧不敲门、不扰民。

清晨起早的胡大姐母亲，看见满院子铺满厚厚的积雪。她走到大门口推开街门，被眼前的场景惊呆。在大街村房的墙边犄角，躺着好多和枪而卧的士兵。他们身着灰绿色的军装，整齐的睡在大街两旁，战士们的身上和戴着的狗皮帽子上满是雪花。

原来头天深夜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48军431团的战士们为解放北平这座古城进驻了六郎庄。

12月15日，144师431团的战士们在张营长的带领下，深夜从六郎庄出发搜索着向西直门前进。他们去执行清缴北平四周国民党据点的任务，以实现“围而不打、和平解放”的目的。

四野的战士们在五塔寺与国民党军队遭遇，双方展开激烈的枪战。我军以伤亡40多人的代价占领了五塔寺，伤亡的战士们被运回设在驻地六郎庄的包扎所。

大街三号的院落，就在六郎庄进村不远的地方，临街的几间房院子又比较宽大。四野进驻六郎庄后，就在这里设立了医疗所也就是战时的包扎所。

胡玉珍一家住在院子的北屋里，南面宽敞点的五间铺面房供战时包扎所使用。

那天夜里六郎庄村民陈鸿恩、高凌祥、高凌材套着马车把受伤的战士和烈士的遗体运回了六郎庄。大家把伤员抬进包扎所，把牺牲的战士停放在村中的坡地上。

那时的胡玉珍年仅六岁，她哪见过这样的场面呀！满地的血、裸露的伤口、扎着纱布的头颅、渗着鲜血的军装。浑身是伤的战士、还在流着血的伤口、躺在炕上等待疗伤的伤员、躺在担架上

已经牺牲的连长和战士！那悲怆、惨烈的场面、那英雄的面孔、那咬紧牙关的坚持，至今都历历在目。胡大姐说：“那伤口看着都是撕心裂肺的痛，但屋子里的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喊疼！”

牺牲的战士们被安葬在六郎庄大后山的路旁，几十个长条形的土堆内安歇着为解放北平牺牲的烈士！

1966年，六郎庄贫下中农协会在中央党校派驻六郎庄四清工作队的协助下，决定修建六郎庄烈士墓，重新安葬为解放北平攻打五塔寺牺牲的烈士们的遗骸。

胡玉珍说：“这时我已是22岁了，是六郎庄村团总支组织委员，我参与了捡拾烈士遗骨修建六郎庄烈士墓的活动。”

是的！胡玉珍同志怀着崇敬的心情——不知道什么是苦、什么是累、什么是害怕！心里只有英雄，心里只有敬仰！

她一边捡拾着烈士的遗骨，一边心里默默地叨念着“张营长、李连长、同志们，你们安歇吧！你们的牺牲，换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你们是人民的英雄！”

在专访的最后，胡玉珍大姐深情的说道：“六郎庄村在解放战争中，为和平解放北京做出了贡献，这是六郎庄人的光荣与骄傲。我的家作为攻打五塔寺战斗的包扎所而载入史册，我参与了六郎庄烈士墓的修建，这是我们胡家也是我的光荣与骄傲！”

我也是在英雄精神的鼓舞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是有着58年党龄的老党员。我尊敬他们、怀念他们，我一直以他们为榜样努力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工作着。我虽然年龄大了，但是我的精神还在。我会用我的余生继续发光发热，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

盛德在民民祈之，功垂天下久弥恢 ——周恩来情系颐和园

唐 润

每当我走进颐和园时，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身影，他就是为人民无限热爱和无比崇敬的周恩来总理。他那和蔼可亲的面容，炯炯有神、充满智慧的眼睛，他那潇洒英俊、健步如飞、神采奕奕的形象仍然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装在我的心中，令我难以忘怀。我回想起周总理生前多次陪同外宾游览、参观颐和园，在听鹂馆餐厅宴请外国政要，或参加重大节日活动、或视察工作等的情景以及给我们留下的情系颐和园、富有深刻教育意义的许多逸事。

周恩来总理生前来颐和园的次数很多，据不完全统计约有三十四五次。其中，绝大多数是因公事而来。此外，也有几次是探望在颐和园中休养的亲人或民主党派的友人。但无论是公事还是私事，也不管是陪外宾来还是因其他活动来，他都以普通游人的身份，遵守公园的规章制度，如数买好公园门票，当面交给收票员，决不搞一点特殊。

解放初期，有几位中央领导和民主党派人士驻园休养，总理常来探望。有一次，总理进了颐和园刚走到仁寿殿时，突然停住脚步，转身问工作人员：“刚才

进园买了门票没有？”一位年轻的警卫员笑了笑说：“总理，您进园还买什么票呀！”总理看着这位年轻人，认真地说：“怎么，我就那么特殊，我为什么就不买票？你们不能让我脱离群众嘛！去，快买门票去。”一看总理那副认真的神情，知道这门票非买不可了，不买票总理就不会再往前走。于是，这位警卫人员赶紧到东宫门买了门票。总理见他真的买了门票并交给收票员，这才向德和园方向走去。

1963年秋天，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先生要调任回国，周总理在颐和园听鹂馆为他饯行。当天下午，警卫处的负责人和外

交部的干部提前去园里检查电话通知落实的情况，确定安排就绪后，四点钟他们就到颐和园东门等候总理一行，并提前买了门票。为了不使周总理一行在颐和园东门口耽误时间，就提前把门票交给了售票员。周总理一到东门口就问，门票呢？警卫人员说

已经交了，收票员也马上证明确实是交了。周总理看了那位警卫员说：“你不应该提前交票，这里那么多群众都看着我们进门，没有看到我们交门票，这样影响不好。”那位同志听到总理批评之后，立刻说：“总理，我下次一定注意改。”

1965年5月，周总理陪同一位外宾到颐和园参观游览。当总理陪着外宾入园时，先问身边的工作人员买票了没有？外交部工作人员说，买好了。总理说：

“一定要买门票才能进园，这是公园的制度，我们也要遵守。”总理说完，便满意地陪外宾走进公园。

这些事看来很平凡，但从中折射出周总理的崇高品德：位高而不忘自己是普通人，心里总是想着人民，从不搞一点特殊。凡是他去任何一座公园都是这么做的，即便他去公园参加游园会，总理也是主动出示游园会的请柬入园，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

通游人。周总理不仅到公园这么做，就是到北京剧场看戏，或是到北京饭店理发都是自己掏钱买票，从不搞特殊。甚至连坐汽车的汽油钱，都嘱咐司机师傅先记下来，到底一块付款。这就是我们所热爱的和深深怀念的周总理啊！

二

我们的周总理在世时，总是以普通的党员身份严格要求自己，不但不搞特殊，同时作为一国的总理，无论何时何地，也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他心里总是装着人民、尊重人民、融于人民，绝不脱离人民群众，并且还谆谆教导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广大干部。周总理这种高尚品德，表现在各方面，仅从他来颐和园陪外宾游览参观时发生的几件事情中就可窥见一斑。

建国初期，因敌特活动还比较猖狂，我们的警卫形式搞的比较森严。如果中央领导外出，总是布置很多警卫力量，有前卫、后卫，两侧均有警力护着。一次，周总理和邓颖超一起到颐和园游览参观，进园之后，游人一下子认出了周总理夫妇，立刻拥过来。这时警卫人员开始用力驱散拥上来的群众以保护总理夫妇。这个举动被总理发现了，立刻对警卫人员进行了严厉批评，

说：“你们为什么限制群众的自由？人家来游园，干涉群众是错误的。过去战争年代我们生活在群众中，群众掩护了我们，什么都不怕，打垮了国民党蒋介石。今天人民群众见到了自己的总理，你们反倒把我和群众隔开了，你们这是帮倒忙，让我脱离群众嘛！”总理的批评，使警卫人员认识到党的领袖和人民群众的鱼水之情，也使他们感受到总理与人民群众的情谊是多么深啊！后来，凡是总理外出或陪外宾来园时，都按总理的教导，在努力做到不过多限制群众自由并注意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让总理更多地接触广大群众，与群众握手交谈。

1957年5月，周总理陪同缅甸议长肖恢塔游览颐和园，乘船游览昆明湖之后，从石舫登岸去听鹂馆。那天游人很多，沿湖路又窄，人们争着要看总理，拥挤不堪。这时颐和园的一位工作人员怕挤着总理，就在总理身前用手推开游人。总理小声跟这位工作人员说：“不要推人。”说完，总理高声地对游人说：“有客人，请大家让一让。”话音刚落，拥挤的人群就松动了，闪出一条道，让总理和外宾顺畅地进入听鹂馆。这件事已过了很多年，但颐和园的这位工作人员仍

记忆犹新，并使他懂得了作为一位工作人员要时刻注意尊重游人、尊重群众。

周总理热爱人民群众，关心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表现在各个方面。除了上述两件事外，还有不少生动感人的事例。

1958年初春的一天，周总理到中国话剧院看演出，看完已是深夜，他还留下来和演员亲切交谈，语重心长地说：“……不要老在城里演了。现在农村正在起着重大的变化，你们应该去，马上去……”当总理听到演员们回答道：“我们马上就去，到农村去”的时候，他高兴而爽朗地笑了。总理上车时又回过头来说：“只要你们努力反映现实斗争，哪怕就是搞出一个活报剧，我也要来看的。”周总理的嘱咐，说得每个演员的心里热乎乎的。

到了这年的秋天，中国话剧团的演员们从农村满载而归，回到了北京。不久，他们来到颐和园的一个不大的四合院。周总理在这里亲切地接见了这些刚从农村体验生活归来的演员们。总理坐在一张普通的木凳上，耐心地听演员汇报下乡的收获，并看了他们新创作的节目。尽管戏还比较粗糙，但总理看了却非常高

兴，发出一阵阵爽朗的笑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之后，总理还邀请演员一起畅游颐和园，漫步在来来往往的人民群众中，不时地向群众打招呼。当来到排云殿前时，总理又步伐矫健地快步登上排云殿，同演员们并肩站在一起，他们时而深情地俯瞰碧波荡漾的昆明湖，时而极目远眺一片黛绿的西山。这一天，总理身边的警卫员很少，可是，我们的周总理知道千百万人民群众筑成的钢铁长城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最好保卫。

周恩来总理心里装着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事迹，最使我们难以忘怀的要数总理陪同巴基斯坦贵宾到颐和园参观游览时发生的一件事。

1965年5月一天下午，周总理陪同巴基斯坦贵宾来到颐和园。跟随总理来的有外交部的王炳南和陈毅夫人张茜等官员，还有警卫人员、记者以及贵宾的随行人员。众人分坐三条游船从玉澜堂码头起航。负责导游和解说的颐和园女职工小张也登上船，与总理和贵宾同乘一条船。大家坐好之后，游船徐徐地向南湖岛方向划去。这一日，天晴气朗、碧水涟漪、白云飘渺、青山如黛，亭亭玉立的玉泉山在斜阳的映照下，更显得妩媚神

奇。而那有“苏堤”美称的西堤宛如一条翠带镶嵌在昆明湖畔，摇曳多姿的垂柳翩翩起舞，仿佛迎着客人的到来。啊！这么好的景致，引得我们的总理和贵宾格外兴奋起来。当船快划到十七孔桥时，周总理笑着邀请小张说：

“给我们唱支歌好吗？”小张这位普通颐和园的女职工是第一次为周总理作导游，一听到总理邀请她唱歌，她有点紧张，因为她平时很少唱歌，更不用说在这种场合了。但当她看到总理那微笑的面容和渴望的眼神时，这位年轻泼辣的山东姑娘立刻回答说：“好吧，我今天就给总理和贵宾朋友们唱一首电影《红日》的插曲吧。”说完，她扬起头放声唱道：“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朵朵白云绕山间，一片片梯田一层层绿，一阵阵歌声随风传。哎，谁不说俺家乡好，得儿呦，依儿呦……”。清脆甜美的歌声伴着桨声和风声，在昆明湖上飘荡，随着柔和的春风传向远方，将人们的心思带到了麦浪滚滚的田野和层林尽染的山岗……我们的周总理面带微笑全神贯注地听着，好像在欣赏一位著名的歌唱家表演似的，他扬着头凝望着远处蜿蜒的青山和天上朵朵的白云，完全陶醉在这美妙动听的歌声中。这歌声仿佛把他带



夕阳里中的十七孔桥（林琳供图）



万寿山佛香阁（林琳供图）

到了过去的岁月，又把他的心绪引向美好的未来，驰骋在美丽富饶的神州大地上。

一阵掌声把总理的思绪带回来，总理立刻带头朝小张鼓掌，满意地说：“小张同志，你唱的很好么，谢谢你啊！”总理的夸奖，使小张不好意思起来，红着脸回到位子上。此时她心里热乎乎的，油然升起对总理的崇敬之情，感到莫大的荣幸。

黄昏时分，在无限美好的夕阳中，周总理陪贵宾游完昆明湖后，上岸来到听鹂馆餐厅，设宴招待巴基斯坦的贵宾。总理与贵宾在第一桌。王炳南、张茜等人在第二桌。小张考虑到总理还要在宴会上同外宾交谈大事，自己在场怕不方便，就没有进餐厅在外边等候。过一会，总理的秘书找到小张说：“总理找你，请你一同去吃饭。”（而船工师傅们被安排在另一

处用餐）一听说和总理一起用餐，小张特别激动，这是她一生中最荣幸的事，也是最令她难忘的大事啊！当总理看到小张进去后，非常高兴，热情地招呼她坐到第二桌。当所有的人员坐定之后，总理举杯站起来，首先向贵宾敬酒，然后总理走到第二桌，径直来到小张跟前说：“你辛苦了，谢谢你啊！”接着又问道：“小张，你是哪里人呀？”小张回答：“山东潍坊人。”总理听了笑着说：“山东人能喝酒，大方豪爽，来喝一杯！”在总理热情邀请下，从不喝酒的小张也爽快地陪着总理饮尽一杯，总理很高兴。小张被酒辣得脸都红了，抿着嘴，眼里闪动着幸福泪花。后来，王炳南告诉小张说为了此事总理还批评了他的秘书。总理批评道：“工作时想到人家，为什么吃饭时就把人家给忘了？”小张听了之后，又感

动地流下热泪，心里默默地想“多么好的总理啊！”周总理每次陪外宾进入宴会厅后，总要先询问向导和划船的同志们吃饭的问题安排好没有，直到身边工作人员告知安排好了之后，总理才放心陪客人用餐。这一次，总理仍然是这样做的。我们的周总理就是这样尊重人民、关心人民，无论何时何地总是把人民群众装在心里。

三

总理不仅尊重本国人民，爱护本国的人民，同样也尊重他国的人民，特别是对外国的贵宾更为敬重。因为这种尊重是代表我们的政府，代表国家的礼节、民族的素养和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他常常谆谆教导外交工作人员：外事工作无小事。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63年秋天，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要调任回国，周总理代表我国政府在颐和园听鹂馆

为他饯行。事先，有关负责人向总理汇报当天下午活动的安排：进园后，先在昆明湖划船，在船上谈话，约晚七时到听鹂馆举行宴会。宴会上安排有一个大冷盘，有酒、有饮料，四菜一汤，有主食、点心和水果。四点钟外交部的同志和一些警卫人员到颐和园东门外等候总理和外宾一行。周总理听后对行程的安排未提出异议，但对宴会上食谱的安排不满而严肃地说：“罗查大使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作为总理为他饯行，四菜一汤太寒碜了，办事情应当内外有别，我们内部的规定不适用外宾。”还说：“现在我们在经济上确实有困难，应当厉行节约，但该花的钱还是要花的，就是心痛得流泪也要花。你们立刻去和听鹂馆的负责同志商量一下，再加两道菜。”工作人员遵照总理的意见，立即去办。听鹂馆的负责人答应增加桂鱼和仔鸡两道菜，为周总理饯行罗查大使办了个丰盛的晚宴。

多少年之后，那位负责警卫工作的干部和外事人员回想起此事，仍然记忆犹新，颇为感慨。我们的周总理在任何工作上都那么认真细致，想得那么周到，在外事工作上更是一丝不苟。他的这种工作作风教育和培

养了一代优秀外交工作人员，也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

周总理尊重外宾、敬重客人，还表现在一次国庆游园会上。从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每年国庆节庆祝活动改在首都各大公园进行。在颐和园参加庆祝活动的人数最多，市属各单位组织的演出队表演内容也最丰富，常常有很多中央首长和外国政要来参加游园活动。因此，知名度也最高。

1971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二周年纪念日。那天，在颐和园有多处演出和活动。有唱歌的、有跳舞的，有唱京剧的，还有其他丰富多彩的游戏，热闹非凡。其中，颐和园五圣祠牌楼东侧有一处演出点。在此处参加演出的文艺队来自各部门。有教育口的中小学生，有商业口的职工，有工业口的工人，还有市交通局的宣传队等。负责这里演出的报幕员是市交通局宣传队的王娅。演出开始后，王娅上台报幕：现在由清河二小女同学表演舞蹈《鲜花献给毛主席》。当小姑娘们正表演时，忽然间人群沸腾，原来是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和叶剑英元帅等国家领导人陪同西哈努克亲王、莫尼克公主等贵宾走过来在前排入座。此刻，小学生

们的表演已经结束，报幕员正往下走。这时，周总理忽然把她叫到身边，询问了名字和年龄，然后，拍着她的肩小声说：“十七岁不算小了，该懂事了，刚才的节目你报的是《鲜花献给毛主席》，你看，我现在陪着谁来参加国庆游园的啊？应该把鲜花献给谁呀？”机灵聪明的王娅，一下子明白过来，立刻爽快地回答：“西哈努克亲王。”总理笑着说：“对！你再上台报一次，让小朋友再表演一回，行吗？”王娅连连点头，立刻组织小朋友们重返舞台。王娅以她那清脆的声音重新报幕：《鲜花献给西哈努克亲王》，台下即刻响起热烈的掌声。

西哈努克亲王听到自己的名字，兴奋地站起来、双手合十，频频点头致意。演出结束后，孩子们从台上跑下来，把一束束鲜花献给贵宾。亲王又满脸含笑再次致谢，显得格外高兴。

这件小事，再次体现周总理的外交思想：国家不分大小都要平等相待，予以尊重。总理的这一思想及举动，受到外国政要和友好人士的赞颂。尤其得到西哈努克亲王的高度赞扬和尊敬。后来，西哈努克亲王在自撰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他是我有幸认识的两位最杰出人物

之一……周可以担任任何国家的领导人并建立伟绩。他能吸引每一个人，极有教养，总是微笑……他使我感到我的小小柬埔寨和广大无垠的中国完全平等——同时他和我作为个人也平等。”“周恩来阁下是我一生中第一个伟大的朋友，我不会忘记他对我的恩情。”“像周总理这样高尚品德的人，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伟大的真正的朋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总理阁下。”

从新中国建立到周总理逝世的 27 年里，许多重要的外事活动，都是周总理代表国家在颐和园进行的。如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越南的胡志明主席、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等。周总理生前最后一次接见基辛格就是在这座古典园林进行的。这些重大的外交活动之所以选择颐和园，是我们周总理借以宣扬和展示颐和园的魅力、造园艺术的精湛美妙以及丰富的文化内涵，将它推向世界，让世界了解和认识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

四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周恩来逝世，他一直是我们国家的总理。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理，每时每刻都要处理国内外大事，

他既要胸怀祖国，又要放眼世界，洞察国内外政治风云瞬息万变；同时，他还要关怀亿万人生活中的小事和身边的事。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有时连饭都顾上吃，甚至一顿饭要断断续续吃几次才吃完，真可谓“一餐三吐哺，一沐三握发”！毛泽东曾称赞他：“周公确有吐握之劳。”“文革”期间，我们的总理更是如此，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常常通宵达旦，甚至两三天不眠，将生死置之度外、鞠躬尽瘁。

诚如一位诗人称赞道：“同志啊，你可知道，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办公室呵，灯光又亮了通宵……几十年如一日昼夜为我们操劳……一生睡的最少，最少！”

周总理生前因外事活动来颐和园次数很多，与颐和园结下了深厚的情意。他将爱倾注到颐和园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以及园里的广大干部和职工身上。

1964 年 7 月，周总理由上海返回北京，在西郊机场一下飞机就坐车径直来到颐和园。当他走到谐趣园时，看到荷花长势不茂盛，便问一位颐和园的职工：“是否和养鱼有关？”那位职工答道“有关系。”接着总理说：“如果养鱼和养荷花有矛盾，

谐趣园不必再养鱼了，要养好荷花。”之后，颐和园专门成立一个小组，负责控制水位，补植荷花良种，加强对荷花的管理。不久，谐趣园里的荷花又重新生气盎然、赏心悦目了。

周总理对园中其他湖上生长的荷花也给予关注。1969 年夏天，总理来到颐和园，发现昆明湖中的荷花长势不好。经过调查，他了解到影响荷花长势的原因是水位不稳。最早，昆明湖的水主要来源于玉泉山的泉水。后来，因地下水位下降，玉泉山已没有那么多的水可供给，于是，改由密云水库供给。这样一来，湖中水位忽高忽低。水库开闸时，湖面水位增高，闸门一关闭，水位又下降；还有每年雨季，带有大量泥沙的雨水从京密运河灌入昆明湖，又使湖底淤泥越积越高。这种情况长此下去，不仅影响荷花生长和游船的航行，还有可能使昆明湖变成烂泥塘。总理了解到这个情况后非常重视，多次提醒相关部门的领导，发出“要保护昆明湖，河湖要分流”的呼声。

在周总理亲自关怀和过问下，北京市委于 1974 年作出决定，一项河湖分流大型水利工程正式启动。在市委具体指导下，在颐和园西侧开挖一条约 3



昆明湖中的荷花（林琳供图）



颐和园排云殿（林琳供图）

米深、30米宽、4000米长的新河道，围绕昆明湖由北向东南流去。这样，每当雨季伴有大量泥沙的雨水从京密运河流入昆明湖时，可立即关闸，使带着泥沙的雨水绕湖而去。需要水时，再将闸门提起，将清水放入湖中。此项工程历经五年按计划完成。从此，昆明湖的水源得到保证，水位稳定。千万株荷花又重新在昆明湖中争奇斗艳，“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情景再次重现，喜得游客流连忘返。但遗憾的是，我们的好总理未看到此种情景而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周总理情系颐和园和关爱颐和园的最突出的事例，还表现在“文化大革命”中对这座皇家园林古建筑及其文物的保护上。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犹如山洪暴发冲击着北京，不久又以雷霆之势席卷神州大

地。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和“破四旧，铲除封资修”的呐喊声中，掀起砸碑楼、毁坏庙宇等邪风。这股邪风也很快刮到颐和园来，立刻引起颐和园广大职工和干部的担心，同时也引起社会上关心热爱民族文化有识之士的关注。当年下半年，北京的多处牌楼被拆毁，颐和园东宫门外牌楼也有人搭起脚手架，准备把它全部拆除。人们看到此景万分焦急、不知所措；而也有些人叫嚷着：“要彻底砸掉、拆除！”就在此时，周总理得到消息，立即通知有关人员，发出“颐和园的牌楼不能拆毁，必须保护好”的声音。在总理的干预下，这座牌楼最终完好地保存下来。经过这事之后，总理更加关注颐和园动态，除陪同外宾来园参观游览外，还不定时的来园中察看，发现问题就及时解决，为保护这座价值连城的皇家园林

付出不少心血。

1967年初的一天，周总理来到颐和园听鹂馆宴会大厅，抬头看大厅里原有的由清朝大臣写的两块巨大的匾不见了，问到：“匾怎么没了？”邹继阳书记立刻回答说：“怕扫四旧弄坏了，我送到荣宝斋装裱去了。”总理听了，欣然的笑着说：“好啊，这是个好办法！”可见总理对保护文物是多么上心！

1969年8月8日下午，周总理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来到颐和园长廊，陪伴总理的颐和园书记邹继阳向总理反映了第一个问题：有的红卫兵小将要求把长廊上面的那些封资修内容的才子佳人和山水画去掉，画上具有革命内容的红军长征图。总理听了，立刻坚定地回答说：“长廊的彩画不必重画，才子佳人、山水画要保留。”

总理几句言简意赅的话，使

在场的人们立即意识到周总理是不同意改变长廊彩画内容的，长廊一定要按原貌保护下来。一些担心长廊会遭到破坏的群众也放下心来。

后来，颐和园的一些干部和老职工心领神会，在长廊的彩画上刷了一层很厚的大白，把彩画盖住了。谁都明白，一旦这股风过后，将大白洗掉，长廊的彩画还会重见天日，重放异彩。十年之后，为迎接建国三十周年大庆，长廊重新油饰彩绘，一些老油画师傅无不感慨地说：“当年如果没有周总理，长廊何在？长廊彩画又在哪里？”是啊！没有我们总理的保护，长廊被吉尼斯大全认定，被列入《世界遗产保护名录》也就无从谈起。

总理走到排云殿前时，邹书记又提出第二个问题：佛香阁能不能挂毛主席像、贴毛主席语录？总理说：“不要挂，不要贴。排云殿前的牌坊上也不要挂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长廊里的毛主席语录要去掉。”那时，一些怀着朴素政治热情的颐和园职工请一些画家和雕塑家将八个样板戏的场景人物做成泥塑，摆在德和园大戏台上展览，取名为《红太阳照亮戏剧舞台》，以此来体现工农兵占领大舞台的政治要求。当周总理走到

这里时，环视着这些大型泥塑，表情严肃，然后用一种异常的语调说道：“我送你们几个字‘热情可嘉，考虑不周’。”沉吟一会，总理又说：“年轻人的热情我知道，但大戏台这么多东西堆在一起，就没有艺术性了，成了广告，连广告也不如。”总理这几句话，既肯定了群众朴素的政治热情，又婉转地否定了这种做法。那句“热情可嘉，考虑不周”八个字，掷地有声，犹如一盏明灯一下子把一些人当时还模糊、不易看清的东西照亮了。于是，展览立刻停止，迅速恢复了德和楼的原貌。据说，“文革”之后，一位华侨来园游览并参观了德和园大戏台后激动地说：“即便是一个没有爱国心的人，参观了德和园及它的内部文物展览后，也会激起爱国热忱的。”是啊！当年要不是总理的干预，德和园大戏楼说不定会遭到破坏，岂有今日的辉煌！

此刻，天色向晚，一抹晚霞映在碧波荡漾的昆明湖上，周总理从德和园出来，无暇顾及此景，来到颐和园的东宫门外的花坛处。这时，邹书记向总理请示了最后一个问题：有些人主张在这花坛的太湖石底座（太湖石已被毁）上树立毛主席像或工农兵像，您看……还没等邹书记说

完，总理立即回答道：“都不能，要保存原样！”说完，总理又回首环视一下颐和园正门，便与邹书记等人一一握手，说一声“谢谢”，然后坐车走了。

邹书记等人目送周总理的车远去，直至看不见才离开。但周总理的言谈和教导仍在耳边回荡。

周总理情系颐和园，不仅表现在平日和“文革”的特殊年代，还表现在他患绝症之后，仍然眷恋着这座仙境般的皇家园林。他曾于1973年春秋之际，先后两次来颐和园散步游览。

1973年5月，周总理在玉泉山休养。一天下午四点多钟，总理在工作人员的陪伴下来到颐和园，乘一条画舫于昆明湖上漫游。这一天，惠风习习，湛蓝的天空，飘着几朵白云。总理略显消瘦的脸庞仍是那么神采奕奕，双目还是那样炯炯有神。他一声不语，默默地遥视着耸立的佛香阁，时而眺望翠绿的西山，时而又俯看碧水涟漪。

画舫在湖面上慢悠悠的飘着，仿佛停在湖中。这时，听鹂馆值班的邹继阳书记看到了总理坐在画舫，就立刻划一条小船，把事先准备好的饭菜送到画舫上，请总理用膳。这顿餐基本上都是素的，也是总理平常爱吃的家乡菜，两小盘凉菜

和两小盘热菜。凉菜是一盘松花蛋和一盘烤麸；热菜有香菇炒扁豆和青椒炒虾片，主食是一小碗鸡丝汤面和小馒头。总理看着眼前香喷喷的饭菜，很想多吃点，但他只吃了那碗鸡丝汤面和几口菜。邹书记在一旁看总理只吃了这么一点，心里疑惑是不是饭菜没做好……殊不知总理已是身有重病的老人，几日前刚做完一次小手术，医生嘱咐总理只能吃半流食。此时，总理猜出师傅的心思，忙微笑着说：“饭菜做得很好嘛，吃饱了，谢谢你们！”说完总理一再叮嘱邹书记要按餐厅规定的标准收费。然后，总理起身上岸，迎着晚霞离开了颐和园。

四个月后，即9月7号下午5点钟左右，周总理又在工作人员陪同下来到颐和园散步。这也是总理生前最后一次光顾这座皇家园林。此时，秋高气爽，万里无云，湖水碧蓝，满眼青翠。湖中几对鸳鸯在碧波中自由自在地嬉戏着，留下一圈圈相连的波浪，宛如朵朵的花絮。总理漫步在湖岸旁一边尽情地欣赏着这美好的景色，一边慢悠悠地朝前走着，约半个多小时，就走到了他非常熟悉的听鹂馆前，于是径直走进大厅。这一日，邹继阳书记当班，看见总理进来，赶紧迎上去，还未等总理抬头看，邹

书记立刻说：“总理您看那两块匾已经挂上了。”总理非常高兴，满意的笑了。总理才坐下，邹书记笑着问总理：“您今天吃点什么？”总理微笑着从秘书带着的书包里取出一个保温盒说：“今天我自带包子来了，请你们尝一尝。”邹书记等人接过总理送过来的包子，咬了一口觉得很香，然后说一声“好吃。”总理又笑着问：“你猜一猜是什么馅？”邹书记看着这包子馅绿绿的，又是素馅，但味道很鲜，便有把握地回答道：“是荠菜的。”总理笑着摇摇头说：“不是荠菜，是我家乡淮安的蒲菜馅。”听到总理说是自己的家乡菜，邹书记和另外一位师傅都会意地乐了。心想，这是周总理晚年思念家乡的表现啊！看着总理吃的很香，邹书记赶快给总理做了一碗清汤端来，说：“总理，您喝口汤吧！”总理接过汤，喝了几口，说：“很好啊！谢谢。”喝完这碗汤，说了一会儿话，便起身走了。邹书记和其他师傅看到总理是这样艰苦朴素，清正廉洁，严于律己，深受教育和感动。过后，邹书记和餐厅的师傅们商量，为了迎候周总理再次光顾餐厅，使总理吃上可口的家乡饭，就专门派人去总理故乡淮安采购蒲菜，盼着总理来吃。

可是，左等右盼，听鹂馆的师傅们再也没见到总理的身影。

自此以后，重病缠身的周总理仍在殚精竭虑地为党、为国日夜操劳，在“四人帮”的干扰和摧残下，总理的病没能按时治疗和休养，身体每况愈下，直到他的精力全部耗尽，于1976年1月8日，心脏停止跳动，一颗巨星陨落。举国悲痛，五洲哀悼，颐和园干部职工和家属悲痛欲绝。他们不顾“四人帮”限制全国人民悼念周总理的种种“规定”，也不顾政治上的高压与恫吓，毅然决定下半旗，臂带黑纱，于1月15日下午，在知春亭食堂召开周总理的追悼大会。然后，又列队来到万寿山下国花台前，冒着严寒，怀着对周总理无限挚爱的深情，用双手捧土栽下一棵小松树，取名为“继志松”，以示继承总理的遗志，像总理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像总理那样情系颐和园，爱护颐和园。

40多年来，祖国大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座古典园林也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焕然一新，誉满全球，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就连那棵“继志松”，也从当初的小树苗成长为一棵枝繁叶茂、挺拔翠绿的大树，好像周总理生前那伟岸的身躯，屹立在亿万人仰望的万寿山上！

温唯世篆刻的金石味

吴剑群



图1 作者与温唯世（作者供图）

我与温唯世是多年的朋友（图1）。他是居住在海淀的著名篆刻家，今年87岁，20世纪60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现在的北京工业大学），自幼承家学，酷爱书法艺术，取颜体而上溯晋唐名家，篆书兼古籀旁及秦篆，博采众长，独具鲜明的书法风格。

治印两万方

温维世真、草、隶、篆样样拿手，后迷篆刻，曾得到篆刻大师孙竹指教，遍临古玺，间摹明

清流派，刻印达两万方。温老为国家领导人、艺界名流及广大书画爱好者治印，其作品得到外国友人的青睐，并作为国际交流的礼品。每方印章都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

玺印承载着华夏五千年文明，是中国特有的艺术门类。古人云：“善书法者，治印有笔有墨；善章法者，治印有神有意；善刀法者，治印裁顿分度，三者俱备，则臻完美可称神品。”温先生治印真、草、隶、篆皆可入印，尤擅大篆，探悟刀笔相生之趣，学古而不泥古，求新而不失法度，达出神入化之境。温先生曾说：“我喜欢篆刻是在无意中开始的，没想到开始以后就走入魔了，逢人就问，见人就学，三句话离不开字法、章法、刀法，临古玺、摹汉印、学明清流

派，只要刻完印自己满意，心里就比蜜还甜。”

我曾请温先生镌刻过多枚闲章。例如：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语出《史记·陈涉世家》。温老用大篆朱文设计此章，而他大篆风格中往往具有籀书质朴酣畅的感觉，八个字大小参错，相互依偎，挪让得体，和谐共处于方寸之中，金石味浓。

“百无一用是书生”：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词意相反，温老用金文白文治印，白文的特点是将字的笔画用刀刻掉，而字外全是印泥，给人一种大气磅礴的感觉。

“熔铸古今”：出自明·陈汝元《金莲记·弹丝》，是古今相通之意。还有“师古求变”句。此两句原准备镌刻成对章，但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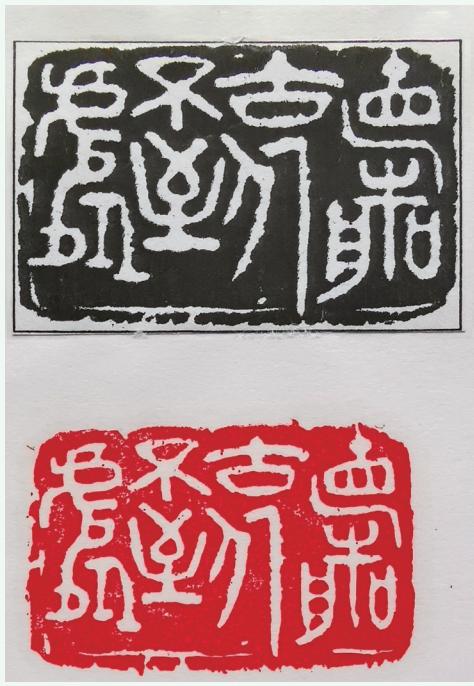


图2 直造古人不到处，上王十川篆，下为温唯世摹（作者供图）

某种原因只镌了其一，此章设计典雅，值得欣赏。

“朴拙率真”：此乃做人之本。该印同样用小篆朱文形式表现，但与前面的用大篆镌刻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字体上有变化，透着率真的风格。

“纸上千年”：我藏有柏涛（徐焕荣）印谱，其印谱第一方印就是“纸上千年”，雄浑而大气，请温唯世摹之，摹刻得惟妙惟肖。

柏涛先生隶属琉璃厂萃文阁，其书法以篆隶见长，取名家之长，形成草篆、草隶，字体优美，且极富神韵，是京城著名的

书法篆刻家。

“直造古人不到处”

（图2）：王十川为北京篆刻大师，1943年毕业于国立北京艺专学校雕塑系雕刻组，曾受教于寿石工、黄宾虹、金禹民等书画篆刻大师，其篆书一笔下来如刀削，干湿相济，若断若续，自成风格”。

“直造古人不到处”一句代表着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是拼搏与创新，笔者请温唯世摹刻，难分仲伯，可见温老刀工之老辣。

难度极高的组印

治印中有种形式是将一首诗或是词，用多方印章镌刻出来形成组印，通过真、草、隶、篆、籀以及朱文、白文以至于朱白相间文来体现，印章的形式多样。篆刻组印这种形式很难，是考量篆刻家的试金石。一组印用多少块印石才能恰如其分地表现好一首诗或词的意境。字与字的安排或大或小，或高或低、或倚或斜，印与印之间还要兼顾整体布局与搭配，其中涵盖了诸多美学原理，将这些闲章钤盖出一整首诗或词以后，产生的视觉效果令人震撼！

我一直以得到温老《念奴娇赤壁怀古》（图3）组印为荣

耀，因为这套组印不仅代表温老篆刻的巅峰，而且当时仅钤盖了数纸。十几年来，这组印已经不全，因而以前钤盖的印蜕就显得异常珍贵。“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温维世用他手中锐利的刻刀，以篆刻这种独有的形式，将这首词的意境表现得淋漓尽致。

温唯世制作了130辑《温唯世书法与篆刻》，引起不少喜欢篆刻人的兴趣。温老年轻时喜欢朗诵，嗓音具有磁性，那时他是景山中学的朗诵高手，声音与当时中央台著名播音员“齐越”不相上下。他用那浑厚的嗓音为我们朗诵《满江红》、写英雄的词，以英雄为榜样指导自己的人生。温唯世就是这样一位胸怀祖国，脚踏实地勤勤恳恳奉献一生的老人！



图3 温维世2004年镌刻的组印《念奴娇赤壁怀古》（作者供图）

香山纪念孙中山的遗迹

户力平

海淀香山有关孙中山先生的遗迹，为人们所熟知的是位于碧云寺的“孙中山衣冠冢”和“孙中山纪念堂”。其实，还有几处遗迹不大为人们所熟知，这就是“中山柏”“孙中山纪念碑”“中山路”和“中山台”。

“中山柏”本称“九龙柏”

碧云寺位于香山脚下，建于元至顺二年（1331），清乾隆十三年（1748）大规模扩建。其坐西朝东，依山就势建有六层院落，层层叠起，颇有气势。金刚宝座塔为其标志性建筑，全部用汉白玉砌成，通高34.7米，有石阶可至塔顶。

在金刚宝座塔顶部后侧，有一株树龄300余年的侧柏，高约6米，因枝分九杈、酷似九龙腾舞，故名“九龙柏”，也称“中山柏”。

“九龙柏”因何又称“中山柏”呢？其渊源可追溯到百年前。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夜，28岁的孙中山先生上书李鸿章时第一次来到北京，做短暂革命活动考察。1912年夏，他第二次到北京，与袁世凯会谈，在京居留近一个月。其间他在孔祥熙的陪同下来到香山碧云寺，登上金刚宝座塔顶，观



碧云寺九龙柏（作者供图）

览京西风景。

当他走到塔顶后侧时，看到一株有九个枝权的柏树。不知何故，这株柏树却被绳索缠绕，上面还压着石块，已濒于枯死。孙中山先生围着这棵柏树仔细观察后随手把缠绕在树上的绳索解开并清理了压在上面的石块。让柏树的枝权舒展开来。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此后国民政府将南京紫金山选为其墓地。由于陵园建设需要几年的时间，因此治丧处决定将孙中山的遗体暂厝于香山碧云寺。同年4月2日，其

灵柩由中央公园（1928年改名为中山公园）移至碧云寺，暂厝于九龙柏下的金刚宝座塔内。1929年5月26日，孙中山灵柩由碧云寺移到南京。

移灵前的5月22日，孔祥熙特意登上金刚宝座塔，观看被孙中山先生扶植过的那株柏树。见柏树已是青翠茂盛，于是特意撰写《总理亲手扶植西山碧云寺塔顶侧松（柏）记》：

是松出塔顶侧，为积石所压者，不知几何年矣，盖好事者以拳曲偃蹇为观美，不惜矮揉造作以违其胜。

总理以民元游历诸胜，至碧云观状悯其若将萎，独奋然于去石，扶而植之，束缚解，抑迫去，机日以昌逮。

总理之逝，余董其事奉灵斯寺，寺僧指以示余，则蔚然以茂矣。夫一木微耳。独不忍其摧伤压抑，必求昌其生，则方趾圆颅之属，日号签其哀，痛其压，拯而援之，其必有道。

呜呼，斯总理所为毕生劳神焦虑，以拯拔吾民为己任；历艰险颠沛，以至于濒终而犹以意志，努力为吾党勖也。欵！十八年夏，吾党既奉安总理于紫金山陵墓，乃痤衣冠于斯寺，摩抚于泽，睹佳树之葱郁，而吾民犹未获尽遂其生也。概念遗烈，因文以记之，后之览者其将有感于是乎？

如今，这株孙中山先生扶植过的柏树长势依然良好，粗干盘曲苍虬、巨冠参天如云，以汉白玉围栏护之，竖牌明示，由此成为碧云寺内重要的人文景观。1988年被定为一级古树。

“孙中山纪念碑”

也称“孙中山农工政策纪念碑”“孙中山画像纪念碑”“方振武筑路碑”，位于碧云寺中轴路南侧塔院，金刚宝座塔东南部，坐西朝东。

1929年南京中山陵建成。同年5月26日，

孙中山灵柩由碧云寺移到南京。

灵柩南移前，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四军团总指挥方振武将军率部下义务将碧云寺通往京城的道路进行整修，以便搭载孙中山先生灵柩的车辆平稳通过。道路修缮后，为纪念义务修路特立纪念碑——“修路纪念碑”。因碑上刻有孙中山先生第一、二次兵工宣言的内容，被称为“孙中山兵工政策纪念碑”；另因其正面雕刻有孙中山先生雕像，也称“孙中山画像纪念碑”“孙中山纪念碑”。



孙中山纪念碑（作者供图）

该碑为六面棱柱体，高约3米，每边长约0.5米，立在一块面积十余平方米的双层平台上。碑身东面雕有孙中山先生晚年的头像，其上侧刻有“孙中山先生遗像”七个字，头像下为纪念中山先生兵工政策六十四字铭文：“幽昭明德，燕山之阳。肃肃灵所，寐寐馨香。大道之行，主义是昌。穀我平民，思韪用光。平治道路，和我周行。兵工政策，意美法良。遐迩崇仰，悠悠无疆。铭石纪念，永矢弗忘。”落款为：“中华民国十八年三月五日 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四军团总指挥方振武敬立”。

另外五面亦有铭文，皆为孙中山先生发表的第一、二次兵工宣言内容。碑身东北向镌刻：“兵工修治道路工事日繁越有生产发达之象 总理第一次兵工宣言”；西北向镌刻：“改兵为工於工事最有经济”；正西向镌刻：“总理政策以实行兵工为归依”；西南向镌刻：“实行兵工制度虽给加倍之饷国家犹为合算 总理第二次兵工宣言”；东南向镌刻：“兵化为工於兵之自身最为适宜而有利”。

方振武，字叔平，原名方运策，安徽寿州（今寿县）瓦埠镇人。青年时投考安庆武备练军学堂，毕业后开始军旅生涯。辛亥革命时参加光复南京的战斗，后参加讨袁斗争、随孙中山北伐，1925年任冯玉祥部军长、国民军援陕副总指挥，1927年任安徽省政府主席。1933年与冯玉祥、吉鸿昌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前敌总司令，拼死抵抗，终因弹尽粮绝而失败，后被迫出走海外。1941年12月18日，日军侵占香港，他于当日重返内地，奔赴抗日前线。刚入广东中山县境时不幸遭到特务暗杀，时年56岁。

“方振武筑路碑”最初树立于颐和园东宫门外“涵虚罨秀”牌楼东南侧。后因拓展道路，以及

自身无保护措施而遭涂画。1983年由北京市文物局和园林局迁移至碧云寺金刚宝座塔的东南侧。



原立于颐和园牌楼南侧的“孙中山纪念碑”（作者供图）

这张摄于20世纪30年代的照片记录了此碑位于“涵虚罨秀”牌楼一侧的面貌，当时碑的上部有锥形碑头。如今只是碑身碑座完整，上部为平顶，六面的文字清晰可见。

“孙中山纪念碑”即“方振武筑路碑”现为海淀区文物普查登记项目。

“煤厂街”曾称“中山路”

煤厂街位于碧云寺东南侧，大致为东西走向，东起香山路，西止碧云寺。早年间为村中土路。

这条古街始于明代，初为煤厂村中的街巷，称“煤厂街”。万历年间沈榜编纂的《宛署杂记》中有“寿安寺在煤厂村，唐建，名兜率，三易其名。宣德、正统年，高僧广霖募诸中贵重修，敕赐今名。内有石卧佛一、铜卧佛一，俱长丈有八尺，因相传为卧佛寺”的记载。

1925年4月2日，孙中山先生灵柩由京城移至香山碧云寺暂厝。下午4时20分，灵柩经过煤厂街时，沿街商铺纷纷悬挂白花、黑幛子，以示哀悼。

1929年春，南京中山陵落成。5月22日，在碧云寺举行孙中山先生遗体改殓仪式。26日凌晨

1时行奉移礼，随后由24名杠夫敬谨移灵。2时30分，孙中山灵柩出碧云寺大门，沿煤厂街缓缓而行，沿街商铺再次纷纷悬挂白花、黑幛子为其送行。过煤厂街后，灵柩沿东西向的大道（今香山路）东行，经玉泉山、青龙桥、海淀镇进入西直门。再经新街口、西四、长安街等地至前门东火车站，由专列将灵柩运往南京。

灵柩移往南京前，方振武将军在煤厂街南口和北口各树立一块“中山路”的路牌。

路牌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端为长三尺、高一尺的木牌，黑底白字，字体为隶书，端庄而厚重。下端为五寸见方木柱，托以上端的木牌，由此煤厂街当时也被称为“中山路”。据煤厂街老人回忆，“中山路”路牌立了几年，后因风吹雨淋，木牌、木柱糟裂而倾倒，从此“中山路”之名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



今日煤厂街（作者供图）

煤厂街是去往碧云寺的必经之路，因是土路，所以高低不平，又因处于香山脚下，坡度较

大，行人及车辆经过极为不便，特别是雨季，街道泥泞难行。为方便人们前往碧云寺瞻仰“孙中山先生衣冠冢”和参观“孙中山纪念堂”，市政部门于1953年对该街进行改造。一是将街巷取直加宽，将临街的部分店铺向街道两侧迁移；二是由数百名工匠历时半年铺设长方形花岗岩条石。条石大小不等，大多长约1米、宽约0.5米。这些条石一部分是改造天安门广场时拆除下来的，一部分是从清代西直门到颐和园所设御路上拆下来的。当时还没有先进的起重机械，完全靠人工搬动、用马车运至香山脚下，然后自东向西沿煤厂街铺置，路宽3-6米，长近1千米。1965年该街被命名为“煤厂街”，如今路面基本保持原貌。

消失的“中山台”

据1935年北平经济新闻社出版发行的《北平旅行指南》记载：“在平西香山、北辛村南，该处为赴香山及碧云寺分路处，台高三丈许。清时建此之意，有谓系因香山保卫风水之用。曾在香山附近建立数台。又有谓乾隆征金川不克，曾在西山练兵建有碉台数处者，按此台原名即碉台，而香山此台实多，后说近似。乃于民国十八年三月五日改为中山台。并竖一碑，上端刻总理像，右方刻革命军第一集团第四军团总指挥方振武立，碑文中刻总理遗嘱。为平西名胜改革中重要之一。”

《北平旅行指南》所记述的“中山台”是一处已消失的纪念孙中山先生遗迹。其中的“碉台”，即今天所说的碉楼，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

乾隆十二年（1747），四川大渡河上游的金川土司叛乱，乾隆帝发兵平定。但叛军凭借当地高大的碉楼顽强抵抗，战事久拖未决。乾隆十四年（1749）初，乾隆帝下令在北京西郊香山一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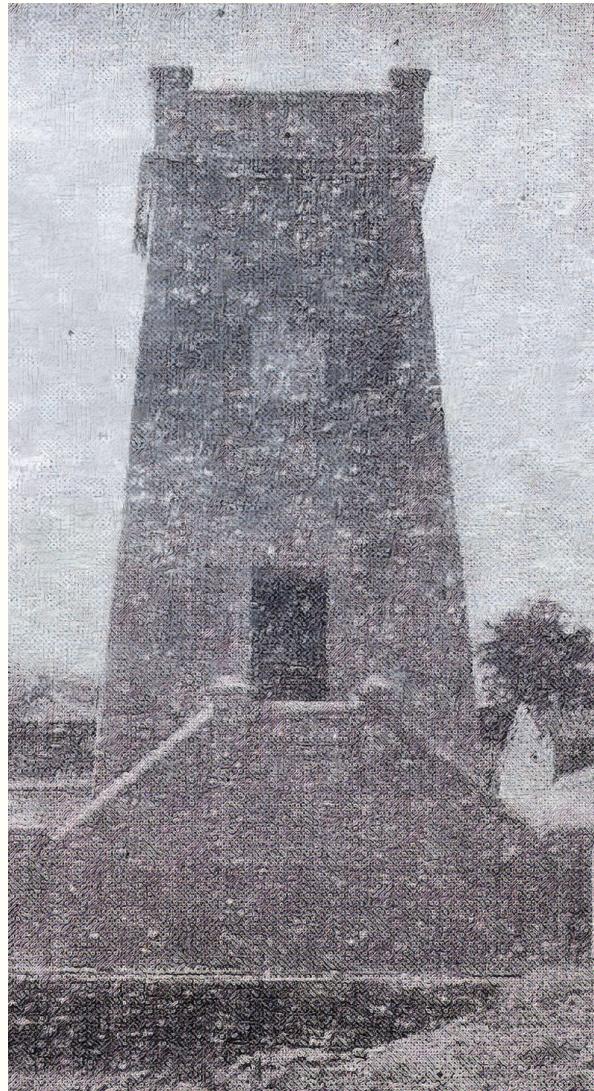
兴建碉楼，设云梯兵，以训练攻碉战术。不久，云梯兵掌握了攻碉战术，乾隆帝遂派大学士傅恒率领这支精锐部队再赴金川，后叛乱终被平定。

云梯兵团回京后，被改编为健锐营，驻扎在香山脚下。该营设八旗，分左、右二翼。其分布由静宜园（今香山公园）东宫门向东（左）、南（右）两个方向伸展，每翼设四旗，各旗修建碉楼若干座，所有碉楼呈下大上小之势，均系虎皮石拌灰泥砌成，其基础用三合土夯实，整体建筑十分坚固。碉楼分两种类型：一种为实心碉楼，不可攀爬；一种为活心碉楼，一面开门，入门有石蹬盘旋至顶，人可站在顶上远望。健锐营碉楼总数说法不一，即使在清代《日下旧闻考》中也不统一，前面说是67座，后面又说有68座。其中在左翼镶黄旗南营设碉楼5座，西南角为活心碉楼，坐北朝南，碉楼之门置于南侧，前有石墙所护台阶。从《北京西山健锐营》所绘“健锐营八旗营房布局示意图”和“镶黄旗南营示意图”可看出，“中山台”应为“赴香山及碧云寺分路处”的镶黄旗南营西南角碉楼。

1929年3月5日，方振武将军率部下将镶黄旗南营西南角临近道路的碉楼进行简单修饰，上悬“中山台”之牌，由此这座碉楼被称为“中山台”。同时在西侧树立石碑一座，高约1.2米，宽0.8米，上圆下方。其上端刻孙中山总理像，右方刻“革命军第一集团第四军团总指挥方振武立”，碑文中刻总理遗嘱（又称《国父遗嘱》）：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



“中山台”旧影（作者供图）

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於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据几位八九十岁的香山老人回忆，“中山台”就在镶黄旗南营西南面，靠近官（大）道的那座碉楼。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这座碉楼还存在，整体保存完好。故此作为西郊名胜古迹，1935年被编入《北平旅行指南》。民国后期逐渐破败，随着旗营逐渐变成村落，碉楼便消失了，而今提起“中山台”，已鲜为人知。

马甸的明代御道及其变迁

王德福

1403年，明成祖朱棣永乐元年，明朝改北平为北京。随后，朱棣选择昌平天寿山南麓为皇陵所在地（今昌平区十三陵景区）。为了方便帝后和群臣往来于皇陵和京城，永乐十四年（1416），明廷自德胜门向北修了一条御道。御道经马甸、健德门豁口、小关及清河等地，直至明皇陵。

自从修建御道后，健德门内，御道两侧，逐渐形成村落。这村落就是后来的马甸。御道也就成为马甸的前街。

一、御道及其在马甸附近的桥梁

御道刚修成时的形制我们已不能确切知晓。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御道从德胜门到清河要穿过三条河流。分别是：健德门外土城护城河；苇子坑附近无名河



1936年的健德门大桥（作者供图）

及清河。在这三条河上，各建有一座石桥供御道使用。其中，马甸附近建有两座，一座是马甸村紧邻的“健德门桥”。另一座是马甸北边三里地的“卧虎桥”。御道从马甸过健德门桥再过卧虎桥，然后直奔清河的广济桥。三座桥的特点是拱度都不高，适宜走车、轿、马、行人等。

健德门桥位于马甸土城外护城河上，大理石桥栏，青沙石桥面，南北走向。桥有三孔。三孔拱桥在河面较宽时，保证了桥面不会有太高的曲度。桥面大约有五米宽。桥的位置正对着健德门豁口。这桥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破损。随后不久即被拆毁。

这幅拍摄于20世纪30年代

健德门石桥的照片显示，1936年之前，健德门石桥就已经不能使用。

御道上的卧虎桥在健德门以北三里多。是一座单孔石桥，南北走向，桥下有河流。

自从有了卧虎桥，就有人在桥头开店卖东西。后来逐渐有人居住，形成村落，村名就叫‘卧虎桥’。乡老们说，卧虎桥毁于民国前期。

关于卧虎桥下的这条河流，没有见到任何记载。笔者在做调查时，也没有听到有人见过这条河。笔者在解放初期曾来过这一带。那时，卧虎桥东部偏南有一大片洼地，就是著名的德胜门外苇子坑。苇子坑北部和东部，有方圆几里的沙地。那时我曾到那块沙地里挖过花生。花生地里大都是细砂加黄土，也有少量的粗沙。

有洼地就会有雨水注入、就会有河流。笔者依据一些零星记载及描述，依据地质学原理，对这条河作如下推测：

根据资料，清朝初期，苇子坑是一片广阔的苇塘。按照地质学一般规律，在元朝和明朝初年时，苇子坑应该是比清朝初期时面积更大、高程更低的洼地或沼泽地。

地质学证明，苇子坑一带是

永定河冲击扇的一部分。在冲积扇形成晚期，这里是大片洼地。洼地旁有大量泥沙堆积，说明这里曾经有河流，而且是水量充沛的河流。后来，大的河流被泥土淤塞，只留下洼地和向洼地注入雨水和部分泉水的小河流。这条小河是东西走向。从北京地形图我们知道，卧虎桥一带是海淀台地的东部边缘，地势西高东低。御道基本沿50米等高线外缘向北延伸，所以，向洼地注水的小河只能是由西向东流的。这条河的上游有许多泉分布，知名的有九龙泉和满井泉等（满井泉我在小时候见到过）。既然有雨水和泉水注入小河，故推测明代时，这条河常年流水且水量不会很少。

明朝永乐年间修建御道时，在这里遇到了这条小河，于是在河上修建卧虎桥。因为河面不很宽，就用了单孔拱桥。

二、御道在500多年后变为大道沟

马甸的御道经过明清两代500多年的岁月，到解放初期已经变成一条大沟。人们称之为“大道沟”。大道沟宽窄不一，深浅有别。浅处可走大车和人，深处积水。到夏天，深处雨水注入汇成小河，河水向北流入土城护城河，又北入清河。

解放初期，出德胜门过护城河大桥，是一条向北的大道。两侧是各类商铺及密集的居民住宅区。这是德胜门关厢。往北约一里，被人们称之为“关北头”。关北头往前几近荒野。

从关北头开始，并存两条大道向北延伸。那时候，民国时期修的公路已是北向的主路。从关北头路口向北，公路西侧分有一支土路，走上土路，是一个向下的斜坡，再走三十几米，土路已经比平地低落五米多。路面虽然变得平坦，却是在沟谷中。沟谷中仍能走大小各式车辆。大道沟土路向北延伸，形成一个宽约四十米、深五米的大沟谷。土路过官厅村，再过马甸，出健德门豁口，过小关，直至清河古镇。

这条土路早在秦代时就成为北方大道之一，元代是帝后往来于大都（今北京）、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间和运漕粮的驰道。明代为通往皇陵（十三陵）的御道，清代为驿道，是北京通往内蒙、张家口等地的交通要道。

“多少年的媳妇熬成婆，多少年的大道走成河”。御道在修建时应该是平地，谁也不会把御道修在大沟中。御道在修建时也不会有四十米宽。之所以变成四十米宽、五米深的大沟是几百

年的车碾、人马行走而成的。

根据常识，道路的路面下沉是随着其负重的大小及时间的延续加深的。我们设想，500年间，在第一个一百年时，路面下降一米，碰到雨天，路面必定积水。这时，人们就会在被水淹没的路旁平行走出另一条道。由于这条新道位置比较高，人们就会连续走这条新道。再过一百五十年，新道下降两米，人们又在旁边开辟新道。如此反复，古道就走成宽四十米、深五米的沟谷。

沟谷从关北头到官厅村，再到马甸村南，都是如此。进入马甸后变窄，大约有三十米宽。深度仍有五米。

马甸的所有建筑都建在古道两边的台地上。台地上，在大道沟两侧各形成新的宽约有20多米的街道。在马甸的古道还在使用时，各类车辆都从新的街道上驶过。

有人会问，那样的大道沟那岂不是一个水槽？一下雨，水槽中岂不全是水，道路还怎么使用？其实，这条大道沟不是封闭的，它有许多缺口。比如，大道沟在经过官厅村时有一条东西向岔道与之相交。岔道向东至黄寺，向西过西村再过牤牛桥豁口，至塔院。这两条岔道深度与大道沟同，只是没有大道沟宽。



1930年的健德门遗址（作者供图）

两条岔道都有缺口通低洼之地。而且，大道沟过马甸后，穿过健德门豁口，向北过土城护城河，沟中的雨水可以流入护城河中。这使大道沟土路一直在使用。直到1934年，大道沟的道路才逐渐被废弃。

这时，健德门豁口已经有泄水沟。

马甸大道沟被废弃的时间要比健德门外小关的大道沟被废弃的时间晚得多。小关的大道沟在清朝末期就已经被废弃。

健德门外小关以北大道沟的深度虽然与马甸大道沟的深度差不多。但是，积水的程度要比马甸地区严重得多。主要原因是，小关北的大道沟中的雨水不能向南流入土城护城河，因为南边地势高，也不能向附近的苇子坑泄水，因为这时的大道沟高程

已经比苇子坑低许多。而这里距清河又远，所以常年积水的时间要比马甸长。人们就只好躲开大道沟，在其东侧较高的平地又走出了一条大道。

大道路面随着时间流逝会越走越低，这是常识。但不会一直低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路面下降的速度会越来越慢，直到一个极限。路面下降后的高程会逐渐接近这个极限。应该说，马甸及健德门外的大道沟的深度已经大致接近了极限。

为了说明这个规律，这里举一个例子。我年轻时从事的工作是地质勘探，曾在甘肃庆阳地区的“驿马关”住过几年。驿马关有一条古道通过，这条古道在秦朝时就已经存在。秦朝修驰道通漠北，应该就是这条道。“驿马关”地形险要，周围都是自然形

成的深沟巨壑，要过驿马关，只有此路。古道进入“驿马关”南关，其路面比两侧地面低六米多。这一带是黄土高原腹地，黄土厚约300米，下部是泥岩基石。这与马甸地区的地质条件差不多。驿马关古道走了2000多年，下降了六米多，说明大道沟的下降的深度是有极限的。马甸的大道沟走了500多年，下降了五米多，也证明马甸的大道沟深度已近极限。

三、古道功能部分丧失引出并行的小路和公路

由于马甸的大道沟经常积水，早在清朝末期，人们就在马甸御道东侧约200米的地方挖开祁家豁子，走出一条小路。小道与马甸的御道平行。在1907年的简易地图上，已经能看到在祁家豁子土城两侧有对等的小路，土城豁子画得不明显。在1915年的地图上，祁家豁子及其通过的小路已经被明确标示出来。

1934年，民国政府把这条小道拓宽，建起简易公路。公路从德胜门到清河，时称“德清路”。名为公路，其实仍是一条土路。1954年政府将土路改为石子路，1957年铺沥青路面。

解放初期，这条公路在马甸附近建有两座木桥，一座是祁家

豁子外护城河上的木桥，这座木桥由松木原木架成，南北两侧是垂直立木，中部是横梁木，横梁木很粗。解放初期，祁家豁子外护成河已被堵塞，桥下没有水流过，但木桥还是很结实地立在那里。另一座是官厅村东边的木桥。木桥的下边是官厅通黄寺的古道。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两座木桥被改为水泥桥，又过了几年，两座桥都被拆掉，桥下用高填土的方法筑起路面。这条路在1984年经过整修，成为今G6京藏高速路的一部分。

四、马甸前街古道成为小河

马甸古道被废弃后，到解放初期仍然能走大车和行人。马甸古道正式成为小河是在1953年。当时政府组织人力对马甸前街中部的大道沟进行整治，使之成为一条真正的河，河的坡岸栽上柳树。马甸前街就分为河东与河西两部分。小河出健德门，汇入小月河，再往北经小关的大道沟汇入清河。河里的水源主要是德胜门外一带的雨水。解放初期，马甸街北部大道沟上架有一座木桥，木桥把马甸街与东边的公路连接起来。木桥能走汽车大车等。到1958年，政府在马甸街的堂子胡同对面又修有一座小木桥，连接马甸街的大道沟两侧的街道。这小木桥只能走

行人。

1983年和1984年，修建马甸立交桥和扩展北三环路。这时把马甸前街的这条小河改为暗河。在原来小河位置的地下埋了很粗的管道。暗河的地面仍是道路，但路面仍然很低。1997年，马甸拆迁时，把地面垫高，并把马甸原来的前街修成一条很宽的柏油路。现在叫马甸东路。

从德胜门经马甸、健德门通往清河、昌平的这条古道，处在海淀台地的东部边缘。古道基本沿50米等高线东缘向北延伸。在清河以南，其地势西高东低，南高北低。这是今天的小月河自南向北流入清河的主要原因。

因为北京城处在海拔40-50米之间的古永定河冲积扇上，所以古代的人们在向北出行时，便自然而然地沿着50米等高线外侧走出了这条古道。据学者研究，德胜门至清河的这条道路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存在，历来是北京通往北方大道的一部分。民国以后，古道虽然废弃，但在其东侧不远处，新建了德清路（昌平路），现在叫京藏高速路。这条新公路仍大体沿着50米等高线外侧向北延伸。

这样看来，马甸街的这条御道古路真的是得天独厚、源远流长。

探究古榆河驿

金连河



居庸关（作者供图）

海淀区上庄镇地面，历史上曾经马蹄声声、烟尘滚滚，大道之上南来北往的人马车辆川流不息……

明建文四年（1402）燕王改居庸关千户所为隆庆卫。居庸关辖今北京市昌平区、延庆区、海淀区、门头沟区、怀柔区，河北省怀来县等广大地区。

明《西关志》有载：隆庆卫

治所辖域，居庸关：东至西水域口黄花镇界九十里，西至坚子峪口紫荆关界一百二十里，南至榆河驿宛平县六十里，北至土木驿新保安界一百二十里，南至京师一百二十里。包括北京市昌平区、延庆区、海淀区、门头沟区、怀柔区、河北省怀来等广大地区。隆庆卫相当于现在一个部队的小军区。

古代没有现在的通讯工具，边防给中央传递军事情报、皇帝下达指令全凭派人骑马传送，中途就要有替换的人和马。这替换的地方要有屋舍院落供人马休息吃喂，这地方叫作驿站。古代从京师辐射到边防有数不清的驿站。

《西关志》里说的榆河驿又在现在的什么地方呢？

洪武二十七年（1394），居庸关的隆庆卫设立榆河驿、居庸驿、榆林驿、土木驿4个驿站。万历《顺天府志》记载：“榆河驿，在榆河店，北距昌平城三十五里。嘉靖三十六年，迁到昌平城内新城南大街西巷”。

康熙《昌平州志》记载：榆河驿是明军管理的驿站，由居庸关隆庆卫派千户官管理，有军夫150名，接应往来官员。后因清河—沙河—昌平一线道路平坦，

人员往来不再走榆河驿了，嘉靖三十六年，又将榆河驿迁到昌平城内，由昌平州派驿丞管理。

明代的宣化、大同、张家口一线军务繁忙，是明朝防北元蒙古势力骚扰京师的重要防线，在这条线路上朝廷设置布防了许多驿站，榆河驿、居庸驿、榆林驿、土木驿、鸡鸣驿等。除榆河驿外其它四个驿站都有城池且至今留存。

为什么其它驿站都有城池，而只有榆河驿没有城池呢？可能是在建驿站之初，由于榆河驿离京师近，少了许多盗贼和匪患的骚扰，就没有建城池，而在嘉庆三十六年，昌平县治又搬到了永安城，榆河驿也跟着搬到了昌平县城（永安城），从而也就无需再为榆河驿建立城池了。后来，这些驿站的功能从传递军情方面延伸扩展到迎送官员，储存和运送物资……

清人麻兆庆在《昌平外志》中记载：（榆河）“流经小榆河村北、大榆河村南，明之榆河驿，即此村也”。

麻兆庆是清末学者，昌平阳坊西贯市人，曾经参与编撰光绪《昌平州志》，因与编撰《昌平州志》的主事学术观点有分歧，而愤然离去，另立门户，自己骑着毛驴访遍昌平的山山水水编



旧地图（作者供图）

撰出《昌平外志》。他是昌平本地人、家乡阳坊离大榆河村又不远，对于昌平历史知之甚多……

昌平地理上，从漠北越过八达岭、入关沟、出南口奔京师原有一条古道，这条古道是从南口一直向南奔辛店、土城，过今海淀区双塔村、大榆河村，再往南走直奔京师。

马池口镇辛庄村离南口八里，在元代皇庆二年（1313）曾经做过昌平县城。而马池口镇土城村在汉代曾经是军都县（当时昌平县与军都县并存，当时的昌平县城是离沙河不远的上东廓村）城的所在地。后来军都县撤销只剩下昌平县。土城村现在依然遗留着汉代夯土城墙遗址，

土城十几年前城墙东西还有当年护城河流水的大沟，还能看到原来的城池大概轮廓。土城东西窄南北长。是汉代为防止匈奴从上谷郡（治在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小南辛堡乡大古城村）南下而设立的一个城池。

元代的辛店和汉代的土城都是根据这两个朝代的需要所建立的，都在这一条古道上，都要从榆河驿通过。而这两个地方由于地势低洼河网密集，到了夏季雨水瓢泼、河水泛滥、无法控制，人马不能通过，影响军事情报和军需物资运转。唐宋年间，因边界和周边环境的变化县城曾一度往东北移到朝凤庵……

到了元代，因蒙古族统治中

原，他们从外蒙的上都、中都来，从居庸关到北京大都，觉得抄直走，还是从南口往南奔辛店这条古道近，就于元皇庆二年（1313）在辛店设立县城，这县城在此仅待了55年，到明洪武元年（1368）又移至昌平旧县。旧县的位置在南口以东十二里路南。因为这一路离燕山山脉近，地势高平，就脱离了原来的水患。由于明朱棣把国都从南京移到北京，他就在昌平的黄土山选定明陵——十三陵。每年昌平县官为了迎送拜谒皇陵的皇帝、皇亲、国戚和官员方便，把昌平县治于明景泰二年（1451）由旧县搬到东边的永安城。嘉靖三十六年，又将榆河驿迁到昌平县城永安城内。而驿道也不走出京城经清河、唐家岭、皇后店、榆河驿、双塔、土城、辛店、南口到居庸关的古道。而改走京城、清河、沙河、昌平永安城、南口至居庸关了。

榆河驿虽然后来搬了家，但是曾设驿站的大榆河村仍叫榆河驿。

我们讨论的榆河驿，就是原始的榆河驿。大榆河村的位置现在在哪里呢？

原来的南沙河叫榆河，所以在河边就衍生出来了大榆河村和小榆河村。民国年间人们逐渐把榆河根据谐音改成玉河。榆河

之名就逐渐消失了。

现在南沙河北岸有海淀区上庄镇的北玉河村和南玉河村，南岸有海淀区西北旺镇的东玉河村和西玉河村。这四个玉河村谁是原来的大榆河村和小榆河村呢？《海淀区地名志》上记载，南沙河南岸的西玉河村是小榆河村，1948年改称西玉河村；东玉河村是1983年合并公主坟、袁家坟、果庄子、张庄子、刘庄子五个自然村组成的行政村。民国二十五年的《冀东分县地图·昌平县》中的南玉河村被标注为大玉河，北玉河村标注为北玉河，西玉河村标注为小玉河。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南玉河村就是大玉河村，亦即麻兆庆说的大榆河村；西玉河村就是小玉河村亦即小榆河村。

现在部队984医院东院墙外就是北玉河村。

北玉河村原本是南玉河村的耕地，民国初年，村民为了耕种村北的耕地方便，移居到村北才形成北玉河村。现在的南玉河村东半部居民居住的地方，解放前也是耕地，解放以后，因人口增加盖房才有了后来南玉河村新的格局。南玉河村子中央有通到南沙河岸边的南北走向的官道，村中官道西侧是一块台地，台地上是民房，台地高约1米，



古砖（作者供图）

村民称此处为“坎上”，台地南北长300米、东西长200米。官道在台地北侧分成东西方向两条官道。向西通往皂角屯村，向东通往沙河巩华城。官道向西拐弯处道北有一眼古井，井台的花岗岩水槽保存完好。推测此处台地似是榆河驿驿站官房遗址。因原来的榆河驿为避免水患，选在地势较高处。

南玉河村现在已经拆迁，也许未来的考古会更进一步证实南玉河就是麻兆庆在《昌平外传》里说的大榆河，就是《西关志》里说的榆河驿。

昌平清水店初探

杜泽宁

唐代，北京西山的黑龙潭古水亦为清河之别源，有发源于昌平县山涧的高梁河流过，下泄清河。

在梳理北京清河流域史料时，发现唐代的带州孤竹县侨治处，名称“清水店”。一说在今海淀区太舟坞的黑龙潭，一说在海淀区的清河镇朱房古城，考其辖域旧地都曾隶属昌平州，故曰“昌平清水店”。

《旧唐书·地理志》曰：“寄治清水店者，带州、孤竹县也。”《新唐书·地理志·羁縻州》称：“带州，贞观十年，以契丹乙失革部落置，侨治昌平之清水店。”《昌平外志》云：“唐村名，清水店（带州孤竹县侨治处），今泰州务。”



辽代契丹壁画（作者提供）

追溯历史，七世纪初为安置契丹归附部落，唐朝廷开始在边地州郡设侨置州，谓之“羁縻州”，相当于现在的民族自治地区，自立范围仅限于一州或一县。有资料载，唐武德年间（618—626），一支契丹部落接受唐朝封赏，置地为辽州，后更名威州。贞观二年（628）又有契丹部落降唐，置地为昌州，另一室韦部落为师州。贞观十年（636）契丹乙失革部落归附，置地为带州。贞观二十年（646）降唐的契丹曲据部落，置地为玄州。这五个羁縻州均安置在营州域内（今辽宁省西部地区），治所在柳城，隶营州都督府。此后析分威州部落设诚州，析分昌州部落设沃州，析分带州部落设信州。

《旧唐书》记载：贞观十九年（645），置带州契丹乙失革部落于营州界内；万岁通天元年（696）南迁青州安置；神龙初年（705）又在幽州（今北京地区）设带州，隶幽州都督，即接受幽州节度使管辖，治孤竹县。天宝年间，带州“领县一：孤竹”。孤竹为商周方国名称。

据北宋《太平寰宇记》载：孤竹县“殷时为孤竹国，春秋时为山戎之地，战国时其地复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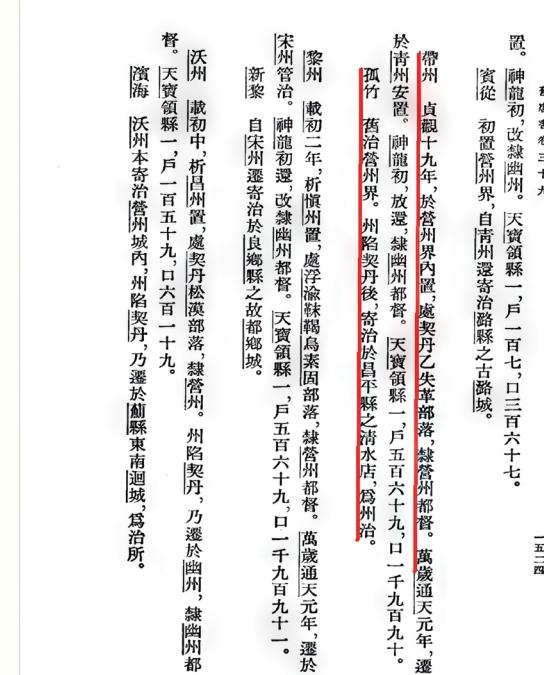


《昌平外志》书影（作者提供）

燕。”孤竹国是殷商时期在河北东北部和辽宁西部地区的一个重要诸侯国，孤竹国政权在今河北省卢龙县一带。《括地志》记载：“孤竹故城在平州卢龙县南十二里，殷时诸侯孤竹国也，姓墨胎氏。”孤竹国灭亡之后，其黎民融合于其他民族之中。

有资料载，寄治在幽州地区的带州，下辖的“孤竹县”有民户五百六十九户，人口一千九百九十人。^①这些人被安置在幽州城北清河流域，临河设县，筑城安居，被纳入唐王朝的羁縻统治之下。《旧唐书》云：“州陷契丹后，寄治于昌平县之清水店，为州治”。州治即古代州的治所，州是古代地方政区名，治所是政府驻地。也就是说，带州的州政府设在昌平县清水店。那么清水店在幽州的哪个地方呢？文献并未详述。

^① 麻兆庆：《昌平外志》引《旧唐书·地理志》“天宝领县一，户五百六十九，口一千九百九十人。”



《旧唐书》书影（作者提供）

清朝光绪年间，昌平学者麻兆庆在《昌平外志》一书中披露：“（昌平）州西南有村名太州务，疑为带州孤竹县侨治处。带、太同韵，转‘带’为‘太’；孤竹，音省为‘务’。”太州务是由“带州孤竹”谐音转字而来，由此形成“泰州务”“太州务”“太舟务”“太舟坞”的地名演绎。《光绪昌平州志》载：“龙潭在太舟务西。”1992年版《北京市海淀区地名志》释为：太舟坞“地处幽州城去蒙古高原的大道上，又有黑龙潭的丰富水资源，被认为是古清水店，唐代寄治的带州州治。”

黑龙潭是清水店？太舟坞是清水店？契丹部落的带州治所在清水店？当代历史地理学者、北京市社科院研究员尹钩科先生提出观点。认为“带州孤竹县侨治处是今泰州务”有一定道理，

对“黑龙潭是清水店”给出商榷性结论：“更值得思考的是在清河镇附近，有一座古城遗址。”据此指出：“作为一个汉代城址，唐代侨置带州及孤竹县于此是完全可能的”。

由此引申，清河古城建于秦汉之际，是蓟城（幽州城）的边城，曾是汉魏时期的昌平县城。^①唐朝在这里设带州州治，安置内迁的契丹部落是顺理成章的事。

清河古城距带州孤竹县侨治地的“太州务”约二十余里。如果将太州务或黑龙潭与清河古城相比较，无论地理位置、城邑规模、基础设施还是社会影响，清河古城都略胜一筹。



清河古城遗址（作者提供）

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唐朝对归顺的契丹部落既需加封追赏，又要管理防范，故而内迁分居、多地安置。寄治北京西山脚下太舟坞的带州孤竹县，是在昌平县域内划出的一块侨治地。契丹乙失革部落在划分的固定区域内，仍然过着游

牧、狩猎的定居或半定居生活，而带州州治则设在清水店。有学者考辨，这个清水店并非是与太舟坞半里之遥的黑龙潭。

因为，唐时的黑龙潭还是一个郊野水淀，是孤竹县侨治地内的一处水泊湿地。麻兆庆在《昌平外志》中说：“村西即黑龙潭，店名清水，其因此邪”。麻氏认为黑龙潭是清水店，也只是一种理性的推测，不敢确实，故而言之“其因此邪？”^②考虑到旧时“店”“淀”通假，都有湿地浅湖之意，可否理解为“淀名清水”，呼之清水“淀”？

多年以来，有不少学者提出过关于清水店位置的猜想，但始终未取得足以支撑的证据，笔者倾向于“带州州治在清河古城”这一观点。有民间学者考证：清河自古有“清水”之谓。清水，河也；聚落，店也；换言之，清水店即为清河店。考其文献，唐天宝年间，位于幽州城北的顺州和带州都是入内侨置羁縻州，居住在幽州地区的契丹人口已经有4600余户，2万余人，^③彼时顺州侨治蓟城（幽州城），带州侨治清河（清水店），唐代昌平县城在旧县村。

1953年清河考古，在清河古城有唐代散落遗存被发现，大多为中晚唐时期的贫民墓，其中出土三座唐辽时代的圆形起券砖室墓。在古代社会中，等级和规制是相互呼应的，古墓规制规模所代表的历史定式似乎印证着某些问题。1957年《文物参考资料》刊文，（清河）“在唐代叫做清水店。金代叫做大口城”。^④

① 岳升阳：清河汉城与两汉昌平城，《北京史学》2020年春季刊，社会科学出版社。

② 昌平县县志办公室：《昌平外志校理》第14页。

③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唐代契丹制度与幽州契丹的形成”，2008年第18卷第1期。

④ 文物参考资料编辑委员会编：《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期，顾炎培文。

六郎庄种稻历史不止 300 年

郎玉明

中国是水稻的发源地和主产国之一。国内专家认为中国的水稻种植至少可追溯至西周、先秦时期。《周礼·职方氏》载：“幽州……谷宜三种，其三种谷物，汉郑玄注为黍、稷、稻”。又据《后汉代·张堪传》载：东汉张堪任渔阳太守，“乃于狐奴（今顺义）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实”。顺义至六郎庄仅 50 千米路程。六郎庄水源瓮山泊（昆明湖）水域形成于 3500 年前，是在河滩基础上形成的浅水湖泊，六郎庄先民在这种优越的天然条件下，具备了早期种植水稻的条件。

六郎庄惯以种植京西稻而闻名于世，京西稻始于康熙时期是人们的共识。然而六郎庄的种稻历史应该超过现在被大众认知的 300 年历史。对于这个问题笔者重新翻阅《日下旧闻考》，有了新的发现。

《日下旧闻》是迄今所见清代官修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考据最详实的北京史志文献资料，为清代朱彝尊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编成。乾隆四十七年（1782）乾隆皇帝命于敏中等在朱彝尊《日下旧闻》的基础上删繁补缺、援古证今、



京西稻保护区（林琳供图）

逐一考据而编就《钦定日下旧闻考》一书。书中以“原”字头为录前书所列词条；以“补”字头为新增补内容。第五册 1408 页有原书句“西湖堤东，稻畦千顷……”句。众所周知西湖者乃今之昆明湖，此处“西湖堤东，稻畦千顷”所指应为昆明湖东侧六郎庄一带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前已经有大面积种稻的景象。《钦定日下旧闻考》五册 1411 页，朱彝尊还引用了明代王直《西湖诗》即：



耕织图局部（林琳供图）

玉泉东江浸平沙，八月芙蓉尚有花。
曲岛下通蛟女室，晴波深映梵王家。
常时凫雁闻清唳，旧日鱼龙识翠华。
堤下连云梗稻熟，江南风物未宜夸。
王直（1379—1462），明初政治家、诗人，官至太子太师、吏部尚书等职，去世于天顺六年。朱彝尊《日下旧闻》选用了其《西湖诗》中有“堤下连云梗稻熟，江南风物未宜夸”句，从侧面印证了六郎庄在明代已开始种植水稻的历史。

康熙帝玄烨创“一穗传”选择育种法，开始在皇苑试种，继而扩大种植面积。康熙五十三年（1714），在功德寺房4间、六郎庄房16间，设御用稻官场两处，六郎庄地区成为专为皇家种植贡米的基地。乾隆下江南选取优良品种“紫金箍”带回京城，于六郎庄南楼东侧试种成功。乾隆

二十九年（1764）春，颐和园昆明湖东岸立东堤碑，有句云：“……堤于墙间惜弃地，引流种稻看连畦”。同年修建东堤二龙闸及灌溉涵洞，说明六郎庄在原有水稻种植基础上又扩大了面积。此后历代均有描写六郎庄稻田的诗歌流传（详见《六郎庄历代诗词选》），又一次印证六郎庄种植水稻历史悠久且从未中断。

古籍记载北京地区种稻历史悠久，但是对海淀地区甚至到某个村落种稻情况的记载却凤毛麟角，按上述论据，六郎庄种稻历史距今至少已有600余年历史，当真是“京西第一村”啊！

参考书目：

《日下旧闻考》【清】于敏中等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京西稻百年传承与发展》杜振东

美丽校园说古树

王秀华

中央党校是座总体设计以颐和园景福阁为中轴线对称布局，有着精致的园林设计理念，万树葱茏、绿影婆娑的美丽校园。古人云：“名园易得，古树难求。”古树，是指树龄在100年以上的树木，而古树中的名木，更是具有重要历史、文化、景观与科学价值或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古树名木是承载文明记忆的活化石”，是有生命的文物，是自然与历史文化的双重遗产，其价值难以估量。令人庆幸的是，在中央党校校园的万绿丛中拥有一批具独特魅力与厚重历史的古树名木。笔者以一个非专业人士的眼光观察了这些古树，每一棵看起来都苍劲挺拔，而且几乎都有一段趣味盎然的故事。

方介眉宅园的两棵古柏

方介眉宅园建于清咸丰、同治年间。园址在中央党校北院东门内以西、电教楼、濯涟池一带，占地约10亩。园主方氏兄弟，均为进士出身，兄号介眉，弟号个眉。两人曾放任知府、县令，卸任回京后在大有庄修建了自己的宅园。宅园门东、西各有一棵桧柏，虽不显粗大但很挺拔，树皮棕褐色，呈纵条剥离。东边一棵树干呈扭转状，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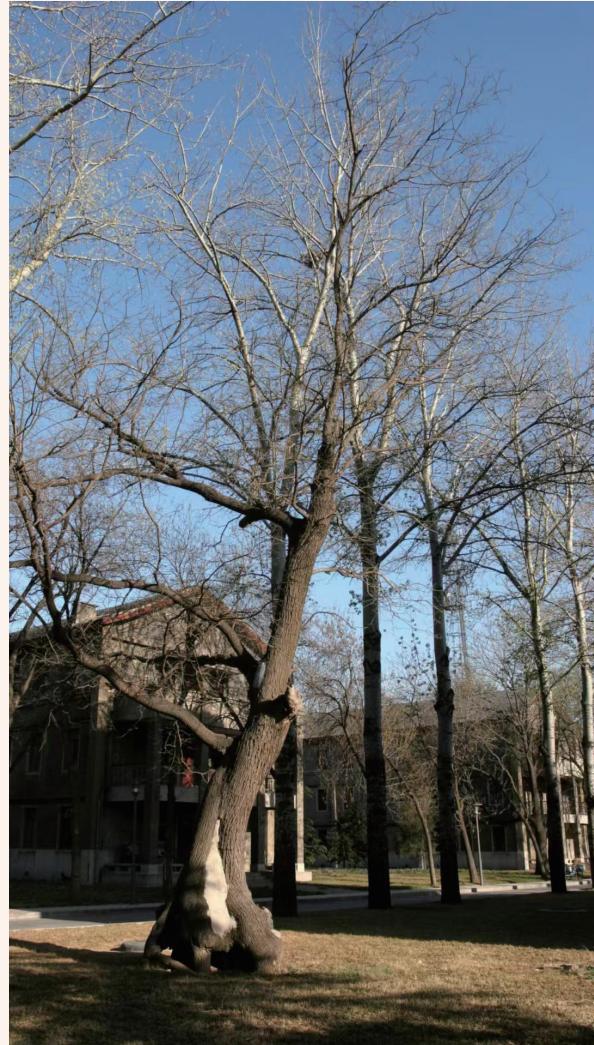
方介眉宅两古树（摄影王斌 作者供图）

旋。大枝扭曲，小枝直立，胸径约34厘米（《党校大有植物》108页）。树干上挂有标牌，写：

“古树，二级，编号：110108B01481，柏科：桧柏，学名：*sabinachinensis*，年代：清朝（约110年），北京园林绿化局2017年制”。西边还有一棵柏树与东边的柏树同龄，一样的苍劲葱郁，经笔者自测其树径有32厘米，但不知何故没有立保护标牌，也许是一块牌子涵盖了两棵古树吧。1997年以前，两棵柏树之间还堆叠着不少太湖石和两块上马石、石柱础以及几块磨盘，上面还有卍字会的标记，应该是方氏宅园的遗物，如今只剩几块太湖石了。如今这两棵古柏仍矗立在溪岸旁。水中树影婆娑，它们阅历过方氏宅园的兴衰起落，是这个宅园唯一的遗存。

丰益仓门前两棵古槐树

中央党校院内掠燕湖及学员楼15号楼、17号楼一带，是清代京师十三仓之一的丰益仓（又名安和仓）的旧址，为古代漕运文化的遗存。丰益仓建于雍正七年（1729），仓门三楹，大门朝东，占地约100亩，建有仓廒30座。1905年漕运制度废除后逐步圮败，仅仓门左右两边的国槐尚存。如今两棵槐树仍粗大茁壮、枝繁叶茂。17号楼东的一棵国槐的保护标牌上写：“古树二级，编号：110108B01485，豆科：国槐，学名：*sophorajaponica*。年代：清朝（约250年），北京市园林绿化局2017年制”。这棵古树树干有多个分支，形成一个大树洞。原住三岔口的狄敏老人曾说，他小时候和伙伴们经常在这个树洞里玩捉迷藏。这棵树的南侧是另一棵立有保护标牌的古槐，上书：“古树二级，编号：110108B0148，豆科：国槐，学名：*sophorajaponica*，年代：清朝（约210年），北京市园林绿化局2017年制”。这两棵古槐，不仅见证了丰益仓的兴衰，还见证



中央党校南门内东侧古树（摄影王斌 作者供图）

了一段抗战时期“自行车驼峰航线”的传奇。当年，法国友人、著名医师贝熙业大夫“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一条自行车‘驼峰航线’，把宝贵的药品运往中国抗日根据地”。七旬高龄的贝熙业大夫骑着自行车，驮着沉重的药箱，从东直门的甜水井胡同一直骑到阳台山下的贝家花园。再由八路军的交通员将这些药品和器械送往抗日根据地。贝大夫留有一张在途中停车小憩的照片，其中背景有些古树，经过位置与形态的比对，其中就有这两棵古槐。如今，这两棵有着不凡经历的古槐



中央党校南门外东侧古树（摄影王斌 作者供图）

树冠仍然盛茂青葱，绿荫匝地，既点缀着校园的景观，也营造了清新舒朗的小环境。

南大门外东侧的古槐

中央党校南大门外偏东侧有一棵古槐，当年它就矗立在丰益仓的运米辇道旁。多年前，因古槐的枝叶枯损比较厉害，有人曾建议伐掉，最终在中央党校相关领导的倡议下得以保存。其后几十年间又对此树进行过多次修整。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曾于2007年立有保护标牌，标为一级古树，是中央党校所属范围内唯一的一级古树。2017年

又更换了新的标牌，上写：“古树一级，编号：110108A01480，豆科：国槐，学名 *sophorajaponica*，年代：清朝（约300年），北京市园林绿化局2017年制”。2018年网文《海淀区青龙桥街道大有庄村及周边的古树》中这样介绍：“党校正门，也就是南门外，几乎是正对大门的绿地林荫道边，有一棵很粗的古槐，这棵古槐长势不太好。树身的很多地方的经过修补，主要的两枝树权，一枝已经死了，另一枝也只有不多的几根枝条，树叶倒还茂密，树的总高度大约只有七、八米”“我量了一下，胸围 / 胸径为 345/110 厘米，估计树龄在350年左右，大约种植于明末清初。”文章还说：“有大有庄张姓老人这样回忆，老槐树下是分别向南、向东、向西三条路交汇的路口，叫三岔口，树下有一间很小的关帝庙，他们说大有庄过去东南西北各有一棵大树，这是西边的一棵，其他三棵都没了。”这棵古槐长年矗立在中央党校大门旁，在各个时期的中央党校大门的照片中都能看到它的身影，早已成了中央党校的地标。

前两年这棵古槐曾被大风吹倒，据中央党校园林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对该树采取了一些新的复壮方法进行抢救保护。当时这棵树的树干已经中空了，里面经年累月堆积了很多腐败物。维修人员将其中的腐土和烂树叶全部挖出，填上有机质土，在树干顶部留有一个孔，以便往树干中灌水，促使古树逐渐生根发芽。这棵树虽仅剩一个根系，但老干仍然存在。维修人员就用其他槐树的新枝条嫁接在这棵古槐的树干上，并使用了树脂、树胶等封闭剂修补伤口，使老树母体的优良特性得以遗传给新枝，然后再把古树萌生的新芽取下来嫁接在新枝条上。园林工作人员的一系列抢救复壮措施于2022年六七月间实施完毕。树干架起四根支撑柱，古槐终于获得了新生。

南大门外西侧的古树

中央党校南大门西侧还有一棵立有保护标牌的古槐，标牌上写：“古树二级，编号：110108B01484，豆科：国槐，学名：sophorajaponica，年代：清朝（约200年），北京园林绿化局2017年制”。《海淀区青龙桥街道大有庄村及周边的古树》说其“胸围 / 胸径为 255/81 厘米，超过二级古槐径 60 厘米的标准，估计树龄约 200 年……张姓老人还告诉我，老槐树西边还有一棵老酸枣树，年头也比较长了。我在党校南门找到一棵酸枣树，胸围 / 胸径为 150/48 厘米，超过二级古酸枣树径 40 厘米的标准了，估计树龄 100 多年不到 200 年。党校南门外西侧还有一棵大榆树，胸围 / 胸径为胸围 / 胸径为 220/70 厘米，超过二级古榆树胸径 50 厘米的标准，估计也是 100 年不到 200 年”。文中所说的枣树和榆树目前都没有立保护标牌，应尽快采取相关措施，加以保护。

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古树？笔者想起，这里原来叫松树畦。在清漪园兴建之前，瓮山（万寿山）上的林木并不繁茂。兴建清漪园后，在万寿山北面大有庄的西北，辟有苗圃，以培育各类花木，称为松树畦。这几棵古树应该都是松树畦的遗存。

弘佑天民牌坊两侧的古绦柳

中央党校掠燕湖畔弘佑天民牌楼的两侧各有一棵绦柳，树干粗壮，树冠庞大，《寻觅校园里的漕运文化遗迹》一文的作者董维军认为，这两棵古柳与丰益仓有关联，他说：“掠燕湖是安河的旧河道，沿河置柳是我国多数河流及运河整治的重要特征。其中最古老的两棵古柳树就在第一食堂北侧湖对面‘弘佑天民’牌楼的两侧……中央党校所在地曾是重要的漕运河道和皇家粮仓，

也应有配套的漕运码头和相关设施，尚值得进一步考证。”

笔者测量了古柳的胸围，西侧古柳胸围 340 厘米，胸径为 108 厘米；东侧古柳胸围 264 厘米，胸径为 84 厘米。两棵古柳应该也有 200 多年的历史。再与旧地图比对位置，这应该是丰益仓漕运码头的旧物，跟丰益仓前的古槐一样，都是古代漕运文化的遗存，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但目前还没有立保护标牌，应尽快加以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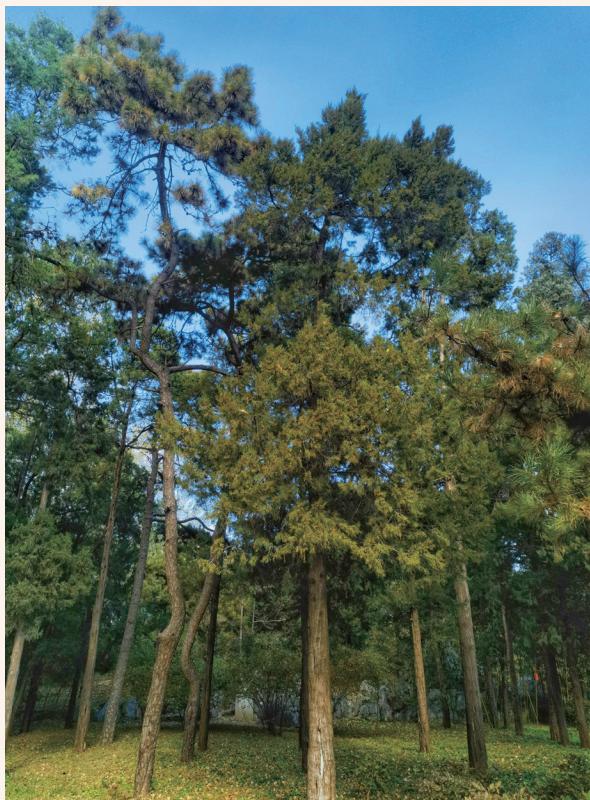
“西来石”旁的古槐

中央党校校园西南角“西来石”东侧有两棵古槐，较为粗壮的一棵立有保护标牌。上面标注：“古树二级，编号：110108B01483，豆科：国槐，学名：sophorajaponica，年代：清朝（约 240 年），北京市园林绿化局 2017 年制”。另一棵虽没有立保护标牌，但经笔者自测其树的胸径为 57 厘米，所以也应该是一棵古槐。这两棵树的位置在已消失的古村落三岔口的村口。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由于中央党校建设新校园将三岔口村大部分土地征用，2006 年，三岔口村彻底拆迁。风轻轻吹过，这两棵古槐发出的“嗦嗦”声，似乎仍在讲述着昔日的田园故事。

校园西南的古松柏林

中央党校校园西南角有一片古松柏林，其中有 3 棵油松、32 棵柏树。这一片松柏林位于原三岔口村旁，这是一处太监的坟地，故俗称“老公坟”。这里立有青石墓碑一统，碑额上镌“兄友弟恭”四字。根据墓碑和墓主家人所述可知，这里是狄文贵、狄盛宝兄弟的合葬墓。狄文贵，咸丰四年（1854）生人，卒于民国十年（1921），逊清皇室钦加四品衔，赏戴花翎，宁寿宫、乾清宫、长春宫总管。狄盛宝，生于咸丰十一年（1861），卒于民国八年（1919），清室钦加六

品衔，赏戴花翎，升平署总管。落款镌刻有“中华民国十年岁次辛酉七月吉日立”“孝侄狄德禄等”。1937年，日军飞机轰炸西苑一带时扔下两颗炸弹。一颗落在西苑附近，另一颗正好砸在坟上。坟地被炸成两个大坑，石碑被炸倒，但没有毁坏。1961年墓地被中央党校征用，地下棺木、尸骨由其后人狄敏出面迁至青龙桥后红山南坡。据狄敏口述，在建墓地的同时，种植了这片松柏林，至今也有100多年了，占地约一亩地，如今这一片松柏仍然挺拔葱郁。



校园西南角的古松柏林（摄影王斌 作者供图）

林中的32棵柏树经笔者自测，一般树径约21至32厘米，符合柏树百年以上应有的尺寸。几十年前就曾听几位负责基建的老人说校园内有三棵古油松，但没有说具体位置。我发现这片松柏林中正好有三棵油松，树径在30至35厘米左

右，也符合百年以上古松应有的尺寸，也许这就是那些老同志说过的三棵古油松。这片古松柏林目前没有保护标牌，却是校园内最大的古树群，且历百年之久，也应加以保护。

西公所内的古松

中央党校西公所院在大有庄蜈蚣街之东，紧邻国际关系学院，清末时称“绿杨别墅”，后被封氏一家买下，20世纪50年代末被中央党校征购，90年代中改建为“绿杨宾舍”。2012年1月被海淀文化委员会定为“海淀文物普查登记项目”。

院中原有一棵200多年的高大古松，笔者对此树是否有标牌现已印象不深。最近，经园林部门有关人士说古松树几年前就已不在了。西公所内枝叶茂盛、松柏常青，非常幽静、清爽。院中有杨、海棠、杏、枣、榆、柿子、桑、柏、楮、槐、桂等树木近300株。其中两棵高大古槐矗立于院内东墙门楼两侧，目前还没有立保护标牌，故不能确定其年代。另据一些党校老人回忆，西公所院内的几棵古松在党校建校初期被移至主楼前的空地上，直至今日依然苍绿茂盛。

结语

中央党校美丽的校园虽仅为方寸之地，但与北京的三大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和长城文化带中的前两项息息相关。古树名木承载的正是校园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园林景观的多年建设经营，使不少古树名木得到保护，这些有生命的文物默默地见证着中央党校的成长发展，是中央党校人的骄傲与自豪。经过几代党校人的共同努力，校园呈现出环境园林化、景观人文化、绿化生态化的风貌，愿这些“活文物”枝繁叶茂、茁壮生长，继续承载好记忆与乡愁。

慈寿寺塔影像小史

冯经龙



图 1

慈寿寺塔，亦称永安万寿塔，俗称八里庄塔、玲珑塔，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八里庄路北侧的玲珑公园内，1957年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5月3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关于这座塔的历史沿革、建筑结构、塔上的金刚砖雕、故事

典故很多人都已了然于胸，本文就不过多介绍。笔者收集了一些不同时期慈寿寺塔的相关照片，希望能够从照片中做出判断分析，回溯这座古塔几个时期的不同。

这座塔的影像资料，后世广为流传，因为其地域上的开放性，任何过路的人只要持有摄影设备，都可以从各个角度记录下它的全貌，在笔者所见到的各种照片中，慈寿塔最早的照片资料可以追溯到1875年前后。该照片为英国摄影师托马斯·查尔德所摄。托马斯是学习建筑出身，成为一名燃气工程师，来到中国后，驻足近二十年，对北京的古迹遗址非常感兴趣，进行大量的拍摄。笔者从两个地方收到了他拍摄后被制作成的玻璃片的早期慈寿寺塔的影像，两张为同

一时间拍摄，体现了两个角度。（图1、图2）

图1为玻璃片彩色照，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慈寿寺建筑还存在，包括一座红墙绿琉璃瓦的券门，门旁有石柱一座，该角度能见到碑亭，较远处所见顶端为绿琉璃瓦，而近处的碑亭则为黄琉璃瓦。围墙尚完好，周围植被茂密，且碑亭顶端长出了杂草，这说明此时对该寺的维护已经不太用心了。此外，塔后也能看到一座碑亭的轮廓，可以判断，当时应是有四座碑亭。

图2几乎可以确定为同一天拍摄，只是角度不同。参照一是其碑亭和图1不同，顶上没有杂草，且山门位置不同。参照二是慈寿寺塔顶端的树枝位置，图1露出的较多，而图2则只露出了一角。图2更清晰的展示出围



图 2

墙的斑驳，也再次佐证了当时的慈寿寺已经疏于管理的事实。

资料仅记载慈寿寺于光绪年间失火焚毁，仅以塔免。而1875年是光绪元年，从时间和照片所显示的状态来看，基本是对得上的。有书刊杂志也用过其中一张照片，但标注时间是1890年。这个标注年份不符合事实，因为该照片的作者托马斯·查尔德已于1889年返回英国。

到了清末，清廷自身难保，更没有心思关注这么一座寺庙，于是这里就成为了附近农民的天地。从图3可以看到，摄影的主体对象并非是塔，而是塔附近



图 3

三位正在开荒的农民，远处还有两人在观看。从照片中模糊的衣着来看，这二人像是日本人或者朝鲜人。这张照片约照于光绪后期，之所以如此判断是因为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围墙尚在，但是券门和碑亭都已经没了，而可以和图1对照的山门旁的石柱以及石柱旁的碑尚在，这个时候可以看出慈寿寺周边还没来得及收拾。但这样的地方，历来都是严格管理的，如今却可以在附近进行耕种，说明清廷已经不打算再继续使用，完全放弃了管理权。

清朝灭亡后，慈寿寺真真正正的只剩下地名，但按照《日下旧闻考》的记载，因距阜成门八里，该片区域被称为八里庄，按照老百姓的俗称，当时最大的可能是塔亦被当地百姓称呼为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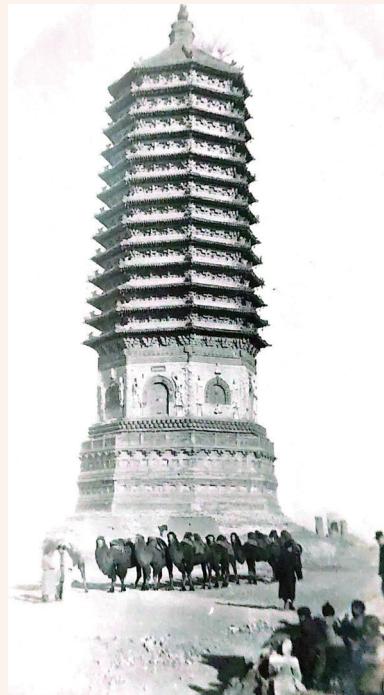


图 4

里庄塔，而非慈寿寺塔。由于所收集的照片带有题记的不多，按照比对，笔者找到了一张拍摄于1913年的慈寿塔照片（图4），背后还写了一行英文：“Stories



图 5

Pagoda way to Western Hill”, 意为“通往西山路上的宝塔”。从照片中可以看到，此时塔基周围有残存的围墙，这是它的内围墙。图 1 的完整围墙，如今已经残破不堪。塔下有一队骆驼走过，按照片的题记，通往西山……我们可以判断这是一只从东往西的队伍，旁边还有很多百姓在围观，给苍凉的塔下增加了一丝热闹的气氛。

1921 年（照片题记标注），慈寿寺塔周围已经种满了玉米。从照片（图 5）可以看到，塔的内围墙已经被重新修建了起来，其样式看起来更像是临时搭建的，所起到的作用是用来保护塔，隔离它与耕种的农民。还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应该是夏季，塔周边的植被也非常

茂密，塔下有两个人影，他们正在交谈，左边的人身穿一身白色西服、长西裤，头戴白色遮阳帽，右边的人则是一身深衣，有意思的是图 5 右边照片是一张塔下人像近照。也是一位白衣人士，可以看到塔周围夏季种的玉米已经收割完成，此时应该是初秋时节。两张照片的白衣人士，应该是同一人，他在不同时间来观摩这座宝塔。而他的身边则是一位还留着清朝发型的当地百姓，看样子是他雇来的佣人，手持一根秫秸，只不过白衣人士骑的是一头毛驴，看起来颇有一番趣味。

从上面的诸多图片中可以看到，作为一座饱经风霜的古塔，尽管到了清末寺庙诸殿已无踪迹，但慈寿寺塔始终保存

完好。虽然也经历了一些破坏，如盗窃塔内装藏，拆毁周围残存的石构件和围墙，但仍然挺立在京西一带。（图 6）展示了若干百姓正在对慈寿寺周边的石构件进行拆除搬运的场景：最远处，塔基座上还站了几个人，想必应该是在观察上面的石雕是否有敲下来的可能，很多砖塔的大小砖雕都是以这样的方式被敲掉的，其原因多半是受雇于他人。

照片（图 7）是张慈寿寺塔的正面照。题记标注摄于 1927 年，此时已经是民国时期，可以看到围墙又变成了残垣断壁的状态，连 1921 年所搭建的临时围墙也被拆得一干二净。有意思的是上边这张则是摄于 1925 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临时



图 6

搭建的围墙还在，这张照片可以和图5组图左边的那张做对比，墙是相同的材质所筑，但角度不同，区别就在于塔左下角的石碑，一个角度是正面朝向，一个则是侧面朝向。图7上面照片中还可以看到一段篱笆，这应当也

是当地百姓放置的，作用是隔离塔和耕种土地的界限，实际上，仔细看一下也能看得清楚，篱笆靠外的土地是一片杂乱，而靠里的地方则有明显被犁过的痕迹，这说明当时的政府虽然没有严格命令什么，但相关部门还是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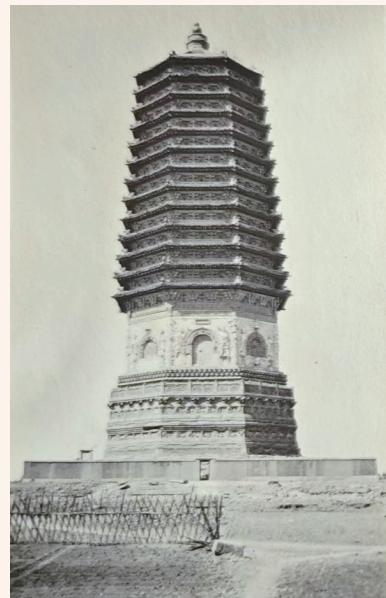


图 7

该塔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管理。如今，我们再也无法寻觅到旧时慈寿寺塔照片上的痕迹，它已经被铁栅栏保护起来，附近整片场地改建成玲珑公园供大家游玩，住在这里的居民如今更习惯称其为玲珑塔。

回顾 2011 年时的颐和园博物馆

王 杰

颐和园博物馆前身为文昌院，根据发展需要于 2021 年 9 月 28 日更为今名，并悬以蓝底金字“颐和园博物馆”匾（下文中仍使用“文昌院”旧称）。

文昌院位于颐和园东宫门南侧、昆明湖东岸文昌阁之东，是清代光绪皇帝的御膳房，因傍文昌阁而得名。

文昌阁始建于乾隆十九年（1754），取意文运昌盛，城基上原为三层阁楼。光绪十七年（1891）改为两层，但阁楼内仍按乾隆时期形制供奉文昌帝君铜像和传说中帝君的坐骑铜特，阁楼外南侧券门上方留有乾隆御书“文昌阁”石匾。文昌帝君。通常被人们认为是主管考试、命运及助佑读书人撰文之神，是读书文人、求科名者最尊奉的神祇，因而受到民间的奉祀。从周朝以来，历代都相沿制定礼法，列入祀典。清代，每逢文昌帝君的诞辰旧历二月初三，朝廷都要特意派遣大臣前往都城的文昌庙祭祀。

1992 年，随着北京旅游事业的发展，为进一步挖掘颐和园的文化内涵，开始酝酿该建设项

目。后经专家多次踏勘论证，最终于 1998 年得到国家文物局、北京市文物规划部门批准并开工建设。2000 年 6 月，完成地下文物库 2884 平方米和地上 2777 平方米展厅的建设。同年 7 月 25 日，颐和园启动文物迁移和布展工作，8 月底完成迁移布展，9 月 1 日正式售票开放。

文昌院是一座大型院落，南依围墙后墙，北靠颐和园消防队南墙，东至颐和园东围墙，西临昆明湖东岸。当时设有东、西两门。东门入口不远便是坐北朝南的文昌院展馆。

其门前用砖铺设出宽敞的广场，广场北侧是一道磨砖对缝上面布有富贵牡丹、龙凤戏珠砖雕图案和各种造型玻璃透窗的灰色院墙，正中是一座古香古色的三间殿宇，明间是一扇对开的大红门，门前汉白玉须弥座上立有一对威风凛凛的铜狮。左边雄狮爪下戏绣球、右边雌狮爪下戏幼狮。门楣上方悬挂蓝底金字“文昌院”（现为颐和园博物馆）三个隽永大字匾。门内朱漆彩绘、画栋雕梁的殿宇游廊显得格外的雍容华贵，丝毫不失颐和园皇家园林所特有的王者气度……

文昌院的主体建筑采取世界通行的展品库和展馆相结合的设计模式，分为地上展厅和地下文物库两部分：地上展厅由综合展厅、书斋、瓷器馆、玉器馆、铜器馆、聚珍馆等六个部分组成；而地下文物库则采取高科技的调控手段，保持常年恒温、恒湿，以确保文物存储需求。建筑形式上继承中国传统四合院制式，中央大殿通过游廊连缀东南西北四方殿宇，又以回廊封闭形成相对分割的院落。营造出清晰明朗的游线和良好的通风采光效果。

文昌院各展室的展品都是颐和园藏文物的珍品和特色藏品以及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观赏价值的文物。展品上自商周、下迄晚清，包括铜器、玉器、瓷器、金银器、竹木牙角器、漆器、家具、书画、古籍、珐琅、钟表、杂项等，几乎涵盖中国传世文物的所有门类，更有堪称“镇园之宝”的虢宣公子白鼎、三牺尊、缂丝长袖佛像图等国宝级珍品。

综合展厅

位于院落正中，坐北朝南、面阔五间，前出三间抱厦，门楣悬挂“圣集大成”匾。厅内展有玉器、铜器、古画等种类文物 60 余件套。

殿内正中陈列着一部仿古书形铜雕，上面镌刻着北京大学吴小如、白化文两位先生用骈体文撰写的《文昌院记》。

铜雕的东部靠南墙展柜中陈列着“金漆梅花树船八仙过海盆景”。展品以象牙为主原料，造型为一株梅花树根部船型内载有持器物的八仙人物盆景，树干饰以金粉，花朵用珊瑚制成，花心嵌以珍珠，船周围浮以水怪。旁边是以四季为主题的“百宝嵌四季插屏”，插屏选用玛瑙、青玉、黄玉、白玉、芙蓉石等料器贴绘出四时花鸟图案：春季玉兰、海棠、牡丹配以黄色小鸟，凸

显“玉堂富贵”内涵；夏季荷花配以鹭鸶鸟，呈现“鹭鸶卧莲”内涵；秋季菊花、桂花配以戏水鹤鹑，示意“安居乐业”内涵；冬季梅花配以喜鹊，承载“喜上眉梢”寓意。

靠东墙是玉器展柜，里面陈列着清代仿青铜器中酒器造型、以整块白玉雕制而成的“白玉双凤纹六环尊”、采用圆雕手法雕制的“白玉鱼瓶”、以碧玉为料器雕制的文房佳品“碧玉蝶耳活环缠枝番莲洗”以及乾隆年间将汉代玉璧与清代紫檀融为一体“嵌汉玉璧紫檀插屏”，整块青玉雕制而成遍布云龙纹浮雕图案的“青玉云龙纹笔海”，光绪年间制造的上为青绿粉红等颜色绘制的九条云龙纹样、内为松竹梅兰及花卉、底为描金戏珠龙“粉彩轧道九龙纹碗”，清咸丰年间制作的“青花加紫海水云龙天球瓶”等器物。

靠北墙陈列着慈禧太后亲笔绘制的牡丹、兰花、菊花、梅花图案“慈禧花卉四扇屏”，同治年间制造、开光中填画唐代大将郭子仪七子八婿为他祝寿场景图案的“粉彩开光人物太狮少狮大耳瓶”。

铜雕西部的陈列品以青铜器为主。包括商代晚期用来盛酒的大型酒器“父癸罍”，西周年间制作、以内壁刻有内太子白字样和长颈椭方壶形制命名的“内太子白壶”“象耳方格纹壶”等。然而最有气势的还是“饕餮纹三牺尊”。

“饕餮纹三牺尊”是颐和园的镇园之宝之一，为殷商时期制品。尊是古代用来盛酒的酒器，后来演变为祭祀的礼器。当时的青铜器多以动物纹样充斥器物，而饕餮纹是广为应用的。相传饕餮是龙之九子之一，既贪财又贪吃，在吃遍天下所有的美食后，回身看到自己的身体，于是也将身体吃掉了，仅仅剩下头部。《左传》把饕餮解释为“贪财为饕，贪食为餮”。该器物上共有三个

完整的饕餮纹，每一个饕餮纹均是由牛头（又称牺首，古时祭祀或祭拜都要杀毛色纯的牲畜，人们把它称为牺牲，牲畜的头称牺首，该尊的肩部为三个牛头，所以称为三牺）及下方呈JL形的鼻子，两旁圆形的眼睛，眼睛上方云纹状的眉毛，鼻子底下卷曲的胡须和立着的獠牙组成。在制作中采用了青铜器中十分少见的“三层花”雕刻工艺，即：在主纹饕餮纹周围，以精细的几何图形作为底纹烘托，在饕餮纹较为宽大部分处施以阴刻技法作补充，从而形成多层次的浅浮雕艺术效果。

此外，还有一架至今能弹奏十六首（包括蓝色多瑙河在内）世界名曲的“八音琴”和一件清末大臣们送给慈禧的寿礼“紫檀镶玉船型首饰盒”。

书斋

位于综合展厅之东南侧配殿，面阔五间。在《辞源》中解释为藏书室。而这里的书斋则是按照晚清时期皇室贵族读书时的陈设布置的。

书斋的明间陈列着造型精美华丽、雕刻细腻的“紫檀画珐琅九龙宝榻”。“榻”是指狭长而较矮的床，汉代刘熙《释名·床篇》曰：“人所坐卧曰床……长狭而卑者曰榻”。

这件坐榻遍布云纹雕刻，且宽绰、硕大。五扇屏风和扶手将约三米长的床榻紧紧围拢。屏风的中间一扇高高耸起、左右两扇略矮，再左右两扇仅高于扶手十余厘米。在围屏和扶手框内饰有九条画珐琅龙和海水纹样，形成九龙闹海场景；在榻上摆放着一张紫檀炕桌，两边铺设黄缎坐垫。榻前左右地上各一脚踏。榻的两侧为木雕镂空类似帷幔形式的隔断。

次间和进间内设书柜，还有书橱、书箱、书阁、书案等家具和一些文房四宝、钢琴等文物。

书柜内藏纂于清代康雍年间、汇合经史、天



展厅（作者供图）

文、地理等内容，有1万卷、6汇编、32典、1.6亿字的《古今图书集成》一部。

这部将古今中外各科类知识融合在一起的类书，被清代雍正皇帝称为“集五帝三王孔子之大成，集经史诸子百家之大成”，当时的学者也给予极高评价“诚册府之巨观，为群书之渊海”。可见该书已成为当时最高统治者提高自身文化修养乃至安邦治国的必备工具书。

瓷器馆

坐落在书斋南东廊，面阔五间。瓷器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与汗水的结晶。早在东汉时期，我国就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瓷器。明清时期我国的制瓷技术和工艺达到了极高的水平。馆中陈列的主要是明清两代的50余件瓷器，包括：青花三友玉壶春瓶、郎窑红观音瓶、粉彩瓶、孔雀绿釉蕉叶尊等。

大殿靠窗展柜中陈列着清同治款“青花三友

玉壶春瓶”。其名源于“玉壶先春，冰心可鉴”的诗句，瓶为撇口、细颈、圆腹、圈足，弧线柔和，器形均匀优美。瓶的颈、肩、下腹部分别装饰青花蕉叶、卷草、如意云头和莲瓣纹，腹部绘有中国文化中常见的松竹梅为题材的“岁寒三友图”。

旁为明代万历时期使用进口回青料制作的青中泛紫、深而不发感觉的“青花觚”和清代光绪年间使用国产浙料制作的清新活泼、发色鲜艳、带有淡淡水墨画风格的“青花爵”酒器。再旁是清康熙年间江西巡抚兼御窑厂督理郎廷极主持景德镇窑务时仿明宣德时宝石红烧制的脱口垂足“郎窑红观音瓶”。郎窑红因火候难以控制、成品甚少，再加上康熙以后停止生产，所以世间较为罕见。

郎窑红观音瓶旁陈列着清康熙款“釉里红海水龙纹瓶”，雍正年制“黄釉罐”和乾隆年间仿龙泉窑制作、器型很像大蒜的“仿龙泉窑出筋蒜头瓶”等。

西南展柜陈列着清乾隆年间制成的“孔雀绿釉蕉叶尊”。孔雀绿釉是由元朝创烧的孔雀蓝釉等瓷器品种发展而来，以铜作为着色剂的低温色釉，因釉色像孔雀羽毛一样雅丽青翠而得名。这件作品的颈部雕刻的是盛行于元、明、清时期的蕉叶纹，肩部是如意云纹，腹部是以莲花为主体的缠枝纹，整件作品不但将瓷器精细的胎骨、润美的釉色、精湛的雕工集聚于一身，而且凝聚着匠师的智慧创造。

靠北墙陈列着“粉彩瓜瓞纹如意耳瓶”。粉彩是瓷器釉上彩的一种，创烧于康熙，极盛于雍正。其制作方法是先以1000℃的高温烧制出素瓷，然后在素瓷上涂抹玻璃白打底，待玻璃白干后，再用掺入铅粉的粉彩进行绘画，最后再入窑

经过低温烧制而成。该瓶口部描金、内施绿釉，通体以胭脂红色为底，瓶身以26只瓜和10只蝴蝶构成瓜蝶交织图案，尤以颈口形似猫眼的倒挂蝴蝶最为不同，它取谐音耄耋，全部图案赋予子孙昌盛、多子多福的寓意。

旁边是清同治帝大婚时使用的、以红色为底色上面用粉彩绘画出吉祥图案、正中开光处有一个双喜字、周围龙凤飞舞、底部落有“长春同庆”款识的“红地开光粉彩龙凤纹捧盒”和清道光年间仿古代“玉琮”造型制造的内圆外方、器身上模印八卦文饰的“仿哥窑琮式瓶”等。

玉器馆

位于综合展厅之东北部配殿，面阔三间。玉器在我国有着7000多年的历史，人们按矿物学原理将其划分为软玉和硬玉。软玉主要指产于新疆的和田玉，硬玉指的则是翡翠。展厅中所陈列的玉制品以中国古代玉器巅峰清乾隆时期的40余件代表作为主。

进门陈列着矩形黄花梨质地“多宝阁”。由高低错落的9个小阁组成，每小阁外缘均镶有卷草式染牙，基座上安置两层，下为云纹圭角。阁内陈列不同质地硬木托座和玉雕品。上层三阁分别摆放：双犬、并蹄莲、双子献寿玉件，中层三阁分别摆放：卷叶水盛、长寿如意、福寿水盛玉件，下层阁摆放：暗花笔筒、佛手玉件和镶古书状骨雕。阁旁陈列两个小童给大象洗澡情景的“白玉雕双人浴象。”

旁边陈列着清代大臣送给慈禧的五屏峰式样“嵌玉桌屏”。其顶为透雕松竹梅图案帽儿，基部须弥座，上、下枭精雕莲瓣巴达马，束腰浮雕仰俯莲，转角金刚柱雕椀花结带。中间木制三屏峰上嵌不同造型白玉，并以不同颜色宝石粘成九组图案，即：左边自上而下分别为二甲传胪（又称

“金玉满堂”）、鹿鹤同春、福从天降；中间自上而下分别为鸭子探莲、三羊开泰、太狮少狮；右边自上而下分别为连年有余、蝈蝈白菜、海晏清河。两边木屏峰上嵌碧玉雕刻对联，上联为“圣德勤日新游豫为诸侯之度”、下联为“寿征驻春永上下与天地同流”，联下有“延年”“益寿”两枚方章。两屏背面亦题“芝鼎春融万国梯航齐祝露”“罗图日永九天昌阖共瞻云”联。

再旁陈列“翡翠插屏”。插屏由一整块上乘的天然翠料制成，正面为“麻姑献寿”浮雕，左上角有“东王仙籍”四字，字右有纵书“乾隆御题”四字；背面雕有精美纹饰。其底座以象牙为原料，采用镂雕工艺，分三层。上层饰以饕餮纹，中层雕有鹤鹿同春纹样和栏板，下层为须弥座式，圭角、束腰、巴达马、配以卷草纹饰。整件作品素雅高贵，价值不菲。又旁为“青玉雕花如意”“青玉雕荷莲”“福禄寿玉砚屏”和紫檀座“碧玉刻御题诗填金插屏”。插屏之玉料呈墨绿色，正面是乾隆隶书“东郭还西墅，山家接水村。春朝庆老幼，丰岁足鸡豚。三代遗风在，一时深意存。治民无别术，饥饱俾寒温。”“山庄无别事，惟是祝年丰。纳稼村村急，高囷户户同。社常接鸡犬，邻不远西东。相聚农桑话，于于太古风。”阴刻填金诗，周围边饰莲花云朵；背面是依照诗文内容雕刻的田野农庄图，充分体现乾隆皇帝重农桑、重民生的治国思想和意愿。在插屏的旁边陈列着采用浮雕、透雕工艺手法雕刻的山水、人物、景观、庭院建筑图案的“碧玉笔筒”。

铜器馆

位于综合展厅之西北部配殿，面阔三间。馆内展出不同时期的青铜器 20 余件，器物大体分为：鼎、簋、豆、尊、壶几类。

在大殿东侧展柜内陈列着商代制成的“夔龙纹方鼎”和“饕餮纹三足鼎”。鼎是青铜器中功能最多、造型变化最大、使用时间最长、经历最为复杂的器物，最早出现于夏代时期，是烹煮和盛放肉食的器皿，到了商代演变为祭祀礼器。古有“铸九鼎以治天下”的说法，可见它的地位之高。“夔龙纹方鼎”体呈长方槽状，直耳、折沿、柱形足。器身外壁正中各有一道扉棱，扉棱两侧饰有云雷纹，其上部饰有夔龙纹，下部饰有带状乳钉纹。器身内壁铸有“丙父己”三字。柱足上各饰兽面，兽面下为两道弦线，四角也有扉棱。

“饕餮纹三足鼎”为直耳、折沿、侈口、圆腹、锥形三足，器身饰以带状云雷纹，云雷纹上又饰有三组饕餮纹。

旁边陈列“叔作彝簋”“三牺钮三足敦”“象足伯作鬲”“斜方格纹豆”等器物。“簋”是盛放饭食的器皿，其地位也很高，古有“天子九鼎配八簋”之说。该器皿为折沿、侈口、兽耳、垂珥、圆足，表面饰兽面纹和夔龙纹，内底铸有“叔作彝”三字。“敦”是盛放稻、粱等饭食的器物，是“鼎”和“簋”的形制结合发展而成。此敦为战国时期制作，器皿盖上有三个牺首，器身圆形锅状，肩部一对圆耳，下部柱状三圆足。

“鬲”是用煮食物的炊器。此鬲为西周制作，侈口束颈，分档袋足，上用简单线条刻画出大象的头眼，器物内部铸有“伯作彝”三字。“豆”是古代盛肉酱的食器。此豆为战国时期作品，侈口圆腹、双耳圆环形、托柄较粗、足圜底缘薄，器身铸有精致方格纹，足柄上铸有一圈云雷纹。

西墙展柜陈列着铸造于隋唐时期的侈口、短颈、圆腹、圜底、圈足，通体饰有阴刻缠枝纹“莲花尊”。旁为“错金银龙耳饕餮纹壶”“镏金绳纹壶”“龙纹蕉叶壶”。“错金银龙耳饕餮纹

壶”是宋代制品，为直口、短颈、圆腹、圈足，肩部饰一对错金银龙耳；壶颈饰带状云雷纹，上饰一组错金银凤鸟纹，腹部回纹装饰错金银饕餮纹和蕉叶纹饰，足部云雷纹之上装饰四个错金银凤鸟纹。“镏金绳纹壶”也是宋代器物，器型仿战国结绳纹壶形，直口、短颈，器身浑圆，上布四方结绳纹，肩部饰兽首衔环一对，圈足上铸造绳纹，器身采用鎏金工艺。“龙纹蕉叶壶”为明代仿汉壶形制，唇口微侈，平肩收腹，高圈足外撇，肩部兽首，腹部饰带状云雷纹，上铸龙纹、下饰蕉叶状兽首纹。

聚珍馆

位于综合展厅西部与瓷器馆相对的西廊庑，面阔五间。馆内展出的文物都是较为稀少的作品，共有 50 余件。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慈禧的“御用汽车”。该车是 1901 年袁世凯送给慈禧的一件礼品。车身为木质，马车车顶，两侧安有四个实心轮胎的木质车轮，在车头安有两盏可以调节的油灯，车内双层方向盘，两排座椅，在驾驶员座椅下装有一个三缸柴油发动机。这辆汽车的动力结构和转向结构原理都与现代汽车相同，是我国保存最完好、最古老的汽车。传说当年慈禧十分喜欢这辆“洋车”，曾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司机，但当时国人没有会开汽车的。有个叫孙福龄的小伙凭着聪明好学，很快掌握了这门技术，被慈禧选中，于是让孙福龄驾车带她在园中游玩。慈禧上车后，不能容忍地位卑贱的开车人坐在自己的前面，便下令拆掉司机座椅，让他跪着开车。而跪着开车，手不能代替脚去踩油门和刹车，心有余悸的孙福龄便想了一招，用破棉絮堵死输油管，并跪奏老佛爷：车子已坏，无法驾驭。就这样车子从此闲置。孙福龄因惧怕慈禧降罪举家逃出京城，而一心想坐汽车的慈禧太后也因此没能

再坐上这辆汽车。



聚珍馆（作者供图）

馆中数量最多的是家具。“紫檀嵌犀角雕云龙纹小立柜”和“金漆雕花小镜台”是很精致的家具。“紫檀嵌犀角雕云龙纹小立柜”是清代乾隆年间制品，由一组双门立柜和一组双门顶柜组成。在紫檀板面上镶嵌犀牛角雕刻而成的龙纹穿插于云纹图案中，柜门框上施以回纹，门锁上雕有蝙蝠叼蝉于荷花之上的图案，格调高雅、立意深远。工匠充分采用浮雕、线刻的手法将犀角细腻的质感与紫檀木静穆沉古的色泽巧妙的融为一体，不失为清代宫廷中一件难得的佳作。“金漆雕花小镜台”是清代宫中之物，多摆放在桌案之上，供人们梳妆时用。其式样如小方匣，镜台的四周装有围栏，前方留出豁口，底部装有三个抽屉，用来放置首饰。后侧的栏板内竖有五扇小屏风，边扇前拢，正中摆放镜子，不用时可收起，小屏风也可随时拆下放倒。

“火车头式座钟”“轮船式钟表”“沉香木雕寿星”“多宝三镶如意”“红珊瑚渔樵耕读”“硬木边嵌牙牡丹插屏”“竹根雕群仙泛槎”“檀香木八仙祝寿”等都是颇具特色的摆件。

“火车头式座钟”和“轮船式钟表”是由法国人仿照当时欧洲最先进的交通工具火车和轮



瓷器馆（琳琅供图）

船的样子制作、进贡给清朝廷的。这两件钟表机械构造复杂，用途广泛，除镶嵌钟表外还嵌有湿度计、温度计。通过表盘上弦孔给表上弦后还可以听到其模仿火车、轮船启动时的汽鸣声。“沉香木雕寿星”是利用沉香木树根的天然形状、采用圆雕和线雕技法雕刻而成。“多宝三镶如意”是清晚期以紫檀木为原料雕刻而成，图案雕饰繁缛，通体点缀珊瑚、玛瑙、绿松石等珍贵宝石，给人以精美华丽的感觉。“红珊瑚渔樵耕读”是利用珊瑚虫骨骼钙化后堆积形成的珊瑚天然树枝形状雕制的，通过渔夫、樵夫、耕夫和书生等人物浮雕，体现作者对田园生活的恣意和淡泊自如的人生境界的向往。“硬木边嵌牙牡丹插屏”是以象牙为原料、以象征富贵的牡丹为主题采用多种雕刻技法制作。“竹根雕群仙泛槎”是采用浅雕、深雕、阳雕、透雕、圆雕等多种手法将自然竹根雕成圆平船首、半圆形船身、随竹根自然弯曲上翘造型的船尾，船篷以桃树繁密枝干造型构成。六十多位形态各异、形神兼备的老者，或似高谈阔论、或似吟诗作赋、或是下棋赏画，一派其乐融融的画面展示于尺余长的船舱内。船下配以红木雕波浪纹底座，恰似仙槎海上漂泊。“檀香木八仙祝寿”是以木材奇香的黄檀为原料，正中雕有手举寿桃的寿星，周围雕刻手持芭蕉扇的

汉钟离、手拿拂尘的吕洞宾、爱吹笛子的韩湘子、手捧花蓝的蓝采和、倒骑毛驴的张果老、手持铁拐的铁拐李、荷花莲座上的何仙姑、手持玉板的曹国舅等八位仙人和青松、灵芝等寓意长青长寿的植物形成祝寿场景。

此外这里陈列了一些“粉彩文玩”。“文玩”是指文房四宝及其衍生出来的各种文房器玩，它的最大特点是小巧，既可供设于案上，又可把玩于掌中。这些精美的文具造型各异、做工精细，为展厅增添了文化氛围。“刘墉屏条”也是比较难得的。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不仅是政治家，更是著名的书法家。他的书法用墨厚重、浑厚敦实、别具一格。

文昌院院落的最西部，便是“耶律楚材祠”。耶律楚材为辽皇族子孙，生于1190年，是蒙古成吉思汗、窝阔台汗时的大臣，1224年卒，后葬于瓮山泊畔。清朝乾隆年间修建清漪园，挖湖堆山，将其坟墓东移到现在的位置，并立一块石碑以示纪念。颐和园对外开放后这里也一直对游客开放，直到建成文昌院后为更好的保护文物才将墓祠关闭。院内宇墙、殿宇均予重新砌筑、粉饰，院中的一尊翁仲、一座清乾隆御碑都是原件，三间地下墓穴依然保持原样。

颐和园拥有的四万余件文物，除在园内原貌展出或专题展出之外，基本都在文昌院保存。因此这里是中国古典园林中规模最大、品级最高的文物陈列馆。汇集此处的众多文物不仅极具文物价值、艺术价值、观赏价值，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工艺的真实写照，更对研究中国历史文化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彰显出这座皇家御苑的深厚历史和曾经的无尽辉煌……

（作者系颐和园工作人员）

百望山法国教堂

韩笑



天摩拱门（作者供图）



引水渠（作者供图）

百望山是北京西郊的一座小山，海拔约210米，是太行山脉北京最东段的一个山峰，故有“太行前哨第一峰”之称。

自百望山公园东门入，翻过山顶后，前往北门途中。

1917年，圣母会从当地人手中买下百望山山顶至山脚的连片土地。最初，教士在山坡上开垦梯田，种植葡萄，并送到城内的马尾沟教堂（现阜成门外北京市委党校所在地）酿酒，这就是龙徽葡萄酒的前身——上义果酒。

见一拱门，即天摩拱门。

天摩拱门始建于19世纪末，是法国教堂与外

界交通运输的必经之路，位于两山之间的鞍部。两边地形复杂，中间平坦，建门后易守难攻，门的宽度按照当时马车的宽度设计，建两门既解决了拱门跨度大不安全，又解决了雨季山洪下泻流量问题。其拱形为中国古代常用建筑形式。

过了拱门不远处可见一条百年引水石渠。

引水渠建于19世纪末，作为法国教堂的基础设施之一。为解决人们生活生产用水需求并防止水土流失，人工修砌引水渠和凿掘蓄水池，从山上拦蓄雨水。下雨时，从山间流下的雨水大部分能顺着引水渠汇流到蓄水池里，成为当时宝贵的水源，起到雨洪利用。引水渠全长467米，渠深约1.2米，渠



圣母山遗迹（作者供图）

底宽约1米，全部采用山石垒砌。2015年，公园本着修旧如旧、还原历史的原则，经挖掘、清淤，恢复水渠原貌。

沿渠而上首先看到的是圣母山遗迹。

圣母山始建于1923年，长约11米，高约5米，与圣母院、圣约瑟楼为同期建筑。圣母山需天主教宗批准方可设立，是天主教徒朝圣地，原供奉有圣母像。荷兰籍神父威廉（Pierre Willems），圣母山遗迹处墓碑的主人于1931年起在黑山扈传教16载，1947年8月26日逝于此处，享年71岁，同年11月1日立碑于圣母山后。2020年5月百望山公园将倒下的墓碑移至圣母山前加以保护。

继续前行看到的圣母院，现归309医院管理，俗称法国教堂或九国教堂，为著名传教士沈蕴璞创建。1920年山顶建筑最先完成，作为神父和退休教士的住所，教会内称为圣母疗养院和圣母修道院。

1925年在山脚下建起一座圣若(约)瑟楼，是教会办上义师范学校的主楼，现在叫100号。1907年天主教圣母会文学所在马尾沟办“中法上义学校”，1918年改制师范学校，1919年经当时的教育部批准，立案校名为“北平特别市私立上义师范学校”，成为中国政府批准的第一所私立教会学



圣母院（作者供图）

校。新建的圣若瑟楼是扩大后学校的一部分，1927年见习班和师范后五年的课程都搬到圣若瑟楼上上课。（北平特别市私立上义师范学校学制6年。当年开列课程有必修课党义、国文、法文、数学、自然、地理、历史、手工、图画、教育、体育、军事训练，选修课国语、乐歌、法制、经济、美术史、英文等。）

1937年的绑架教士案是圣母院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事件。卢沟桥事变后不久，赵侗的国民抗日军冲进圣母院，绑走外籍教士9名，向日军及教会索要赎金。之后，国民抗日军曾与日军激战多次，还击落飞机一架，史称黑山扈战役。被绑教士在两个月内分批获释。威廉神父是被劫持人质中最后一批被释放的。赵侗部还曾洗劫过阳台山脚下的中法大学第三农林试验场和中法大学附属温泉中学环谷园分校（现北京四十七中）。为了安全，学生撤回城里马尾沟继续学习，上义师范学校自此结束了在黑山扈11年的办学历史，留下三个中国人和荷兰人威廉神父看守这片教产，持续到抗战胜利。

圣母院后来曾作为309医院的戒毒所和招待所，现在游人无法进入院落，但似有人居住其内。

至此，法国教堂就看完了，但它与法国乃至欧洲有关的历史，还需要耐心地去探索。

海淀区史志办传达学习贯彻北京市党史地方志办主任会议精神

本刊编辑部

3月19日，海淀区史志办召开全体会，传达学习贯彻北京市党史地方志办主任会议精神，史志办全体人员参加。

会议指出，史志工作者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服务中心工作开展业务研究和宣传。一是深入抓好《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贯彻落实，充分发挥党史学习教育职能部门作用，推出高质量党史著作和编研成果，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二是加强地方志编修，做好第二轮地名志出版发行和第三轮修志准备工作。三是加强党史地方志资料征集和成果转化，深挖区域人文历史，讲好城市发展故事。四是强化自身建设，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史志干



会议现场（作者供图）

部队伍。五是持续用正确党史观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会议强调，史志工作者要认真学习贯彻北京市党史地方志

办主任会议精神，充分发挥史志工作“存史、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为推动北京党史地方志工作再上新台阶贡献海淀力量。

（马坤）

海淀区史志办开展地名考察活动

本刊编辑部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是北京“三大文化带”之一。永定河作为北京的母亲河，对海淀和海淀园林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日，海淀区史志办为延续地名考察工作，扩充海淀地名资料库，海淀区地名志编辑部全体人员赴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考察地名。

怀来与海淀：怀来县位于桑干河流域。桑干河为永定河上游河流之一，海淀地区位于永定河冲积扇的北部。一万余年前，永定河改道北流，由海淀区西北侧经过，在老冲积扇上切割出宽广的河谷，造就出海淀地区起伏明显的地貌特征，在海淀的东南部形成开阔高起的“海淀台地”，西北部则是低平多水的“清河洼地”。

怀来的历史变迁：怀来历



官厅水库（宁葆新摄）

史上曾称沮阳、怀戎等。上古舜设十二州，怀来属冀州；秦汉时，秦设上谷等三十六郡，上谷郡置沮阳县，为今怀来县建县始端；辽太祖时始称怀来县；金代改称妫川县；元代复称怀来县，为蒙军淘金放马之地；明初改怀来县称怀来卫；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又改称怀来县并沿续至今，康熙皇帝征葛尔丹

叛乱，六次驻跸怀来城外行宫。
1948年底怀来全境解放。

怀来城始建于唐代，武则天垂拱年间在此设清夷军城，为妫州治所，是著名的军事要塞，有“北门锁钥”之称。1951年，因修建官厅水库被淹，怀来县城迁到沙城镇至今。经过多年发展，现怀来有“数据之城”“生态之城”“温泉之城”“英雄之



镇边城东门（作者摄）



怀来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戴金胜摄）

城”“美酒之城”“文化之城”之称。

官厅水库：于1951年10月动工，1954年5月竣工，是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库，上游有桑干河、洋河、妫水河3条支流，其中桑干河与洋河在河北省怀来县汇合后称为永定河。水库建于官厅山峡入口处，为防洪、灌溉、发电发挥巨大作用。官厅水库曾经是北京主要水源地之一，后改为首都备用水源地、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

金代该地出现合河、合河镇的地名。明代更名为“合河口”“合河堡”，成为拱护陵京的隘口。清沿袭旧制，但弱化军事隘口的职能，合河成为自然村落名。民国改称“官厅村”。一般认为“官厅”为官府在此建衙而得名。据传明代在此设有“把水官”，监视水情。水库因村得名。

土木之变与景泰陵：明正

统十四年（1449）七月，瓦剌大举攻明。明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率50万大军亲征。双方大战于土木堡。王振死于乱军之中，明英宗被俘。兵部侍郎于谦等大臣拥立王朱祁钰为帝，年号景泰，尊英宗为太上皇。朱祁钰即位后，任于谦为兵部尚书，粉碎了瓦剌对北京（顺天）的进攻，迫使瓦剌放回英宗。景泰元年（1450）八月，英宗返回北京，朱祁钰害怕英宗复辟，故将其软禁于宫中，以锦衣卫严密控管。景泰八年（1457）一月，朱祁钰病危，曹吉祥、石亨、徐有贞等人谋复立英宗，发动夺门之变，率领武士攻入紫禁城奉天殿，英宗复辟，朱祁钰被降为郕王，软禁在西苑。景泰八年（天顺元年）二月十九日，朱祁钰崩于西苑，以亲王礼制葬于北京西郊金山（玉泉山北）的景泰陵。

明宪宗朱见深时追认朱祁钰的

皇帝之位，谥为“恭仁康定景皇帝”；南明弘光帝朱由崧，给朱祁钰上庙号“代宗”。

镇边城：镇边城是镇守明长城的边关之城，与长峪城、白羊城并称北京边关三城。明正德十五年筑，东西跨山，曾设守御千户所，后毁于水患。明万历年间又筑一城于其西，曰镇边新城。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昌（平）、宛（平）、怀（来）”联合县政府所在地，留有南口战役石猴岭阻击战遗址。成立的怀来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是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红色旅游资源，也是镇边城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

通过此次调研，大家不仅了解桑干河与永定河的关系，感受怀来县的历史变迁与文化传承，同时也接受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意义深远。

（曹沛函）

海淀故影



礼亲王府大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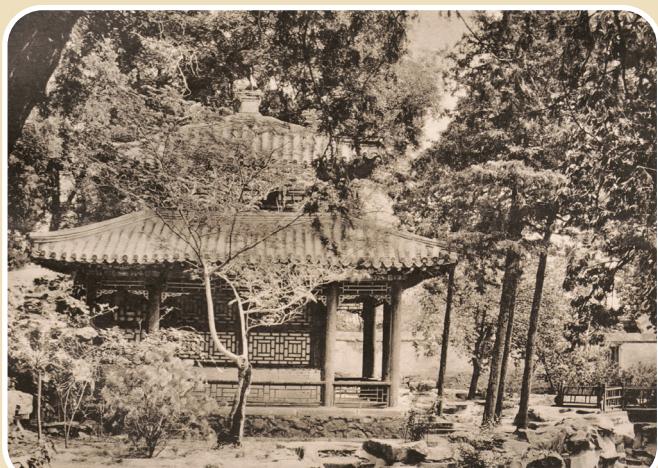
礼亲王府花园



礼亲王府花园假山



僧王府花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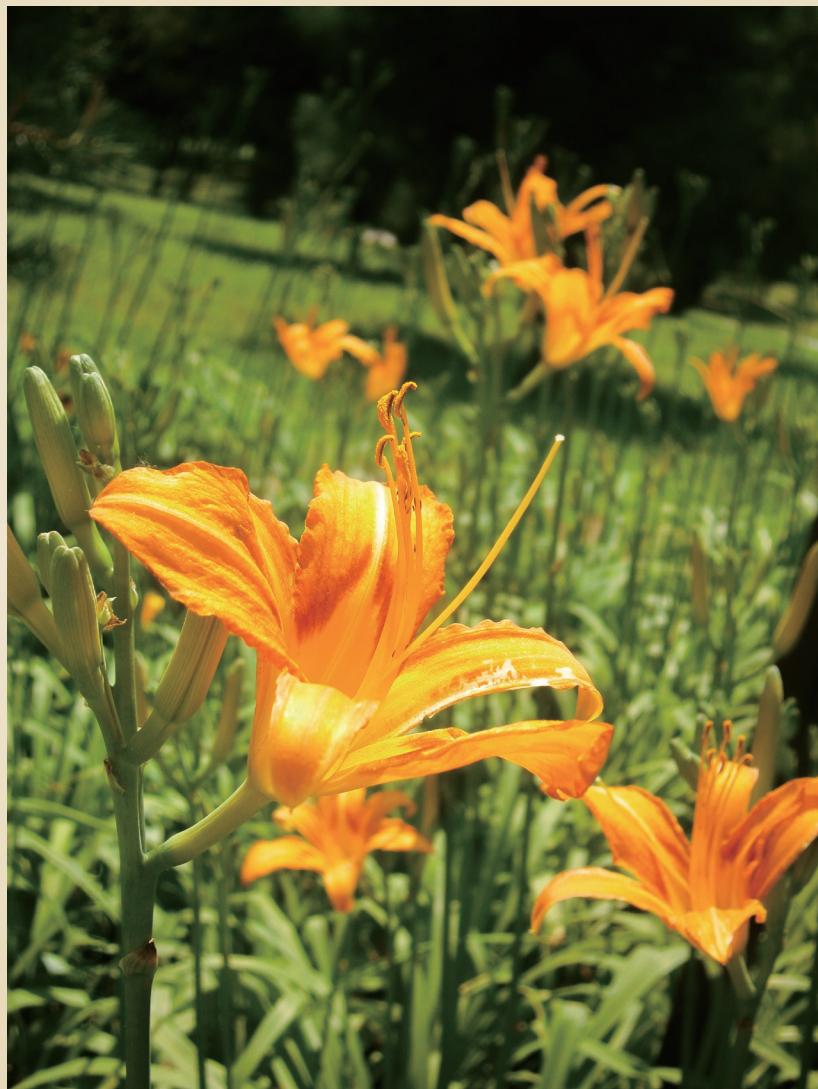
僧王府花园凉亭



僧王府花园游廊

1925年左右的海淀王府 喜仁龙摄影 (韩立恒提供)

封面：十方普觉寺山门



萱草（宁葆新 摄）

海淀史志

编 辑：《海淀史志》编辑部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 11 号

邮 编：100195

电 话：010-88487042